ZHIXINGYANJIUFANGFAYIC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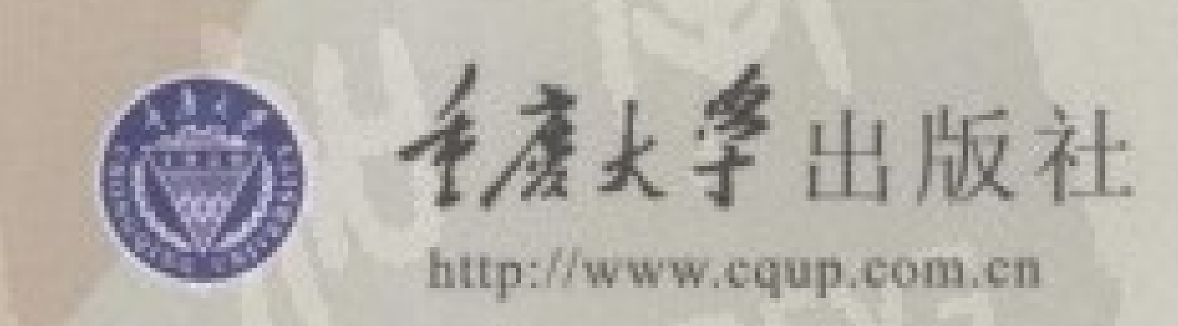
ZUO ZIRAN ZHUYI
YANJIU FANGFA
ZHINAN

万卷方法 / 质性研究方法译丛
ZHIXING YANJIU FANGFA YICONG

做自然主义研究
——方法指南

■大卫·A·欧兰德森　埃德沃德·L·哈里斯
巴巴拉·L·史克普　史蒂弗·D·艾伦 著

■李涤非 译



Z H I X I N G Y A N J I U F A N G F A Y I C O N G

ZUO ZIRAN ZHUYI
YANJIU FANGFA
ZHINAN

万卷方法 / 质性研究方法译丛
ZHIXING YANJIU FANGFA YICONG

做自然主义研究
——方法指南

■大卫·A·欧兰德森　埃德沃德·L·哈里斯
巴巴拉·L·史克普　史蒂弗·D·艾伦 著

■李涤非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做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指南/(美)大卫·A·欧兰德森(Erlandson, D. A.)等著;李涤非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9
(万卷方法. 质性研究方法译丛)
书名原文:Doing Naturalistic Inquiry: A Guide to Methods
ISBN 978-7-5624-4259-2

Ⅰ.做… Ⅱ.①欧…②李… Ⅲ.自然主义—文学研究—研究方法 Ⅳ.I109.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5486 号

做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指南

[美]大卫·A·欧兰德森 埃德沃德·L·哈里斯 巴巴拉·L·史克普 史蒂弗·D·艾 伦 著
李涤非 译
责任编辑:陈 进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制: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 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市场营销部)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1.25 字数:220 千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4259-2 定价:32.00 元

作译者简介

大卫·A·欧兰德森　1969届伊利诺州大学教育博士，美国得克萨斯A & M大学教育管理教授。欧兰德森教授1977年进入得克萨斯A & M大学，之前在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从教6年，并曾在伊利诺州公立学校当了11年的教师和行政人员，现任全美中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他的研究集中在校长的职业发展和学校环境的重建上；是《加强学校领导》（*Strengthening School Leadership*，1976）一书的作者，并就校长的职业准备及职业要求方面撰写了大量期刊论文。

埃德沃德·L·哈里斯　1991届得克萨斯A & M大学哲学博士，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助教，有15年的教师和行政人员经验；目前主要研究多元文化主义、价值教育和学校文化。

巴巴拉·L·史克普　1989届得克萨斯A & M大学教育博士，美国得克萨斯圣安东尼奥附近鲁道夫空军基地上的鲁道夫中学校长。在20余年的时间里，史普克当过公共教育的教师、辅导员、顾问、课程督导和校长；此外，还曾在圣安东尼奥的Incarnate Word College任教，并就中学数学教学编写了一些材料；她的博士研究是一项自然主义案例研究，建立在对得克萨斯一所中学近一年的参与者观察的基础上。

史蒂弗·D·艾伦　1990届得克萨斯A & M大学哲学博士，美国休斯顿独立学区另类学校的特殊教育主持人。他在博士研究中考察了两所城内中学的校长-教师互动模型；当前主要研究城内教育管理、管理行为和涵盖性社区（inclusive community）平等进入途径的发展。

李涤非　2005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南财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和认知哲学。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译者前言

实证主义一直以来是社会学中盛行的研究范式，其基本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第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一样，都是客观的，社会现象背后也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规律。虽然各个社会的类型和性质可能不同，但同样的原因会产生相同的结果。第二，社会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其任务在于说明社会现象是什么，解释其发生原因，而不关注价值等主观方面的问题，事实和价值的区分是社会实证主义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三，由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因此在相似的语境中获得的知识可以概推。与此相应，实证主义研究强调研究过程的程序化和测量工具的精确化。正是由于实证主义方法的兴起，社会学才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实证主义有一个不合理的预设：世界是统一的，而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适用于自然界的法则同样也适用于社会语境。这样的预设忽视了社会主体人及其在社会活动中的主观意识和价值取向的作用，忽视了人所创造的语境的多元性。尽管自然科学家通过观测一个分子就可以推断全部物质的属性，但社会学家无法通过观察一个人而了解整个社会的状况，也无法通过观察社会的一隅而窥测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脉络。在这样的一种认识下，各种非实证主义的研究渐渐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自然主义（或建构主义）研究范式，该范式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第一，存在着多重现实，而非单一现实，事物的运行方式取决于相关的建构者。第二，不存在客观的研究，所有研究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价值的影响；研究目的是发展某一具体群体、社会或文化的成员的共有建构。第三，各种社会语境都包含复杂的因素，尽管有的语境相似，但有许多微妙的差异，因此，在一语境中所做的研究不能随意概推到相似的语境。第四，最重要的研究工具就是人类本身，因为它有无与伦比的灵活性，能应付社会这种高度复杂的语境。与这样的一些认识相对应的是自然主义的核心概念：研究的可信度，它要求研究要忠实地反映研究语境的共有建构。围绕该概念的是自然主义研究的一些质量标准：可信性、可转移性、可靠性、可确认性，显然，它们与传统研究中的一些诸如“内在效度”、“客观性”等概念有完全不同的内涵。

一个可能的质疑是，由于语境中微妙而复杂的差异，因此与自然科学中的知识不同，自然主义的研究不能随意概推，那么，这样的一种研究有何意义？这样的一种担心是多余的，尽管不能做简单的、完全的概推。但是，一个方面，通过自然主义的研究我们能获得指导，为有关组织的共有建构提供建议，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调查结果在将来处理相同的环境，或者用于深入研究相似的环境，毕竟，对某一语

境的广泛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另一语境中的相似和差异做出有用的判断。

关于范式之争，已有不少的著作；自然主义范式发展到现在，其理论已经比较成熟了，但究竟如何做自然主义调查，还缺乏实践方面的指导。这本《做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指南》尽管也有些篇幅牵涉到范式的比较（主要集中于第1章和第2章），但总体来说是一本实践性的教材，立足于一些实例，指导如何有效地从事自然主义的调查。全书几乎涵盖了调查的各个步骤：

（1）启动研究（第3章），主要包括确定调查难题、陈述难题和相关问题、鉴别调查地址、发展工作假说。

（2）设计研究（第4章）。自然主义调查中的设计不是在调查开始前就完全拟定好的，它是在初步的调查过程中自然出现的。因此，这种设计一般是为某些可能性制定计划，而不要针对一些具体的事项规定落实细节。大体而言，设计包括交涉和建立入口条件、为立意样本的选择制定计划、资料收集计划、资料分析计划、为研究质量制定计划、为报告研究制定计划、研究的后勤计划和定期检查临时设计。由于在后面的每一步都涉及计划的自然发展，因此这章主要考虑初期的获得进入通道的计划。

（3）收集资料（第5章）。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里单独用一章，只是形式上的需要。资料收集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打破分散的现实建构之间的屏障。

（4）分析资料（第6章）。资料分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在调查过程中始终是与资料收集互动的。资料分析包括两个部分：资料收集期间在调查地址中进行资料分析；一段时期的资料收集后，离开调查地址进行资料分析。

（5）准备报告（第8章）。在自然主义调查中，调查者的主要任务是传达具有复杂联系和多重现实的环境，与听众和研究环境进行认识上和感情上的互动。案例研究一般被认为是报告调查的首选方式（后面也提供了其他候选格式）。

此外，第7章考虑了自然主义的质量标准，尤其关注可信度这个概念，为此作者列举了提供可信度的一些技术，如长期涉入、持久观察、三角测定、成员核对等。另外，调查的真实性、调查过程中的伦理考虑也是调查者必须予以特别关注的。

除了对整个调查过程做整体性的指导外，作者还根据他人以及自己的经验，特别提醒那些从事自然主义调查的研究者注意一些细节问题，比如回答者的隐蔽动机、调查工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长期涉入的潜在问题、同侪报告成员的选择等。尽管本书涵盖面广，特别注意各种细节，但并不凌乱，思路非常清晰，整体布局一目了然。对有志于自然主义的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书中提供的实例无疑有启发作用；而对自然主义的实地调查有兴趣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本很好的指南。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受惠于许多人的帮助。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的雷少波和陈进提供翻译的机会。原文的某些地方向陈虎平请教过，潘淑兰、王辉、阎四华、李俊霞、胡鹏、王丽阳看了部分译文，在此一并致谢。此外要感谢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母亲，正是因为她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才能在身体有恙的情况下顺利完成翻译工作。由于学识和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错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涤非

2007年4月

代序

ix** 候选范式*在十多年前就被注意到了，它们是导向研究之途的信念集，与历史上正确的“已接受的”范式有本质的差别。但研究这些候选范式的文献长于理论而短于实践程序建议（我必须承认，我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有这种疏忽）。我欢迎欧兰德森及其同事的这本书，正因为它是一种努力，研究了至少这样一种候选范式是“如何去做”的，这种范式就是自然主义研究（我现在更愿意称之为“建构主义研究”）；并且，它不是由说明性的套话堆积而成，而是用（绝大多数）他们自己工作中的经验和实例来阐述的。

尽管这本书看起来简单，但并不容易阅读。在处理范式差别上有一些问题，读者必须始终警惕，以免误解或误构本书的内容。在我列举这些概念上的绊脚石时，请大家保持耐心。对于每一块绊脚石，我会引导大家关注书中特别有关联的具体位置，但读者必须意识到，这些问题遍及相关的材料（这一点在本书中与任何其他处理范式差别的书中是一样的），而且，除非给予特别关注，否则不容易注意到。

x 1. 自然主义研究不等于质性研究。读者不要混淆自然主义研究和质性研究——即，只使用质性方法的研究。尽管我们可以提出很强的理由证明，质性方法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无论支配任何研究的研究范式是什么，质性方法在该研究中都值得使用，但那种理由并不等于能够用来支持自然主义研究（或任何其他候选的研究形式）的范式层次上的理由。以质性方法为基础、却以实证主义假定来设计的研究，仍是实证主义研究。自然主义研究尽管可以包含量化方法，但有本质的差异；该差异与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问题（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没有任何关系。第 1 章和第 2 章会提出这一论题。

2. 自然主义范式与常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读者应该牢记，对于任何范式来说，无论是自然主义的还是其他的，如果以别的范式为基础，我们就不能公正地理解它；否则就相当于说，要在路德教教义的基础上判断罗马天主教理论（或者相反）。正如

---

* alternative paradigm，在整本译著中，alternative 绝大多数译为“候选的”，如“候选解释”、“候选建构”等——译者注。

** 本书旁边的页码为英文原版页码——编者注。

平面地球观念和圆形地球观念在概念上是不可通约的一样，自然主义范式和实证主义也是不可通约的。“不可通约”表示，不存在任何的共同参考点，能在它们之上解决范式间的差异和冲突。它是还原论的基本问题，还原论正好假定了这样的共同点。读者必须不断抵制诱惑，勿用实证主义的语言来解释自然主义研究（就该问题来说，或者相反）。在读完第 2 章后，大家就会清楚这一点。

3. 候选范式处于发展阶段。读者必须时刻牢记，候选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发展阶段；还存在许多概念和实践上的鸿沟。这并不奇怪。常规科学（实证主义）经过了约四百年的争论和经历才发展到如今的成熟阶段，而它的候选者——即便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也只有不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事实上，在社会研究中，对“新”范式的需求只是现在才变得明朗（见第 1 章）。

我的合作者林肯博士和我希望，像这样一本实践性的书籍能够出现，来帮助改善这一现状。即便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不完善，反映候选范式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它们仍能提供经验基础，该基础在示范那些支配“新”研究的实践方法的同时，检验相关理论。我们一直主张，建构能够而且应该随着信息的增加和复杂程度的增长而改变；我们已经论证过，我们保留有“变得聪明”的权利。如果很多还很模糊，这与其说是作为一个理由声讨这本或任何其他类似书籍的短处，还不如说是敲响了警钟，激发其他的工作来揭示有待探讨的东西（许多领域还有待探讨，参考书目中列举的大量书籍和文章对它们做了讨论）。 xi

4. 根深蒂固的常规假设的逗留效应。许多读者在接触本书的过程中，会拖着大堆沉重的常规假设；毕竟，理智先辈们不正是教导我们相信实证主义是获得知识的“正确”途径吗？比如说，绝大多数实证主义者假定，事物有某种实际“存在”和实际“运行”（一种具体的现实及其机制）的方式，而且科学能发现它们是什么。研究中的客观性被授权到这样一种地步：研究就是客观的，它在事实上是价值中立的；科学的目的是获得概推*，尤其是因果关系上的概推，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使预测和控制可能，它们就有多“真”；或者类似的看法。相反，绝大多数自然主义研究的提倡者假定，同样举例来说，事物被建构和运行的方式，取决于接受有关观念的具体人类建构者（换句话说，存在多重现实，而不是单一现实，每一现实都与建构者的经验相关）；主观研究是唯一可行的研究类型，因此，所有研究都在不定的程度上受到价值的影响；研究目的是发展某一具体群体、社会或文化的成员的共有建构（包括用于行为的建构）；而且，如果其他人希望从某一既定研究中有所收获，他们主要是利用一种好的案例研究报告提供的“替代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来达成的，等等。

本书的一个要点是，关于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常规的建构只是许多可能建构中的一种，而且，这种特殊的建构——“已接受的观点”——正被许多倡导其他可能建构或范式的人所拒绝。这些其他的范式中，有一种就是自然主义研究。应该注意的是，尽管候选范式的拥护者一般能把常规的、已被采纳数年的实证主义观点看成是一种有

---

* generalization，有普遍性的推导，为全文统一，特译为“概推”——译者注。

用的(即使有点陈旧的)范式(事实上,该范式已经给社会带来某些显著的收益),但
xii 常规观点的拥护者似乎无法用相似的平静态度来接受候选范式。就如鄂兰(H. Arendt)指出的:"真理是强制性的"。如果大家相信,科学就是制造一些关于事物实际存在和实际运行方式的发现,那么挑战常规观点的阐述,肯定被认为天生就是错的(如果不是由恶魔煽动的话)。第 2 章会清楚地揭示这一争论。

5. 我们语言和文化的隐蔽陷阱。类似地,读者必须注意,我们的语言结构(以及我们的概念结构)严重地依赖于传统的实证主义用语,从早期的孩提时代起,这些用语就深深地扎根在我们身上。我们尤其难于从我们的记忆中清除这样的一些用语:因果性、概推、客观性、成见,等等;这些概念并不适用于自然主义的研究。从自然主义的观点来看,讨论中缺少这些用语,并不是一种缺点,而是优点。

拿成见来说。就一般的用法而言,成见意味着歪曲事物实际存在或运行的方式。这种歪曲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经常是后一种情况。对于不同意你的反对者,你争辩说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所持的成见,这样就很容易颠覆他的看法。成见在实证主义中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正因为实证主义断定,存在着事物实际存在和实际运行的方式,要用其他的方式来理解它们,明显是种成见,也就是说,是种歪曲。但自然主义者只会说,其他个体当然有着与他(她)自己不同的建构,关键是要确定这些差异为何存在。它可能是,比如说,一种缺少相关信息的情况,或者是不能足够老练地衡量和解释那些可用信息的情况。它可能是建立在能被纠正的错误信息上的某种建构的情况。当然,它也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建构者之一(甚至是研究者)别有用心,故意误导另一建构者,或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以达成目的。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中,自然主义者也不会称之为成见,而只把它看作是有预谋的欺骗。对这类情况的判断要基于伦理或道德,而不是基于成见(欺骗者知道他正在提供的是误构)。所有这些说明什么?那就是:那些看似需要的用语也许缺少了,是因为从概念上来说,它们在自然主义范式中没有位置,而不是因为它们被作者忽视了。

或者考虑另外一个例子:变量这个概念。博士生在研究委员会前做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时,被经常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是什么?"其含意是:如
xiii 果研究者不清楚有关的变量,那么如何能概念化(设计)研究?变量概念的这种强烈的亲和力,可能导致那些粗心的读者认定,比如语境或文化这些被欧兰德森、哈里斯、史克普和艾伦使用的术语本身就是变量(考虑一下,在管理文献或领导文献中用语文化如何被解释成另一种变量,警觉的管理者可以操控它来达成组织目的)。但这样的一种肤浅解释没注意到,文化是一种得到良好理解、已被接受和共有的建构,它为其领域内的所有人类活动装备了一种语境。甚至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样一些意义太根深蒂固,写候选范式的作者自己都会无意地使用它们(尽量在一天内不说词语变量或任何同义词,来体会一下,要清除思想中不恰当的建构有多么困难)。但读者不要受到这些脱离常规告诫的误导;当它们出现时,它们像是一种监视,而不是对原则的断定。第 2 章对这种语言问题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

6. 每种范式都有它自己的恰当规则和标准。读者不要假定,指导(实证主义者会

说,设计)研究或评估其质量的传统规则,同样可以应用于任何候选范式的预设所引导的研究。比如说,效度经常被解释成发现和它们所表征的现实之间的同构程度,当现实在本质上是多重的,而且只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时,效度几乎就不能有什么意义。每种范式的假定同样是它自己的恰当规则和标准的创造者。事态构成了本书力图阐述清楚的另一个要点,甚至它还更清楚地提供一些临时(处于起步过程的)规则,这些规则与充当这一特殊范式基础的命题是一致的。第 3 ~ 6 章较详细地提出了自然主义研究的"规则";第 2 章介绍了质量标准,第 7 章做了详细的阐述。

7. 实施自然主义研究的过程不同于实施常规研究的过程。读者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自然主义研究过程和常规研究会包含相同的元素。第 5 章和第 6 章对此做了大量说明。比如说,我们不可能先验地详细制定自然主义研究的"设计"元素(它们应该是随着研究的展开而逐渐出现),也不大可能先验地详细指定所需的工具。优选仪具几乎总是人类仪具,尽管它或许不能做到传统意义上的那么可靠和集中,但能够不受限制地使用,能随着设计的明朗化而改变目的和模式。即便某些元素似乎既包含在自然主义,也包含在实证主义的研究草案中,它们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比如说,在实证主义中,在考虑资料收集方法前,资料分析程序一般就被决定了(这正是统计学家在提到"实验设计"时所表达的意义)。在自然主义研究中,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携手并进,互为基础,首先是少量收集起来的资料产生初步分析,后者反过来引导另外的、更集中的资料收集,而这又促发第二轮的资料分析,以解释—辩证的方式依此进行。在本书中,对这些过程的讨论是分开进行的,这仅仅是出于教学便利,而不是因为理性需要。在某些案例中,自然主义研究用一种平行的形式取代实证主义中的现有形式;因此,自然主义的研究报告采取案例研究的形式,而不是传统的技术性(通常是统计)论文或书籍,第 8 章中对此有表述。 xiv

8. 自然主义的发现是创造的,而不是发觉的。读者必须注意到,自然主义研究的发现不是"发觉到的",那一用法也是实证主义思维的残余。实际上,自然主义的发现是创造的,是研究环境中研究者和不同相关群体(我倾向于把他们看成是干系人)之间和之内的解释—辩证互动式地创造的。这种互动导致对周围一切的摧毁和重构;所抱的希望是,在某种自发*建构上达成共识,来为行为提供刺激和指导(尽管那一希望可能不会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形式上的研究者只是第一个参与者,同等者之首。自发建构的创造是共同努力的结果。那种建构只有被绝大多数干系人共有、"同意",从它所做的承诺和它所激发的行为来说,才是成功的。在阅读完第 6 章后,大家就会清楚这一点。

关于"绊脚石",就说这么多了。请允许我再次强调一点:这些问题并不是这本书所独有的,对于任何处理候选范式研究的书,无论深度如何,这些问题都同样适用。

---

* emergent,有译"滚动"、"紧急"、"应急"等,都觉不妥,通观全书,该词应该是指"自然发生的"或"自然出现的",另外还有一个词"emerging"表示"正在自然发生的",都为形容词时,统一译为"自发"——译者注。

但是,这些告诫当然不是这本书要讨论的内容;本书主要是关于实践的。而且在这个方面,它处理得相当好。自然主义研究中出现的、人们能想象到的大多数偶然情况都得到了考虑。大概从第2章中间开始,过程方面的东西是主要的关注点;读者从问题确定到最终的报告,经历了整个的过程。每一讨论都得到了大量实例的论证和支
XV 持。

也许这本实践著作的最大特色就是提供了练习,它们具有启发性和挑战性。它们体现了章与章之间的衔接和连贯性。有些练习同时还提供了机会,实践自然主义者最深奥的技术—解释—辩证技术。所有章节中一个连贯的练习就是自然主义研究的概念化和发展,这是学生在实际中可能要着手做的(以及他(她)要着手去做的练习的某些部分)。学生关于这些练习所做的,无疑也能为许多课堂问题和讨论提供基础。如果边做边学是一种有意义的观念,把这本书作为课堂教材使用的学生肯定会受益无穷。

总之,在此阶段,本书将不负所托,是自然主义研究方面一本很好的实践性导论。显然,它是实践性的,是激发性的;它有引领、指导和激励之用。作者为自然主义研究提供了基于行为的合法性。如果"它听起来不错,但能行吗?"是一个有道理的问题,那么这本书表明,自然主义研究能行。但很清楚的是,作者是在分享而不是强加方法——或者说,甚至不是在推荐方法。读者需要与相关的材料打交道;所提供的方法不能简单地概推到其他的环境中,而必须像个人经验可能被评估的那样,得到替代性的评估:看它在任何新的环境中是否合适,是否能行,而新环境可能需要引入某种转移。

我敢肯定,这本书会吸引大量的读者,其中有些人精于候选范式的理论,而有些只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些观点。前一群体可能会发现这本书的有些部分显得重复而且冗长,而后一群体可能发现那些相同的部分还不足以使他们把握到要点。对于前一群体的人,我要说的是,看起来多余的部分大可以跳过去;后一群体的人无疑可以从其他更基本的著作中获得帮助,这方面的许多著作都在参考文献中列了出来。但是,我相信,两个群体都将发现,指导做自然主义研究的原则是有用的,其例子是有启发性的。

祝贺作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 G. 古巴
得克萨斯大学城

作者前言

本书试图带领读者进行一次研究冒险。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并不是每 xvii
位读者都能看出本书中的这样一种冒险。对于在做民族志或其他量化研究方面有经验的个人来说,本书也许看上去只不过提供了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一种待研究的语境。我们鼓励这样的研究者尽力去整合一种观点:被赋权的个体合作发展的共有建构,是有意义的跨文化和人际理解的基础。同样还会有某些读者,他们完全接受一种盛行的方法论训练,这种方法论聚焦于变量的识别、空洞假说的形成和对大小、关系的统计表征。这样的读者可能会早早下结论说,本书推进的研究类型(以及它对盛行方法论不太客气的攻击)不仅是不敬的,而且是离题的。我们恳请这些人看完整本书,完成练习,尽量不要做判断,直到他们有机会检验自然主义研究的力量。同样还会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与作者一样,对盛行方法论的局限感到沮丧。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有一个具体的机会进行一次研究上的冒险,我们也希望他们在本书中发现一种收集、分析和报告资料的方法,该方法可以使他们自由地回答先前无法以一种
可信方式予以回答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完全不熟悉该研究领域的人,我们希望他 xviii
们变得迷恋于以某种方式来阐述、坚持和提出关于社会语境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答案——这种方式不仅赋权给调查者,同时也赋权给这些语境中的每个个体。

本书的局限

本书遵从的调查模式与有时候被统称为“质性研究”的其他调查类型有些相似之处。本书推荐的许多方法与其他作者更加泛泛提出和发展的方法非常相似。由于我们认为,为可用的方法范围提供一种详细的描述,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会把其中的一些作者推荐给读者,而且在全书中偶尔会提到他们。具体说,我们乐意推荐博格丹(Bogdan, 1972; Bgdan & Biklen, 1982; Bogdan & Taylor, 1975),哈本斯坦(Habenstein, 1970),以及迈尔斯和休伯曼(Miles & Huberman, 1984)的著作。在质性方法和程序上,把这样一本实践性的书与其他著作区分开来的,不是它提供的那些特殊方法,而是对这些方法的使用,用它们来引出和分享社会环境中人类的现实建构。然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为我们提倡的东西全面地提供基本的哲学原理。就如第1章清楚指出的,我们感到古巴和林肯(Guba, 1978; Guba, 1981; Guba & Lincon, 1989;

Lincoln, 1989; Lincoln & Guba, 1985)已经为我们做了这项工作。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为将来的调查者概述一种过程,并把他们引入这一过程:一方面,该过程在那种达到质量标准、用于回答重要问题的研究中统一了底层的(underlying)研究哲学;另一方面,它在这种研究中结合了底层的(underlying)研究哲学和特殊的方法论。

本书的使用

我们认为,这本书最好被看作是一种统一的调查途径。按经验来说,我们有信
xix 心,这里概述的程序能提高新进调查者做出重要的可信调查的能力。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并不认为每章结尾所列的“进一步的研究”条目是随意的,相反每条设计都是用来提供某一关键领域里的实践性学习。唯一的例外是第1章和最后一章中的“进一步的研究”的第3条。第1章中的可自由选择条目是为那些在启动之前寻求一种更清楚的概念理解的学生设计的。最后一章的可自由选择条目是提供机会在实际中实施研究,这一研究是在本书的推进中所计划的。此外,由于从章到章的这些条目是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此,每章的结果都应予以保留,这样就能在后面的章节中得到拓展。在以这种方式组织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是要用我们的判断代替上课教师的判断,他们更接近学生,可以很好地构造替代性的练习。然而,我们确实感到,学生应该经历这些条目所建议的在每一领域中的指导性实践。我们相信,要充分地应对这些条目,它所要求的工作量,与毕业生指导课程通常所要求的是一致的。

具体说来,“进一步的研究”条目建议研究者要熟悉若干拓展研究。我们认为重要的一点是,新生的调查者应找机会回顾一下社会语境中所做的一些典型调查。不过,这些具体的拓展性研究都只是建议。还有许多其他优秀的研究,我们鼓励读者去鉴别和使用它们,或者用它们来顶替或来补充我们所建议的那些研究。社会语境中所做的调查读起来通常很有趣,而且我们认为,阅读那些完善的研究,其价值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我们同样也意识到,并不是进行这一冒险的所有学生都有相同的背景。但是我们相信,任何想要提升其调查技巧的毕业生都能从中受益。我们提供的许多范例都取自成功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我们相信,这些范例对于那些面临学位论文研究的毕业生尤其有帮助。在研究方法论上有广泛背景的学生很容易进入这项工作。我们鼓励那些背景有限的学生保持耐心,不断投入,以提升他们的技巧。我们会提出一种调查途径,它的有效性不是依靠遵从一套规则和程序,而是从一种要求中获得:要求为调查所聚焦的语境提供有用的洞见和指导。我们提倡的是一种开放的过程,而且我们鼓励学生在此过程中保持开放。

本书的内容 xx

前两章考察自然主义研究的贡献，检查它的假定和要求，为本书的余下章节奠定基础。第1章表明一种调查态度，我们认为这种态度在每位调查者那里应该是明显的，但是，对于那些要在社会语境中“做”自然主义研究的学者来说，它尤其关键。研究社会环境中人类活动的调查者会面临许多问题，我们会考察其中的一些，并且提出这样一个主张：很多问题都是一种常规方法论的直接结果，该方法论为严格性建立一种人为的标准，而以实践决定的实用性为代价。某些用于在社会情景中发现意义的候选途径得到了探讨，而且我们会简略地考察一下，关于世界的底层范式（underlying paradigms）和假定，如何影响人们做研究的方式以及对该研究所能抱有的预期。我们建议把自然主义范式作为在社会语境中做调查的一个合适基础。第2章考虑个人如何建构和传达现实；接着考察可信度的基本标准，这些标准是所有调查的基础；然后大致描述一下自然主义范式如何满足这些标准。指导方法选择和资料收集、分析的范式，其寓意也会得到粗略的考察。

第3章和第4章用于指导那些处于自然主义研究起步阶段的新进调查者。第3章探讨调查者启动自然主义研究的过程。我们考察如何确定调查难题，如何表述调查问题，以及如何发展工作假说来指导调查者。我们同样还探讨了如何鉴别合适的调查地址以及如何获得通道的问题。第4章考虑如何设计自然主义研究。因为自然主义研究拒绝常规方法论施加在调查上的人为限制，包括先验设计这个限制，因此，“设计”一项研究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整个问题就必须得到考虑。文中提供了一种发展“自发设计”的指导方针，还为早期研究阶段提供了指导。

第5章和第6章考察资料收集和分析的互动过程。资料收集是第5章的主题。此外，如何从访谈、观察、文献和人造物中搜集资料，本章也提供了实践指导。第6章关注资料分析，这种资料分析既在资料被收集时，也在被收集后，与资料互相作用。文中还提供了作为分析工具的反面案例、基于资料的争论和三角测定法进行的假说检验的使用。第7章和第8章讨论了用于开展自然主义研究的一些最终的重要考虑。第7章考察了用以判断自然主义研究质量的标准。 xxi 它详细地阐述了第2章为建立可信度提供的指导，描述了确保研究可信度的那些程序。第7章还为自然主义研究制定了真实性标准，并且表明了它们如何得到满足。此外还讨论了自然主义研究中的伦理考虑。第8章考虑的是如何准备研究报告，以便更有效地传达给目标听众，以及用来支撑研究的总体目标。

后记反思了做自然主义研究的过程，包括某些与之相关的个人所失。结尾处，它提供了最后的指导，并鼓励读者启动一次很可能是精彩的理智和实践冒险。

致 谢

我们要感谢林肯对我们写作本书的鼓励，感谢她提供了我们孜孜以求的学识和指导。还要特别感谢杨韶静*，她重打了本书的一些草稿，花了数小时整合了相距数百英里的四位笔者的努力，还贡献出自己独特的专家意见，准备了最终的手稿。

* Sau-King Young，音译——译者注。

目录

调查态度：对新范式的需求 1

我们写这本书，至少部分是因为，我们看到对于许多调查者来说，外出做调查已经没什么新奇感了，我们想帮助恢复这种感觉。许多调查者似乎把他们的工作当成是一种例行练习，遵守非常明确的规则，拒绝大量的人类灵活思维能力；而我们相信，这种能力的拓展是科学前进、是最令人满意的调查的基础。尽管我们要遵循一种与盛行范式背道而驰的调查范式，但实际上我们相信，“好调查就是好调查”，无论有意义的调查遵循什么样的模式，它都会利用人类心灵那奇妙的灵活能力。下面这个一百年前的故事可以很好地反映我们的调查态度，它有关一次调查培训，其领域与我们自己的完全不同。

盯着你的鱼看[1]

S. H. 史卡德

1874 年 4 月 4 日，周六

约十五年前，我进入阿格西教授的实验室，告诉他我已经在理学院登记 2
了，学习博物学。他提了一些问题：我前来的目的，我的大致经历，我计划日后如何使用我可能获得的知识，最后问我是否希望学习任何特殊的分科。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尽管我希望在动物学的所有学科中都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我打算把精力投入到昆虫研究中。

“你想什么时候开始？”他问到。

“现在”，我回答说。

这似乎让他感到满意，有力地说了声“很好”，他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用黄色酒精浸着标本的大瓶子。“拿着这条鱼，”他说，“盯着它；我们把它叫做 haemulon；过一下我会问你看到了什么。”

说完这些他就离开了，但不久又回来了，明确地指导我要保护好交托给我的东西。

"不知道如何照顾标本的人不适合当博物学家。"

我需要把那条鱼放在我面前的锡盘里,偶尔用瓶里的酒精滋润鱼的表层,始终要记着塞紧瓶盖。那个时候还没有磨砂玻璃的瓶盖和形状雅致的展示瓶;以前的所有学生应该会记得那些巨大的圆柱形瓶子和它们的那些易漏、打过蜡的瓶塞,被虫子咬得剩半截,还布满了尘垢。比起鱼类学来说,昆虫学是比较洁净的科学,但教授毫不犹豫地探手到瓶底拿鱼的这一典型做法,却很有感染力;尽管酒精有股"陈腐且带鱼腥的味道",在这种神圣的地方,我实际上不敢流露出任何的不快,把酒精当净水看待。不过,我还是意识到那种稍纵即逝的失落感,毕竟,对于热心的昆虫学家来说,目不转睛地盯着看鱼并不是件值得称许的事。我家中的朋友如果发现无论用多少古龙香水,都无法驱散我身上那股如影随形的气味,他们也会感到厌烦。

十分钟后,我已经在那条鱼上看到所有我能看到的,就开始去找教授,不过他已经离开了博物馆;我浏览了一下保存在楼上的一些古怪动物,当我返回时,我的标本已经干了。我急忙往鱼身上泼酒精,就像是对突然晕倒的动物进行急救一样,焦急地期待它回复正常的、湿漉漉的模样。这场小风波过后,我只得又紧紧盯着我那不言不语的伙伴。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鱼看上去变得讨厌了。我把它翻来翻去,看着它的脸——恐怖;从后面、下面、上面、侧面、斜面看它—— 一样恐怖。我绝望了。尽管时间还早,我觉得该进午餐了,因此,我小心地把鱼放回瓶子,带着全然释放的心情逍遥了一个小时。

3 回来后,我了解到阿格西教授已经来过博物馆,但又走了,而且数小时内不会回来。我的同学们太忙,不能与之继续交谈以免妨碍他们。我慢慢取出那条令人憎恶的鱼,带着无助的感受再次盯着它看。我不能使用放大镜,不能使用任何类型的仪器。我的双手,我的双眼和这条鱼,没有比这更狭隘的活动范围了。我把手指探入它的喉咙,感受它的牙齿有多锋利。我开始数每排有多少片鱼鳞,直到我确信这样做太无聊。最后,一个愉快的念头闪现——我可以描绘那条鱼。当时令我惊讶的是,我开始发现这条鱼身上一些新的特征。此时教授回来了。

"不错,"他说,"铅笔是最好的眼睛之一。同样,我很高兴看到你把标本保持湿润,瓶盖也塞好了。"

在说完这些鼓励的话后,他加上了一句:

"恩,它像什么?"

他聚精会神地聆听我简要地叙述那些我还叫不出名称的部分的结构:拱形的腮,能移动的腮盖;头上的孔,厚厚的唇和没有眼睑的眼睛;侧线,刺状的鳍和叉状的尾巴;扁平、弓形的鱼身。当我说完,他等了一下,似乎期待更多,

然后带着一丝失望说到:

"你看得不够仔细,"他继续更殷切地说:"你甚至没有看到这种动物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跟这条鱼本身一样,它清清楚楚地就在你面前;再看看,再看看!"他又走了,把我留在懊恼之中。

我感到伤自尊,我感到郁闷。还要再看这条丑陋的鱼! 但现在我决心给自己布置任务,而且新发现一个接一个,直到我体会到教授对我的批评是多么公正。下午过得很快。要结束时,教授问道:

"你现在看到了吗?"

"没,"我回答说,"我确定我没看到,但我看出我先看到的是多么的少。"

"还不够好,"他诚恳地说,"不过我现在不会再听你说,把鱼放好回家,也许明天早上你会回答得更好。在你看鱼前我会考察一下你。"

这就让人感到不安了。我不仅必须整夜想着那条鱼,在没有对象放在我面前的情况下,我得研究我不知道的,但又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同时,在没有检查我的发现的情况下,我必须在第二天精确地描述一下它们。我的记忆力很差,因此我带着这两个困惑,心烦意乱地沿着查理士河步行回家。

第二天早上,教授那热诚的问候让我感到安心,这里有个人,似乎跟我一 4
样急切地认为我应该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

我问道:"您是否指的是那条鱼的两侧是对称的,器官也是配对的?"

他那满怀喜悦的"当然! 当然!"令我觉得头晚数小时的失眠是值得的。在他极其愉快且兴致勃勃地——他经常这样——谈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后,我试探性地问他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哦,盯着鱼看!"他说,接着再次离开了,让我自行其是。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他回来了,听取我的新记录。

"很好,很好!"他重复说道,"但那还不是全部,继续。"连续三天他都把鱼摆在我面前,不准我看其他东西,也不准我使用任何人工设备。"看,看,看"是他重复的指令。

这是我上过的最好的昆虫学课,它的影响延伸到后来的每一项研究的细节中;它是教授留给我、也留给许多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其价值无法估量,买也买不到,我们也离不开它。

我们劝那些想开展有意义调查的人采取类似于阿格西教授要求的那种态度(尽管我们会发现,自然主义调查者要与人类的语言和意义打交道,他们的任务远比考察一条湿透的鱼要复杂得多)。对博士生来说,学位论文很可能是他们要做的第一项重要的独立研究,这种态度尤其重要。对于其中的一部分学生来说,学位论文是研究生涯的第一步,他们在学位论文研究中培养的习惯和态度很可能就是他们以后做研究的习惯和态度。本书中用作范例的很多

研究都是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可能对那些处于此阶段的人来说尤其有用。

阿格西教授的教学态度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同样也有启发性。他并没
有为学生制定一套可以遵从的规则和程序，他只是告诫："盯着你的鱼看！"然
而，并不是学生的所有观察都有同样的价值。观察的有效性源自于摆在学生
面前的那条湿透的、无生命形式的鱼和从那些观察出发的逻辑引申。这非常
类似于我们要在本书中提出的过程。观察、记录、分析、反思、对话和再思考这
5 样一些过程，都是我们力图提出的调查过程的核心部分。所有部分的有效性
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被观察事件所在的语境。我们将在
本章的后面进一步考察语境的重要性。

社会环境中的调查

在本书的这一开篇章节中，我们简略地提到善于人类互动研究的调查者在工作中经验到的某些挫折。这些挫折似乎不完全源自其调查领域的复杂性，更是源于一种盛行的调查模式，该模式不允许使用某些潜能巨大的调查工具和程序。本章探索某些已被试验过的候选程序，并且简要地描述一下当前对调查范式转换的看法。结尾简单地考察了社会语境在做自然主义研究中的关键作用。

在《运动心理学家》(*The Sport Psychologist*)的一篇文章中，马腾斯(Martens, 1987)讲述了他自己作为调查者的经历：

> 我用研究所学到的科学方法研究运动心理学大概有十五年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这些方法越来越感到不满，不是因为我对研究现象缺少兴趣，因为现在我越发着迷于运动心理学的题材。事实上，我变得不满于用来研究我们领域中的现象的那些方法，但我并不完全知道是为什么。我不能理性地说明原因，但是就情绪而言，对于忠实地理解人类行为来说，这些方法并非"似乎是正确的"(P.29)。

稍做调整，马腾斯的叙述就很可能描绘了许多调查者的经历，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就是人类行为和该行为发生的环境。教育组织的学生经常失望于"最好的"调查方法在获得重要问题的答案上的无助。如果马腾斯的感觉是正确的，如果它反映了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生的普遍困境，那么它暗示的是，被看作是"最好的方法"不够好。

在《社会公益服务评论》(*Social Service Review*)的一篇文章(Heineman, 1981)中，海涅曼提到社会工作领域中方法论和设计的影响：

> 社会工作调查的盛行模式设置了调查设计层次,它涵盖了整个的范围,从最不 6
> 科学的到最科学的,而且依它们满足预测标准及随带要求——比如实验操作、控制组和随机化——而得到排列(P.374)。

她继续说到:

> 问题不是这些关于构成好科学和好社会工作调查的假定从不导向有用的知识,而在于它们是被规范性地使用,而非描述性地使用,来规定某些研究方法论和禁止其他的方法论(P.374)。

海涅曼声称,当前科学的社会工作概念化的规定性本质(这体现在首选的研究设计和方法论形式中)有力地决定了实践的本质,而不允许实践决定科学研究的形式。

对于本书的作者来说,马腾斯的体验和海涅曼的评论听起来是对的,而且我们猜测它们对于许多读者来说也是对的。我们在对底层假定,尤其是知识的客观性假定不做任何置疑的情况下,轻易接受科学方法的规定。自小学起,我们就听到了对科学方法优点的颂扬,完全吸收了传达给我们的、反映它对人类繁荣所做贡献的历史。由于科学方法被过分简化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所以当我们取得的结果无法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时,这种成见经常导致我们质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能力。我们固执地期待统计程序和计算机能力,以为能用它们来量化和处理在社会环境中碰到的微妙、复杂的差异,从不怀疑客观的量化可能正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法。

马腾斯发现他自己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

> 我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两种完全不同的运动心理学——我称之为学院运动心理学和实践运动心理学。它们导致我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种是学院的、科学的和抽象的,另一种是实践的、应用的,以及在某些人看来,神秘的。为什么这两种运动心理学会分道扬镳?我认为,答案在于运动心理学家对何为合法知识的理解(P.30)。

在马腾斯看来,学院运动心理学主要关注的是科学规则的应用,其应用方 7
式据说是行为研究者可接受的。然而,他发现第二种生活,即作为实践运动心理学家的生活,更有效果,因为,相比起他用正统科学方法来研究运动心理学而言,他用实践心理学获得的知识更多。马腾斯认为,鉴别和获得"合法知识"的两种方法间的这种分裂,反映了库恩(Kuhn, 1970)那里与范式危机有关的东西。

在库恩看来,范式提供了看世界的方式。它通过提供假定、规则、指导和"常规科学"的实施标准,对研究领域施加影响。在某一研究领域,科学家所做的已被接受的工作就是挖掘范式蕴含的细节,与此同时,履行范式的承诺。

但是，就如库恩在许多不同领域中表明的，这种工作不可避免会制造反常，而盛行的范式不可能全部容纳。这就为能更好地说明反常的新范式铺平了道路（如太阳中心说取代地球中心说的宇宙观），并且使新阶段的常规科学得以启动。然而，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一般不那么顺利。某个领域内旧一代的、已确定地位的科学家，是围绕更早的范式来开展其工作的，他们控制了科学工作奖励的那些规则。冲突会一直持续，直到新兴的范式变得盛行，而通常不是到旧范式的消亡，还会有最后一批保护旧范式的杰出科学家。

在《社会公益服务评论》中，霍沃思（Haworth, 1984）的一篇文章考察了库恩的论点对社会科学的寓意：

> 无论人们是否赞同库恩的历史分析的所有寓意，有个后果是引人注目的。自 1962 年后，不断增长的“范式意识”一直在削弱社会科学家的假定。在压力的驱使下，直觉的、暗含的东西变得更明显……这一过程在前范式阶段的社会科学中更为混乱，在这种科学中，假定通常是不加质疑地借用、武断地学习、顽固地坚持的（P. 351）。

关于范式转换，最全面的陈述可能是由施瓦兹和奥格威在他们的专著《自发范式：改变思维和信念模型》（Schwarz & Ogilvy, The Emergent Paradigm: Changing Patterns of Thought and Belief, 1979）中提出的。他们对广泛的研究
8 领域中正出现的情况做了分析，它们包括物理学、语言学和艺术；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新的整体范式正在出现，它对目前主导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假定和信念构成了挑战。对新范式的追求，最全面地体现在知识换代和古巴、林肯（Guba, 1978; Guba, 1981; Guba & Lincoln, 1981; Guba & Lincon, 1989; Lincoln, 1989; Lincoln & Guba, 1985）在教育领域所做的研究中。这一新范式最初被古巴和林肯明确地表述为“自然主义”范式（Guba, 1981; Guba & Lincoln, 1981; Lincoln & Guba, 1985），尽管近年来，由于“自然主义的”这个词语的一些寓意，他们更愿意称之为“建构主义的”而非“自然主义的”（Guba & Lincon, 1989）。不过，本书在指称新范式和与之相联的研究模式时，我们将继续采用“自然主义的”这个术语。

古巴和林肯的著作和工作对目前这本书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细致地考察了盛行范式的假定和困难，系统地阐述和扩展了新范式的哲学基础和程序建议，为在新范式下的研究配备了初步的保护法典，担起了范式危机时期的主要战役和争论。尽管我们不如林肯和古巴那样明确新范式的精确本质，但我们确实赞同林肯（Lincoln, 1989）的看法：该争论牵涉到“整体范式”的转换，不能靠修补方法或修补孤立的科学研究原理来得到解决。

但是，在本书中，我们不想直接卷入盖奇所谓的“范式战争”（Gage, 1989）之中。这一争论关注的是各种候选范式的合适性，它们旨在取代新范式拥护者称作的“实证主义”（Eisner, 1992; Erickson, 1992; Popkewitz,

1992; Schrag, 1992)。我们对相关文献的理解是,术语实证主义已经变得混乱了,这起因于它的交叉用法:既有最初的哲学含意,也有延伸意义,几乎涵盖了包围在主流研究程序周围的所有常规;有的人把它当作一种要求,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好东西都得满足这个要求;另外一些人用它来囊括几乎所有的坏东西,还有些人把它当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术语打发掉。就我们跟进这场争论的情况来看,我们确信,两方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经常把对方说过分了。出于这一原因,我们一般在文中避免实证主义这个词。

我们也不会在本书中考察对新范式的候选解释,比如教育权威埃斯纳尔 9
(Eisner, 1985)提出的解释或是波克维兹(Popkewitz, 1984)的批判理论。相反,就如我们已经提过的,在书中我们试图采用古巴和林肯提出的自然主义—建构主义模式,提供基于经验的实践指导,用那种模式来做研究。我们也不会攻击实证主义本身,但我们知道,就如马腾斯讨论过的,在多数大学中教导的传统研究常规无法让人类行为研究者系统地提出重要的问题,也无法从实践上获得它们的答案。林肯和古巴的自然主义研究和建构主义很可能不是替换当前常规的唯一合适候选,但我们从经验中知道,它为我们在人类环境中实施有意义的研究提供了可行的原理。本书试图传达一些技术知识,这些知识都源于自然主义范式的候选假定和程序在教育研究中的一系列严肃应用。它打算为另一些人提供一种可转移的基础:这些人要愿意在教育组织中寻求重要的问题,但通常又受到盛行范式的严格性和假定的阻碍。

相关性要求:一些不同的方法

几年前(在自然主义范式得到清楚表述之前),笔者之一是顾问团的一名成员,这个顾问团担当评估大型政府机构的教育规划的任务。该团的任务有一定的安排。团队中笔者的具体任务是对机构做整体的组织分析,其他的成员着眼于客观程序、课程安排、考察活动和指导实践。由于他们的责任很模糊,团队成员采用了他们可能需要的方法,来考察广泛的资料,"看看有什么发生",并且帮助他们理解有关组织。团队成员检查了记录、访谈了各层机构的人员,花了大量时间观察整个组织中的阶层和人际交往。尽管五位成员是独立工作的,每个人遵守自己的进度表,他们有时还是会聚到一块,把笔记进行比较,为开展研究制定后续计划。几乎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各自的调查引出了大致收敛的结论:

1. 越有能力、精神状态越高的人越能积极、热情地完成教育活动。 10
2. 在机构的不同亚系统那里,教育使命的概念有很大的分歧。
3. 结果是,即便组织内的交流很普遍,不同个人和群体的意图良好的行为

经常导致整体的功能失常。

这些结论尽管简单,但都是强有力的,能让该机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清自己。在评估的基础上,团队成员提出了一系列的行为建议,以提升该机构的运行。不过,这里要考虑的是我们可以从对那一评估研究过程的简单描述中引出来的一些观察结论:

1. 顾问团担负的模糊任务被看作是种优点。在任务给出时,绝大多数团员(他们习惯于传统的评估模式)希望它更具体些。不过,更典型的、具体的任务无疑会筛选掉很多被发现的信息。事实上,依事后之明鉴来看,假如没有从这一研究中获得的知识,我们很难想象本来可能预定的评估目标,或是事先本来可能规定的成套检验和仪具;当然,事先规定的那些检验和仪具也可能导出类似的丰富结果。"这里有什么发生?"(可以用多种方式表达),这个简单的问题提供了惊人数量的丰富资料,团队成员能基于自己作为调查者身份的广泛背景来解释这些资料。

2. 从不同资料引出的收敛结论。团队成员从观察非常不同的资料得出非常类似的结论。然而,尽管他们所有人都考虑那一机构及其运行的不同层面,他们都受到同一个通盘问题的引导:"这里有什么发生?"如果他们接受各自领域里的专业意见的指导,问一些具体的、分立的问题,他们会获得一些具体的指标,但它们不会自然地汇聚起来产生一种易理解的、有意义的图景或是行为基础。至少在这种情况中,成绩和能力得分、组织风气指标和指导目的(所
11 有这些都为问题的关键方面规定了具体的、量化的资料),都提供了具体结果,这些结果暗示着,问题和对问题本身的解释有着分散的、冲突的来源。事实上,甚至对于其中的一个维度(比如组织风气)来说,标准的方法本来应该产生一些混合的结果,对于它们的解释有一些有意义的选择。

这里讨论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盛行的行为科学传统的现实观。盛行的科学范式假定,存在着单一的客观现实,可以用五种感官和它们的延伸(如显微镜、望远镜和超声波扫描等)来确定。这一客观现实能被分成连续的、较小的粒子(如分子、原子和电子),它们受一套共同的"规律"支配。由于现实的"建筑基石"在时间和空间中保持同一,受到普遍的科学规律的支配,我们能(至少从理论上)从逻辑上装配和分解、聚合和拆散它们,以及通过观察结果做出一些结论,它们可以概推到具有相同条件和建筑基石的其他环境。此外,由于现实的各单元都是整个现实的部分,因此从逻辑上来说,一项好研究的结果可以添加到其他研究的结果之上。当结果导致不一致的意义时,只能用不恰当的仪具、对仪具不恰当的使用,或是没有得到恰当控制的研究来做出解释。好的调查者,尤其是社会科学中的调查者,加班工作来找到更精确的仪具、更有用的统计程序来处理他们的仪具所取得的资料,或者至少是找到一种更"典型的"环境(更多的时候是找到大量典型的环境,来克服随机错误),让他们的

仅具有用武之地。

新范式提倡一种"整幅布"的现实。也就是说,现实的所有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从其语境中孤立一个方面会严重摧毁它的意义。古巴(Guba, 1981)提到:"假如有人试着只关注现实的某些部分,那么,就如布被剪刀剪开一样,整体就分崩离析了(PP. 77-78)"。另一方面,即便从整体观察布的一角或者是从中间取下的一块,我们通常也能相当精确地预测整块布的性质。这就说明了,例子中的那些团队成员(无论是临床医师、特派教员、早期儿童教员,还是组织分析员)为什么能通过观察一些不同的数据而得出收敛的结论。

然而,新范式也有假定:不是存在单一的客观现实,而是调查者必须意识
到的多重现实。拓展性的调查引向对不同现实的良好意识,而不是向单一现 12
实的收敛。参与这次研究的调查者发现,组织中的不同群体和个人建构了不同的现实,这些现实构成了他们理解组织的范围,并为他们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框架。调查者自己的收敛性结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建构性现实,新的现实是在那些不同现实的基础之上、通过他们内部协商而建立起来的,它为组织中不同个体和群体建构的现实增添了意义。向组织中的个人传达这一新建构的现实,以及新的、更丰富的现实建构,为组织的有关行为提供了基础。

3. 没有原因和结果;相互同时塑造。团队的观察表明了某些广泛的模型和关系,但绝没有表明原因和结果。为什么对于组织任务的理解是支离破碎的,但同时还有很高的士气呢?为什么普遍的交流并没有产生共同的理解?交流少点会带来更好的理解吗?对组织任务的清楚理解会导致较低的士气吗?对于顾问团来说,清楚的是,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天真的和过分简单化的。不过,还有另外一些意见也是如此:假如组织出了点问题,那么引起问题的一个简单原因是可以确定的;这又意味着一个意见:我们能够采用一种简单的、直接的补救措施。就如同整块布一样,被观察到的所有因素都是连在一起的,每个部分都依赖于其他部分。所有部分都互为原因和结果,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把这种情况称为"相互同时塑造"。对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是整体性的,它针对的是组织行为的整个模型,而不仅仅是它的某部分。

4. 不可概推的结果;没有预定的设计;没有学术出版物。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一种极不典型的组织。在这个国家中,也许不存在另一个这样的六人组织,共同研究这一评估活动所要考察的那些特点。此外,对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没有任何的控制,也没有预定的设计(除非来自不同背景的评估团成员所做的设计,他们事先就他们要观察的一般领域达成了一致),没有预先测试和事后测试,没有随机选择。研究设计是在团队的观察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理论不是用于支配资料的收集,而是在资料分析完成后,偶尔用来更好地传达所做
的观察。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受到传统训练的调查者保持高度的紧张。 13

此外,这种研究一般不能看成是一种学术努力。它不能概推到其他的环境;不存在与此完全相似的其他环境。而且,团队成员与环境以及该环境中的人有太多互动,不可能保持他们的客观性。能转移到另一种环境中的所得,只是与支配这样一种研究的一般程序有关的东西。同样,对这一机构运作的深描,为读者确定该研究能否为他们自己的研究提供洞见,打下了基础。无论该研究有多少收获,无论会对它所针对的机构带来多大的影响,许多学术期刊都不愿意刊发这样的研究。

这种研究的非典型本质,很好地表明了盛行范式和新生范式之间的主要差异。尽管这个机构确实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能概推,但它昭示了一条关键的真理:没有哪两种社会环境相似到足以允许彼此进行简单的、全面的概推。没有哪两个原子是完全一样的。当两种社会环境由不同的、复杂的、以多种未限定的方式被关联起来的个体所组成时,不考虑表面的相似,它们还说不上是根本不同的环境吗?传统的调查方法试着只关注那些在不同环境中都出现的、范畴化过的变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范畴化活动掩盖了差异;通过随机选择,这些范畴化过的变量与环境间不确定的关系,得到了“控制”。(所有氢原子都能分成一类;所有椅子都能分成一类;所有三岁大的孩子都能分成一类;所有科学实验室都能分成一类。)新范式的许多支持者,包括林肯和古巴,试着解决这一问题,但不是通过概推的方式来解决。但是那些做概推的调查者更喜欢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他们的作品。不过,对于语境所独有的复杂问题,有意义的答案是不能在不同人类环境中概推的。马腾斯在发现他自己被学术运动心理学和实践运动心理学分裂时,提到了这一困境。正是实践运动心理学为有意义的问题提供了信息。现实问题永远出现在具体的语境中,尽管引出解决办法的有关资料可能有不同的来源,但它们的解决办法永远受到这些语境的制约。

14

范式、假定和对研究的寓意

就如这一简短的案例回顾所指明的,关于现实、客观性和概推,盛行范式和自发范式采用非常不同的假定。这些不同的假定对于开展调查的方式有重要的寓意。在本节,我们会对两种范式的不同假定做一下评论,并且简要地考虑一下它们的寓意。

就如前面提过的,盛行的范式假定,存在单一的客观现实,能靠五种感官得到确定,受到普遍的科学规律的支配,能用心灵的逻辑过程来把握。从这一基本假定可以推出一些结论。首先,知识积累是递增的。当某人遇到新的信息时,就需要对它进行评估,以确定它如何符合先前的知识和理论。与以前的

知识不一致,或者意味着当前的资料有问题,或者过去的资料有问题,或者连接它们的理论有问题。一般情况下是假定新资料有问题,除非出现压倒性的证据,我们才假定现存的知识或理论有问题。从第一个结论可以引出第二个结论,积累知识的过程是自我修正的。逻辑错误、随机错误和不恰当的资料,是需要用改良的逻辑、增加的样本量或进一步的研究来克服的问题。理解力的差异能用下述方式得到解决:填补个体的知识鸿沟和修正他们的逻辑错误。

不过,自然主义范式假定,存在着多重现实,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不能通过理性过程或增加资料来解决。事实上,沿先验途径所做的扩展研究会产生更大的资料发散;仅当现实的所有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被把握到了,才会产生收敛。因为现实的所有"部分"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就能通过对任何一部分做整体性的调查,来开始我们对"整体"的理解。"理解整体",我们指的是对定义它的那些相互关系的可用理解。这就说明了,就顾问团成员们所观察的机构,他们为什么在孤立的情况下,通过提出相同的基本问题("这里有什么发生?"),得到了收敛性的结论。然而,尽管他们的结论收敛了,但它们并不是同构的,记住这点很重要。其实它们之间有差异,就如当不同的观察者在看着不同的资料时,你可以预料到的情况一样。但他们不是试着去解决这些差异,而是通过比较这些独立的观察,他们注意它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共同意义。这些独立的观察不是提供全等几何图形似的整齐而贫乏的图 15
片,而是提供具有广泛的、不定边界的组合图,但是反映了机构内相互关系的丰富的核心意义。这些丰富的核心意义的根据很广泛,为有关行为提供了基础。多重现实放大了彼此的意义;把它们强行塞入单一的精确定义中,就会削弱意义。

客观性是传统研究的目标。然而,就如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指出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假象。在研究人类行为的过程中,试图用不同的保护措施来维持客观性,这种做法不但无法保全资料不受污染,反倒会不可避免地阻拦调查者探索资料的最重要的方面。马腾斯(Martens, 1987)是这样阐述这一点的:

> 有多年经验的教练和运动员要退休,而且不能以某种系统的方式记录他们的经验,在我看来,是知识的巨大损失。尽管名声更大的人可能会写他们的自传,但是,比如说,如果有人花一个月的时间采访伍登(J. Wooden,著名篮球运动员,有"美国现代篮球之父"之称——译者注),试图发现他对运动心理学有何心得,我们的所得要大多少啊?用你作为运动心理学家的能力问一针见血的问题,用你的隐性知识寻求模型,比起你在实验室做另一个2×2的阶乘积研究,这样的一次访谈带给你的所得要大多少啊?我们大多数人乐于寻求这样的知识,因为收益会很大。然而,现在我们却拒绝这样的研究,只是因为它没有实现客观性这个教条,因此被看作是不科学的(PP. 50-51)。

自然主义范式肯定了调查者和回答者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但也没忽视反作用的危害。然而,形式的方法不能用来割裂调查者和作为研究核心的人类互动。要获得人类活动的相关素材,调查者必须参与那一活动。成见和反作用的危害很大;而从有关资料中隔离开来,危害更大。调查者必须设法控制成见,不让它们遮蔽相关的信息。不能为严格性而牺牲相关性。

盛行的观点是,科学依靠积累可概推的知识而进步。然而,就如上面指出的,完全的概推是绝不可能的,即便是在物理科学中。非概推性原则对于社会
16 科学中的研究来说,甚至更为恰当。跨社会环境的概推取决于资料的聚集,但这一做法又经常忽略了语境所独有的相互关系,而那些资料的意义正是这些关系赋予的。自然主义范式的支持者认识到不可能做概推,对被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他们只满足于在它们自身的语境中寻求一种深入的理解和阐释。跨社会语境的理解转移,取决于对一社会语境中一套相互关系的深描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对另一社会语境中用于指导研究的"工作假说"(Guba, 1981)的系统阐述。

古巴(Guba, 1981)考察了自然主义范式的假定为调查提供的主要寓意。在我们对顾问团的活动的简短回顾和我们稍早的讨论中,大多数寓意就显而易见了。我们会在全书中发展每一个寓意。我们把他的列举清单作为概要在本章摆出来,并且作为后面章节的导论。

1. 尽管质性的和量化的方法都能用,但一般来说,质性的方法优先,主要是因为它们能收集那些显示与其语境相互关系的丰富资料。

2. 尽管在调查中相关性和严格性都很重要,但相关性更重要。

3. 扎根的、自发的理论优先于先验理论。所有理论必须在得到应用前的某个阶段建立自己的根据。

4. 以不同的方式对待隐性知识(包括直觉、统觉或感受)与命题知识(用语言明确表达的知识),但基础要相同。

5. 尽管调查者可能使用各种各样的仪具来搜集资料,但首要的调查仪具就是调查者。

6. 调查设计出自调查本身。

7. 自然环境永远优先于实验室或受控环境。

自然主义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

自然主义研究非常依赖于语境。这源于它的基本假定,即,这类研究的所有对象是靠复杂的、独特的相互关系之网关联在一起的,而这一相互关系导致

了前面描述过的相互同时塑造。相互关系的这种复杂网络提供了一种语境，它同时既限制、又扩展了研究的适用性。一方面，向其他环境的完全概推已经变得不可能，因为没有哪两种语境是完全相同的，试图把语境的一个部分概推 17
到其他的环境，忽略了存在于每种语境中的独特的塑造力（shaping force）。另一方面，自然主义所揭示的语境的复杂性能应用于人际环境，而遵循盛行研究策略的大多数研究则不可能做这种应用。

尽管自然主义研究从来不完全地描述或解释一种语境，但好的自然主义研究比盛行的研究策略更能做出接近完全的解释。应用有两种类型：我们能获得指导，用在将来处理相同的环境，或者用来进一步研究相似的环境。尽管做不到完善，但对一组织或社团的未来行为的最好预报就是它今天的行为。类似地，对语境 A 的广泛理解使我们能对语境 B 中的相似和差异做出有用的判断。

就如我们中的一位作者在别处（Erlandson，1992）指出的，语境为理解社会环境以及做出有关的预测提供了强大的力量。他描述了四次经验，在他看来，它们尤其表明了语境的力量。其中一次经验事关一套案例研究的写作。这些案例研究建立在一些资料之上，后者源自于不同社会环境中关键的人力资源，并且还得到了文献资料和记录资料的丰富。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调查者改变了名字，掩饰了场所，还采取了其他步骤来确保回答者的匿名性。不过社会语境中出现的基本关系保持不变。在完成一个案例研究的草案后，调查者要求每个主要的回答者来阅读案例，看看它是否忠实地描述了事情的发展过程。主要的回答者、甚至处于争辩中的对立双方，几乎毫无例外地报告说，调查者确实把握到了案例的本质。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描述性的案例研究把回答者重新安置到他们早期经验的语境中，激发了最初的情绪和判断。作为争论双方的回答者都认为，案例确认了他们采取的立场。

同一篇文章还报告了其他经验，它们进一步证实了语境对于理解人类环境的力量，它有助于做出与社会语境相关的预测。其中一次经验是用社团权力结构研究来预测学区将来的事件。对社会语境做详细的描述，有助于对将来的事件做出令人惊讶的精确预测。另一次经验是，研究生在先浏览那些描述学校组织这种社会语境的资料后，能正确地回答有关这类组织方面的问题， 18
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在这方面没有详细的资料）。最后，这位调查者惊喜地发现，在他对一个组织做了自然主义研究（但从没做正式的报告）的十年后，另一个自然主义调查者做了独立的研究，而且也没参考他的研究，却得出相同的解释，并且证实了他的预测。

语境既限制、又丰富了解释。当语境不断趋向更大的专一性时，解释就受到限制；同时，专属语境的细节聚集在一起描述了一套复杂的关系，把调查者或读者替代性地带入相关环境。这本关于“做自然主义研究”的书所致力的，

正是这样一种既有精确性又有多样性的激动人心的冒险。

进一步的研究

1. 从最近的期刊中，包括《美国教育研究期刊》(*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教育管理季刊》(*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社会工作服务》(*Social Work Service*)，或其他学术期刊中挑选两篇使用了大量量化资料库的论文。读完后，想想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可以对结果做何处理。然后再从赖特弗特的《好中学》(Lightfoot，*The Good High School*，1983)中挑两篇中学"描摹"，同样想想可以对结果做何处理。然后比较一下你的答案和其他答案。从两种研究类型中，你各学到了什么?

2. 开始为你指导、开展或作为调查团队成员参与的自然主义研究拟定计划。现在用你所有知识和背景来设计该研究。首先，以提出两到三个基本问题开始，比如说，"这里有什么发生?"或"为什么事情是这样的?"或"你如何理解这里的事物?"随着本书的展开，在从书中所得、书外所得和你可能获得的任何额外背景的基础上，对设计做出修改。

3. 对盛行的实证主义范式和自发范式(包括自然主义-建构主义研究)间的详细区别的深入阐明，你可以参考《范式对话》(Guba，*The Paradigm Dialog*，1990)的第1章。

19 注 释

① 《盯着你的鱼看》是史卡德在1874年写的，从McCrimmon(1968)中抽出来的，见PP. 74-77。1968年得到授权后由Houghton Mifflin Company重印。

研究过程：一些基本的考虑 2

在第 1 章中，我们提到了史卡德对他在阿格西的指导下如何学会做研究的描述，因为它很好地示例了一种基本的谦卑态度，这是每位调查者都应该有的，想想看，他（她）要知道的有多少，而他（她）知道的又是多么的少。在史卡德与鱼呆在一起的那一周的尾段，他才开始了解到无生命物体的复杂性。因为我们的这本书聚焦于人类环境和互动的研究，远比史卡德的鱼要复杂得多，因此，我们认为调查者更要持基本的谦卑态度；另外还要有一种意愿：当研究启动时，愿意去学习他们从没想到可以学习的东西。

代表各自范式立场的优秀调查者，对其调查领域的深度与复杂状况，抱有类似的敬畏之情。然而，对于常规的调查者来说，问题尽管非常困难，但仍旧能以一种相对直接的方式得到研究。对于他们来说，现实是单一的、可以得到融贯理解的一块，我们能把它系统地划分为部分和亚部分，我们能用五种感官及其延伸（显微镜、望远镜、超声波扫描图）来把握它们。由于这些部分是整体的离碎片段，当需要的时候就能够把它们重新聚合在一起。通过对这些部分的考察，我们能够逐步积累知识。我们可以把习得的每个新知识片段放到 21
先前知识系统中的适当位置，为新的知识增长指出方向。

对于自然主义调查者来说，这种直接的知识积累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断定，人类必定是在他们自己建构的现实里面活动的。此外，任何两个人所建构的现实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意味着，调查者把某些现实建构带入他们的调查环境，而且在这种人类环境中，调查者从其回答者那里找到其他的现实建构。当他们试着把其发现传达给研究团体或一般大众时，他们面临同样的困难。对于自然主义调查者来说，研究过程变成了发展和证实共有建构的过程，能有意义地拓展知识。本章将讨论建构、传达和证实现实的过程，以此来推动研究。

建构和传达现实

说两种不同母语的人们之间的尝试性交流,也许最好地提供了建构性现实的证据。只有从没试过与不同母语的人进行深入交流的天真观察者,才会断定,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只是把两种语言中所有等值的词语进行配对。萨佩尔(Spier, 1947)和沃尔夫(Whorf, 1956)数年前就清楚表明,一门语言既塑造把该语言作为母语的那些人的经验,又被这种经验所塑造。大多数美国人非常习惯于用一个词语来表达雪;而根据布里森(Bryson, 1990),爱斯基摩人使用五十多个不同的词语。我们看到的是雪,爱斯基摩人"看到"(即,理解和整合)的是不同事物,它们取决于正在使用的是哪个词语。阿芝台克人生活在温暖一点的气候中,他们用同一个词语表达"冷"、"冰"、和"雪"。在霍皮语中,与我们的名词和动词相当的词语,由它们的音长得到区分;名词用较长的音长表示,动词用较短的音长表示,因此,"lightning"、"flame"、"meteor"、"puff of smoke"和"wave"是动词;"cloud"和"storm"刚好跨过音长的门槛,可以划分为名词。此外,霍皮语并没有数学意义上的时间,也没有与"速度"或"质量"相当的词语。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似乎摧毁了建构一种融贯的宇宙图景的可能性。但霍皮语确实有一种融贯的宇宙观,它是根据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经验
22 来建构的(Whorf,1956)。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一种范畴化体系并不比另外一种更"自然"。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当然难以理解支配霍皮语分类体系的逻辑,但这证明了一个关键的要点:我们所说的语言决定了我们的经验,反过来又受到我们为理解我们经验到的那个世界而建构的范畴的驱动*。

海伦·凯勒(Keller, 1954)在她的生活故事中精彩地描绘了语言与现实

---

*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结论还有待商榷,但这里提到的一系列事例都是错误的。首先关于沃尔夫对语言的研究。除霍皮语外,他还研究了阿帕契语,研究结论与对霍皮语的一样,就是本书中提到的那些。但是包括著名的语言学家平克等不少人指出,他没有做真正的研究,还用不合文法的方式翻译这些语言,见 Pinker, S., *The Language Instinct: How the Mind Creates Language*, 1994, PP. 59—60。人类学家马拉斯基对霍皮语做了真正的长期调查研究,发现霍皮语是有时态的,还有一系列如同我们文化中存在的那类时间比喻,包括昨天、今天、明天在内以天为计时的单位,也有周、四季、年等大尺度单位,见 Malotki, E., *Hopi Time: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Temporal Concepts in the Hopi Language*, Berlin: Mouton, 1983。另外关于爱斯基摩人的雪。他们一年四季都生活在雪的世界中,即使真有那么多词语表达"雪",也没什么大惊小怪。不过,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词语!人类学家马丁指出这是一系列以讹传讹造成的结果,其实最初只是说有4个,后来一步一步夸大,导致了那些骇人听闻的数据(从9个到400多个),见 Martin, L.,"Eskimo Words for Snow: A Case Study in the Genesis and Decay of an Anthropological Exampl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88), 1986。语言学家普卢姆指出了产生这一后果的原因,见 Pullum, G. K., *The Great Eskimo Vocabulary Hoax and Other Irreverent Essays on the Study of Langu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译者注。

建构之间的关系。她很小的时候就变得又瞎又聋,直到七岁遇到沙利文女士,她才学习语言。当沙利文女士在海伦的手腕上敲出词语时,海伦发现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硬的陶瓷的东西,另外一个是柔软的棉的东西)都包括在词语 D-O-L-L 内。她困难地发现,W-A-T-E-R 必定与装它的 M-U-G 不同("doll",玩具娃娃,既有棉布做的,也有陶瓷做的。"water",水;"mug",杯子——译者注)。学习爱这样的词语,时间稍长一点,但是在学习它们的过程中,她建构了一种现实,这种现实立即把普遍的、文化的和个人的经验结合到完全属于她自己的理解之中。她提到:

> 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名称,每个名称催生一种新思想……我记得 1887 年夏天在我的灵魂突然觉醒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什么也没做,只是用我的双手探索,学习我接触到的任何对象的名称;我接触事物、学习它们的名称和用法越多,我和其余世界之间的快乐自信的亲切感就越强烈(P. 36-37)。

皮亚杰(Piaget, 1950)从相反的角度描述了语言和经验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形式体系只是次级操作系统,因此是对具体编组的一种编组操作"(P. 152)。语言和经验间的关系是双向道。就如海伦的描述清楚揭示的,只有被语言塑造,经验才有意义。皮亚杰指出,没有经验基础,语言是空洞的。具体操作的发展阶段连接了两者。随着在词语结构上建立词语结构,在建构上建造建构,更高级的形式操作阶段就使思想得到发展。没有语言,不仅交流不可能,而且通常意义上的"思考思维"的能力也不可能。词语使经验的建构和传达成为可能,这是因为词语对经验做了分类。然而,词语同时也通过简化和固定经验而塑造(歪曲或摧毁)经验。大众语义学家,比如说科尔布斯基(Korzybski, 1958)和哈雅卡瓦(Hayakawa, 1978)对此作了大量的阐述。词语便士描述一组对象,它们有个共同的主要特征:它们在我国货币系统中代表通用的流通单位。除此之外,它们一般都是褐色的,用金属制成,是圆形的,而且有两面——通常称为"正面"和"反面"。但它们是相同的吗?实际上并不相同!它们上面有不同的日期;它们有不同的使用和腐蚀阶段;它们甚至有稍微不同的重量。同一天制造的两枚便士并不相同,甚至从铸币厂出来的那一天就是不同的。大众语义学家会说,"便士 1 不是便士 2。"词语简化了包含在世界上所有便士中的大量未结构化的经验,它们同样通过忽略我们分类过的对象中不断发生的变化来固定现实。密西西比河不是十年前的那条河,史密斯也不同于十年前那个十多岁的小伙子。事实上,两者自过去以来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不过,对于我们的大多数目的来说,无论是用来购物还是抛硬币做决定,词语便士告诉我们实际想要知道的任何事情。同样,史密斯(和围绕这一名称所生成的建构性现实)包括他家人和朋友为了联系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这才是关键!我们"想要知道的"和"我们需要知道的"决定了分类系统,而后者又被我们用来决定语言、因而决定我们赖以生活的现实建构。 23

低层抽象描述的是具体的经验特征。它们可以编组到高层的抽象，反过来，后者又能编组到更高层的抽象。比如说，“这枚1954年的脏便士”能划分到便士之下，后者又能包括在更高的抽象硬币之下，而硬币又能划分在钱之下。同样，史密斯能够划分在男人之下，男人又能划分在人之下。随着我们在抽象阶梯上前进，范畴变得越来越广泛，但是初始经验的特殊性不断减少。

与语言建构经验的方式相同，它使我们能在其他的建构之上来构造建构（皮亚杰会把这看作是形式操作）。当这发生时，人类心灵设计出各种塑造经
24 验的方法，它们能使个体更好地适应经验。共有建构为人们间的交流提供了基础，共有经验以及经验交流产生更多的共有建构。人类群体中总的共有建构构成了其语言和文化的基础。当人们试图与其他人进行交流时，如果共有建构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语言和经验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看待研究的开展有重要的寓意。因为我们是用语言来思考，因为词语不可能说出任何东西，因此，我们解释经验和与他人分享经验的能力受到这些建构的总量的限制。我们总是能够学到更多，而且我们的建构能帮助我们学到更多，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学到一切。即便我们有无限的时间，因为我们的语言只关注经验的一些特定方面，来使它们变得可理解。如果词语和词语结构并没有建构现实，它们就是无用的。通过塑造经验，它们过滤掉对于交流来说显得不必要的信息。假如有些人的经验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塑造的，那么词语与词语结构就会使得他们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出于这一原因，调查者努力去与他们正调查的人类环境中的那些人分享建构，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些共有建构不需要完全一样；事实上，它们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它们必须是相容的，这样交流才会发生。发展这些相容的建构，将指导自然主义调查者进行大量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同样，自然主义调查者必须注意发展与该研究的目标听众相容的建构。就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原因同样也说明了为什么自然主义调查者要运用深描。提供描述——不是对汇集在一起的资料的描述，而是对特殊经验的描述——的低层抽象被大量地运用，以使描述尽可能地吻合实际的环境。正是深描把读者替代性地带入调查者所描述的那个环境，因此为共有建构铺平了道路。

我们看到的那些描述性语言专家（主要是与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学家一起工作的那些人）的工作给我们留有深刻的印象，我们认为，他们的工作非常类似于自然主义调查者的工作，而且能为后者提供指导。有几次我们看到一位语言学家与语言完全不通的人进行接触。我们观察到，这个语言学家使用了
25 音标工具，而且指着对象说出词语，来引发行为、暗示关系、发展与语言完全不同的人之间的交流。由于我们看到的示范一般都很短，因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语言学家居然在半小时内就能“顺畅地”适应先前未知的语言。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发展一种书写语言并把信息译成那种语言，是一个长得多的过程。

那个语言学家需要花数小时与说当地语的关键人物呆在一起,在吃饭、工作、与他们玩耍、教他们阅读新的书写语言的过程中,发现他们言语中的细微差异。当翻译工作完成后,语言学家就开始另外一个长期的阶段,在此阶段,掌握新语言的当地人检查那位语言学家的翻译,确定它所激发的图景与当地语的图景是否相同,或者至少是否相容。建造共有建构的过程在语言学家的工作中从始至终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为建立自然主义研究的可信度而描述的过程,惊人地类似于那位描述性语言学家为先前未知的口头语发展书写语言时使用的过程。这位语言学家就像自然主义调查者一样,必定以回答者能证实的方式重构了后者的建构。要做到这一点,语言学家和自然主义调查者必须走出他们自身,这样才能以回答者的角度来观看生活。当他们的资料以回答者能接受的方式得到重构后,他们必须提供一种翻译或报告,为其他人(没有参与原始调查的人)的类似建构提供帮助。

当不同文化和环境的人彼此接触时,他们开始分有彼此的建构性现实。这种分有绝不是直接、明晰地交流初始建构;它是由许多早已有的现实塑造的,而这些现实是每一群体在他们的总体经验和两群体的关系上建构的。共有的建构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为将来的活动和群体间的关系提供了结构。鲍尔(Bauer, 1992)注意到了发生在西班牙塞拉考罗居民和外地人之间的这种过程。在第一次访问这个区时,鲍尔遇到了当地的一群妇女:

> 当我能在广场上看到她们时,我挥了挥手,对她们说:“你们的村庄真漂亮。”当地居民中有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年长妇女,站在附近的一个门廊旁看着
> 我走近,听到我的话后突然向我冲来。她咆哮着说:“你喜欢这个地方?好, 26
> 你可以拥有它。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拿你的地方与我的交换。这是一个丑陋的地方,我们在这儿的一切就是艰苦的工作(P. 571-572)。”

在语言塑造经验的同时,共有的建构塑造了个体和群体内的关系。鲍尔进一步提到,考罗人和外地人、尤其是西班牙统治精英里的成员,他们间的历史关系如何为考罗人塑造了自我的意象和区域低劣的意象。反过来这些意象又支配了考罗人与外地人的关系,并被村里的发言人当策略使用,证明他们受到了政府的压迫和抛弃,以此为他们的社群获取利益。

关于考罗人与外地人的关系,鲍尔的看法提供了一种洞见,能帮助我们了解,当不同文化、环境、甚至个体的建构性现实开始彼此接触的时候,会有什么发生。当有外人闯入时,没有哪个人或哪个群体的早期建构会保持完整。调查者必然会干扰被研究的环境和人。因此,他(她)不可能不给研究环境带来新的现实建构。调查者对环境和其中的人们的理解越深,他(她)自己的建构就越受到影响。对此有认识的自然主义者并不打算把他(她)自己从环境中分离出来,而是寻求建立一些关系,通过这些关系,建构间的相互塑造就成了

一种协作性的练习，是调查者和回答者自愿参与的练习。

对于新的自然主义调查者、以及不幸的是对许多老练的调查者来说，“谁的建构性现实是正确的”变成了一个核心问题。在这本书中我们有几处提到怀特的经典社会学著作《街角社会》（Whyte, *Street Corner Society*, 1943）。对于研究城市环境的社会学家来说，这本书五十年来一直是一种参考标准。不过，许多年后博伦（Boelen, 1992）回访了康纳维尔（cornerville），访谈了原来为怀特提供信息的人及其家庭，并且提出了一种解释，否认了怀特的许多发现，质疑了怀特的方法论和研究的伦理准则。一九九二年四月，《当代民族学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整期刊发了怀特和博伦间的争论，
27 另外还包括其他社会学家和怀特研究的一个原始参与者的评论。如果我们不了解定义“正确”的语境，也就是说，不了解“对于什么目的而言是正确的?”，我们就很难知道哪些建构性现实是正确的。就如沃尔夫指出的，霍皮印第安人的宇宙观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似乎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他们“知道”是正确的事物；然而，它与霍皮人关于他们经验到的那个世界的“所知”结合得很好。

维迪克（Vidich, 1992）关于怀特—博伦争论做出了一个平行的观察：

> 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催生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及其分析从其本身来说就变成了一种现实：这是观察者—分析员的现实。几年后，博伦发现康纳维尔的信息提供者不同意怀特的现实，这并不意味着怀特的现实就是错误的，或是可疑的，而只是认识到，不仅仅只有一种现实（P. 89）。

登兹（Denzin, 1992）在同一本期刊中谴责了怀特和博伦，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一种解释是正确的，而另一种解释是错误的。他说到：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存在一种终极的真理或终极的讲述。有的只是组织在同一个故事题目下的不同故事的不同讲述；在该案例中，是怀特关于康纳维尔的故事。现在我们有同一故事的两种不同版本，在新的讲述中它变成了一个不同的故事（P. 124）。

登兹认为怀特和博伦都坚持单一的现实，坚持要证实各自理论的正确或错误。这表明他们依附的是一种传统的认识论，该认识论否认不同建构性现实的合法性和价值，以及间接地否认建构它们的那些人的语言、价值和概念化原则。

在对怀特—博伦争论的反思中，理察德森指出，“对于我来说，一个持续的困惑是，如何做社会学调查、如何写调查，才能做到尊重和赋权那些告诉我其生活的人，即便他们和我以不同的方式观看他们的世界”（Richardson, 1992, P. 108）。

这是自然主义调查者的一个迫切关注。语言是一笔珍贵的财产。它提供

了我们用以组织世界的概念宝库,提供了我们为经验配置结构的工具。因为语言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为处于相同文化中的人们与跨文化的人们之间提供了连接纽带。当我与自己家里人说话时,我能合理地断定大量的共有 28
建构(尽管即便在这里,我也经常惊讶于差别和含糊)。当我与背景完全不同的人接触时,共有建构的发展变成了第一个主要步骤。如果我要在人类环境中做一项调查,我必须与环境中的合作者(回答者)发展共有建构。只有以这种方式,用理察德森的话来说,才能做到"尊重和赋权"(Richardson, 1992, P. 108)那些乐意让我进入其世界和乐于告诉我有关信息的人。

建立可信度

如果理智研究要对人类知识造成影响,或者通过增加整体知识体系的方式,或者通过解决具体问题的方式,那么它必须确保某种可信性标准,使研究结果符合这种标准;它必须以一种方式进行交流,使它的目标听众能够应用它;它还必须让听众能够检查它的发现和获得发现的那种研究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大多数读者都熟悉盛行的调查方法论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一般做法;第 1 章对此做了简述。然而,由于别人教导我们去敬重这种方法论,我们忘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社会场合要求我们慎重地做出决定,来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交流、证实和应用"真理"(或至少是某种被当作真理的东西)。在本章中我们将简要地描述一下判定任何调查的可信度的标准。它们为后几章描述的方法和程序提供了基础。在第 7 章中,我们会再次评述一下如何能把这些标准结合进自然主义的研究中。

比如说,我们认为社会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犯罪嫌疑人有"权"让那些既倾听证实他有罪的证据、也倾听证实他无罪的证据的陪审团决定他(她)是否有罪。同样,美国最高法院在确定宪法和法律条文的意义时,不是通过查看各种变量,而是通过考虑宪法原理、先前的法庭决议、公平和社会影响的复杂模型而做出的。或者考虑一下我们选举统治者的方式。"真理"是靠最多数的投票定义的;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就重新计算票数来验证。在"自由市场"中,经济体系的一个基本根据是,"真理"是靠买卖双方谈判决定的,其中 29
任何一方都不能看作是一个无偏见的参与者。(考虑一下许多社会主义经济学在这种语境中的失败,它们试图通过合理的计划来决定这样的"真理"。)不过,这些解决实际问题的所有公认模式具有一些共同点:它们事先确定①如何决定"真理"(大多数人投票、陪审团决议、供给和需求);②如何交流"真理"(大多数人意见,裁定,价格标签);③如何查出和纠正错误(上诉过程、未来的法庭决议、价格调整)。

这些程序为它们针对的问题提供了完善的答案吗?绝对没有。即便最没

有观察力的社会成员也很可能看出，在很多场合中，这样的程序都没能提供理想的答案或解决办法。不过，它们都持续了数年。很少（前面提到了一个例外：对市场决定价格发起的社会主义挑战）有人严肃地提出，我们应该用理性主义的研究取代这些程序，前者会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方式收集和分析信息，而该方式能产生客观的“真理”——有确定的概率是正确的。不过，在学校组织和其他社会环境中做研究时，这实际上是累赘，通常是我们给自己添加的累赘。

不过，在任何领域，有效的研究必须对上面提到的顾虑做出回应。它必须证明它的真值，为它的应用提供基础，允许对其程序的融贯性、其发现或决定的中立性做外在的判断。古巴和林肯把这些组合在一起的品质称为“可信度”，而且在他们的各种著作中描述了如何评估可信度，以及如何增强自然主义研究的可信度（Guba, 1981; Guba & Lincoln, 1981; Guba & Lincoln, 1989; Lincoln & Guba, 1985）。在全书中，我们会把他们的体系作为基本的方法加以使用和发展，我们认为，利用这些方法，我们能为自然主义研究提供可信度。

可信性

任何研究都会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环境做出一定的发现，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这些发现是“真”的（Lincoln & Guba, 1985,
30 P. 290）。在盛行的调查范式中，真值是靠内在效度刻画的，也就是说，靠研究资料和那些资料表征的现象之间的同构关系刻画的。然而，由于自然主义研究不做单一客观现实的假定，因此，对同构性的客观判断就没有任何意义。更切题的是，回答者心中的建构性现实与归属给他们的现实之间是否一致。这种关系称作可信性。

要为提供研究资料的个体和群体建立可信性。其评估方式是，确定一具体环境中的研究描述对于该环境内的成员来说，是否“听起来像真的”。因为这些人代表不同的建构性现实，可信的结果是恰当地表征这些现实收敛和发散的领域。可信的研究一般对读者有影响，为他们提供一幅组合图像，该图像在明确的边界和特殊的关系方面显得不精确，但在提供深入的意义和丰富的理解方面，显得非常丰富。

因为建立可信性的主要问题是解释研究环境中的建构性现实，因为这些现实存在于环境中的人们的心中，所以调查者必须留心去获得对这些现实的全面、广泛的解释，并且这种解释要能得到他们的证实。古巴和林肯在各种著作中，为实现这一点建议了一系列的策略。这里只对它们做简要的考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做进一步的发展。

长期涉入。调查者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呆在研究语境中，以避免一些歪曲，这些歪曲可能源自于他（她）对语境的影响、他（她）自己的成见，以及不常见的或季节性的事件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呆在语境（文化）中的“充分”

时间：充分到使调查者能以该文化成员（即，本地人）的方式理解日常事件。

持久观察。不过，尽管调查者或许能够以语境成员的方式理解其中发生的事件和关系，除非调查者能识别那些对于解决一具体问题最相关的事件和关系，否则不要在任何高智力的“当地人”的讲述上添油加醋。要达到合适的深度，只能坚持以不同的方式寻求解释，并且不断地做尝试性的分析。 31

三角测定。对于存在于研究语境中不同的、离散的现实建构，引出它们的最好方法也许是从不同的角度收集不同事件和关系的信息。在语境中，对一个主题持完全不同观点和理解的人，调查者应该仔细地找出来。直接从个体的陈述中获得的资料，应该利用观察到的行为、不同的纪录和文献来加以核实。调查者应该用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来源和不同的方法来关注相同的资料集。还应该考虑候选说明。

合适的参考材料。由于所有资料都必须在它们的语境中得到解释，因此，收集材料，对语境提供一种整体的看法，这是极其重要的。录音带、文献、照片和任何其他的材料都反映了研究语境中的“片段”，提供了一种支撑背景（supportive background），有助于读者更好地基于语境来理解调查者的分析和解释。

同侪报告。有时候调查者应该走出研究语境，与语境外的专家一起评论他的感觉、洞见和分析。当然，这些专家要对研究的本质有充分的一般性理解，能把这种理解报告给调查者，并能提供反馈，以改进、通常是重新定向研究过程。

成员核对。由于将要收纳的现实是研究语境中的人们或者个体性地、或者集体性地建构的，因此有必要让那些人证实所获得的资料和解释。只要不能通过成员核对的证实，研究所得的资料就不能收纳进来。

可转移性

对研究的判断，是看它的发现在多大程度上能应用到其他的语境或其他的回答者身上（Lincoln & Guba, 1985, P. 290）。运用研究的发现总是需要对适用性进行评估，这是因为，即便具体语境中的研究只是为了指导该语境在一个持续的时间框架内的操作决定，但时间会改变语境和语境中的个体。例如， 32
对一所中学的运行的评估性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用来指导下一年的决定，其限制在于：研究发现与学校下一年的状况有多大关联。随着语境中的人们、他们的现实建构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即便个体不变），语境也随时间而变迁。当发现做跨语境的应用时，适用性的问题就更加突出。调查者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或者关注语境内或跨语境中保持不变的研究方面，或者以一种允许语境转变的方式来解释发现。

大多数当代调查者用概推度来解释适用性，而且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们只关注跨语境中那些不变的方面（或在可能性限度内的转变）。无法与某一

系统模型关联起来的跨语境变异(成见)被看作是随机发生的,而且它们的分布符合一条常规曲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对目标群体作随机选择;它允许在特定的犯错概率内进行跨群体的概推。不过,自然主义调查者认为,没有哪种真正的概推是实际可能的;所有观察都受到它们出现在其中的具体语境的限定。

随机变异假定仅仅意味着,无偏样本(如果真能获得这类样本的话)中的预期(没有保证的)变异与群体中的变异是一致的。这种工作对于评估简单的参数(比如说,投票权优先)当然很合适,但要对群体中(比如说,导致投票权优先的因素网)复杂的相互关系做更为复杂的评估,那么语境的差异就被放大,概推度很快坍塌。

不过自然主义调查者并不认为,从一种语境中获得的知识对于另外一种语境没有意义,或对于处在另一时间框架中的相同语境没有意义。跨语境的"可转移性"可能源于共有的特征。然而,知识转移的基础来自于完全不同的起点。自然主义调查者不是要从不同语境中挑选出相同的、独立的变量,而是要非常详细地描述研究语境中的相互关系和错综复杂之处。这样,研究的结果就是一种描述,不能随意复制。不过,已经生成的"深描"能使其他语境的
33 观察者临时判断某些观察对于他们的语境的适用性,有助于他们提出"工作假说",指导在那些语境中的经验研究。这是一种重要的区分:在传统研究中,调查者有责任保证发现能概推到群体;在自然主义研究中,证明可转移性的责任属于那些要把它应用到接受语境(receiving context)中的人(Guba & Lincoln, 1989,P. 241)。在记住这点的前提下,这里提供推动可转移性的两种策略建议。

深描。因为自然主义研究中的可转移性取决于发送语境(sending context)和接受语境的相似性,所以调查者要收集语境中足够详细的资料描述,以足够细节和精度报告它们,以期能够对可转移性做出判断。有效的深描把读者替代性地带入被描述的语境中。对详细的视觉、声音和关系的描述,在读者心中创造了可以非常接近于直接经验所获得的情景。我们通常发现,通过有效的深描第一次接触某一环境的个体,有一种超时空的身临其境的感觉。

立意抽样。由于可转移性的基础是对发送语境的充分描述,因此对资料的搜集必须受到一些过程的指导,这些过程要能提供丰富的细节。随机抽样方法经常用在传统的研究中,透过诸多聚成的性质来获得一幅具有代表性的图景,与之相反,自然主义研究寻求具体信息范围的最大化——这种信息既源自于语境,又是关于该语境的。这要求一种抽样程序,它受到一些自发洞见(判断什么是与研究相关的东西)的支配,它有意地寻求这些洞见所建议的典型资料和离散资料。

可靠性

一项研究还必须同时向它的听众表明,如果用相同的或相似的回答者

(对象)在相同的(或相似的)语境中做这项研究,它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Lincoln & Guba, 1985,P.290)。研究必须满足融贯性标准。

在盛行的调查范式中,这一品质体现在对可靠度的关注中,可靠度指的是
一项研究(或仪具)的融贯性、可预测性、稳定性或精确性。可靠度的建立取 34
决于复制,一个假定是,把相同的或对等的仪具重复运用到相同条件下的相同对象,就会产生相似的量度(measurement)。可靠度是效度的前提条件;如果复制产生不同的结果,那么就不能断定观察和现实之间的同构关系(Guba & Lincoln, 1989, P.234-235)。

然而,自然主义调查者认为,观察到的不稳定性不只是可能归结于错误,同样可能归结于现实的转变。因此,不应该寻求不变,而应寻求"可追踪的变异"(Guba, 1981),能找到具体起源(错误、现实转变、更好的洞见,等等)的可变性。融贯性是用"可靠性"来理解的,而后者既包含"可靠度"蕴含的稳定性,也包含可说明的变化所要求的可追踪性(Guba, 1981, P.81)。可靠性是通过可靠性审计来传达的。

可靠性审计。要核查可靠性,调查者必须能让外部对研究过程开展核查。这可以通过"审计跟踪"来实现,因为审计跟踪提供了文献编制(利用关键事件、文献和访谈记录)和研究过程的流水账(比如调查者的日常杂记)。

可确认性

最后,要对研究做出判断,就要看它的发现在多大程度上是研究焦点的产物,而不是调查者的成见的产物(Lincoln & Guba, 1985,P.290)。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传统的调查者试图建立客观性,它是由方法论保证的,这种方法论①是得到明确阐述的,能接受公开的审查,可以复制;②使观察免受调查者的成见的影响。然而,自然主义调查者认识到,客观性是一种假象,没有哪种方法论能完全独立于创造和选择它的人。自然主义调查者并不保证观察免受调查者的污染,而是相信资料本身的"可确认性"。"这意味着,资料(建构、断言、事实等等)能被追溯到它们的来源,把解释汇聚成结构上融贯的、加强的
整体所使用的逻辑,既是明确的又是内隐的。"(Guba & Lincoln, 1989,P.243) 35
就如可靠性一样,可确认性也是通过审计传达的。

可确认性审计。研究中会使用一些过程,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它们来确定可靠性,审计跟踪就是为此而建立的,它也能够让外部观察者对研究成果做出判断。合适的跟踪应该能让审计员判定,结论、解释和建议是否能追溯到它们的来源,它们是否受到研究的支持。

审计跟踪对于建立自然主义研究的可信度显得很重要;关于这种重要性,最后还有句话要说。就像传统的调查者受到过一些告诫,这里也有一些告诫。正如没有内在效度就没有外在效度一样,没有可信性就不会有可转移性。此外,除非能够确定可信性,否则效度就没有意义,同样,只有保证可靠性才能建

立可信性。最后，正如只有客观性（即便按盛行的标准）能用来确保某种本身就有价值的东西，它才有价值；可确认性的价值就在于它所确认的那个东西的价值。对于自然主义调查者来说，这些独立的标准通过审计跟踪而结合到一起。第 7 章对审计跟踪的建立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

方法的选择

对于常规研究和自然主义—建构主义研究使用的量化方法和质性方法的各自优点，已经有大量的著作和言论。事实上，这两个范式通常是靠它们的方法论而被划分的：常规调查范式被划分成量化范式，而自然主义范式被划分为质性范式。我们认为这种分类是错误的，而且无谓地混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主流的调查者经常使用质性的方法，而自然主义调查者也会常常使用量化的方法。两种调查类型之间的操作差别不是由不同的方法论界定的，而是由选择方法的理由以及打算如何使用这些方法获得的资料来界定的。

克林格（Kerlinger, 1973, P. 406, PP. 483-484）相当清楚地提出了他用于评
36 价开放问题和相对不系统的观察的那种方法。这些问题和观察的目的是要在知之甚少的领域里揭示主要的关系和模型，以及为更精确地定义变量和搜集已分类的资料提供基础。一旦精确地做了范畴划分，就能对资料进行操作，而且，能够从统计上把它们与其他的资料集以各种方式关联起来。建构间的关系是“科学”意义的源泉。

传统认为科学有两个互补的方面：发现和证实。克林格所做的似乎是把发现的角色赋予自然主义调查者，把证实的角色留给传统研究。自然主义调查者不可能接受这种有限的角色，他（她）既关心发现也关心证实。也许最大的不同在于，对于自然主义调查者来说，发现和证实是相互纠结的，不可能轻易地把它们隔离在不同的时间段或活动片段中。同样，克林格实际关心的很可能是概推度，而这个概念早就被自然主义调查者否决了。

与克林格的做法相反，自然主义调查者有时候把量化方法作为基本的工具，来获得对典型及非典型案例的速描和显示能在哪儿发现外人的地图，以此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便利。比费罗（Bifano, 1987）的自然主义研究是这样启动的：她对一份来自 61 个县的 1 193 名小学校长的随机样本进行量化分析。这个样本又再缩减，只留下那些明确表达自己愿意随机抽调他们的教师来完成另外一项相同的量化分析的校长。在定点观察若干分析之后，她从中分辨学校，以此确定调查结果是否反映了真正的操作差异，这样才选出三所学校，以做深度的自然主义研究。

比较一下这种方法跟克林格（Kerlinger, 1973, P. 406）建议的方法。克林格会以质性的方法作为开端，但趋向越来越精确的量化措施。比费罗以量化

方法开始,趋向不系统的观察,并挑出三种不同语境中丰富的、分散的、未预测到的错综复杂因素。那些措施和它们产生的资料在这种顺序和优先性上的颠倒,比起措施本身来说,更好地表征了不同的范式。

比费罗使用量化措施来获得一种广泛的、初步的图景,它反映了符合其研究目的的那些调查环境中的各种可能性。我们能以类似的方式在一种环境中 37
使用量化措施,为寻找来源提供便利,这些来源会提供它的典型和非典型特征方面的信息。比如,在自然主义调查者挑选立意样本时,组织内所有成员的纸笔形式的人格鉴定记录可以当作另一种工具。如何选择量化仪具和质性仪具来达成自然主义研究的目的,在本书中的其他地方会举例加以说明。

然而,这种先使用量化措施、后使用质性措施的顺序,就如比费罗的研究表明的,本身并没有把自然主义研究同更常规的研究区分开来。例如,很有可能的是,调查者以一种准实验设计开始,然后使用量化资料,检验该设计引出的竞争性的候选假说。这里关键的不在于方法的使用顺序,而在于组合措施是旨在简化还是旨在扩展正在考虑中的现实建构。

克林特(Klint, 1988)对年轻女性运动员的动机做了两项研究,一项遵循盛行的范式,另一项遵循自然主义范式。她对两项研究所做的比较,极好地反映了两种范式的假定和优先性。应该注意的是,克林特的研究实际上并不是平行的,因为研究的范式假定差得太远。与此类似,研究结果也无法比较。不过,两项研究很好地传达了两种范式提出的问题类型和各自提供的信息类型。比如说,她注意到传统研究的读者能够理想地与调查者的理解保持一致,但是自然主义研究却不能做到如此,因为深描为读者提供了和激发了积极得多的角色。她同样注意到,使用盛行范式的一位调查者在研究过程中或许可能获得丰富的洞见,但在通常情况下,她不能与她的读者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分享这些洞见,除非她把这些读者直接与初始的研究问题关联起来。她注意到,尽管传统研究的发现"可能描绘了一颗多琢面的宝石,但读者不一定能够看到所有的这些琢面"(Klint, P. 201)。而在她的自然主义研究中,这些障碍并不存在。

她同样也注意到了两种研究类型之间的一种关系,印证了我们在谈到比费罗研究的时候提到的关系:

> 假如每位回答者的现实是由一套彩色瓷砖表征的。这些瓷砖的叠加创造了一种镶嵌图,图上,颜色和图案汇聚起来构成了分明的线条和形状。在另一 38
> 些区域,每一单个的现实中的颜色和图案只构成散布的、似乎不定形的形状。在自然主义者看来,实证主义者力图从一幅粗糙的素描中捕获一部分镶嵌图案的本质。无定形的形状是由一条单线描绘的;红的和蓝的瓷砖可以用紫色来表征。最后的结果是一幅素描,可能无法传达最终镶嵌图案的本质。此外,在组成最终镶嵌图案的任何单个图案中,都可能无法找到这样一幅素描。这

样，我们就无法一致地界定源自两种范式的两套知识集之间的关系(P.206)。

因此，尽管量化措施无法用于自然主义研究的这种看法没什么道理(它们经常就用于自然主义研究中)，但我们有重要的理由表明质性措施一般是优选。量化措施总是力图把资料简化为一些数字，体现一条单一的标准。这样做的时候，它们消除了资料的丰富细节，但正是这些细节才把它们与其他类似资料、赋予它们意义的语境和候选建构区别开来。量化方法是在做抽象，它们摧毁了大量细节，而正是后者才使共有建构成为可能，才把可信性传达给资料所源自的那些语境中的人们，才为通过深描而获得的可转移性提供了基础。

资料收集和分析

盛行范式和自然主义—建构主义范式的不同假定，还导致研究中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的关键差异。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特点，克林特才能在同一时期开展两项独立的研究。因为传统研究"规则"要求资料收集程序不能受到调查者的污染，她就能不顾资料所揭示的东西，从事资料收集(然后存储)。接着她就能实施自然主义研究，包括长期涉入，在此期间，她开展了互动的(通常是同时性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在完成自然主义研究之后，她能重新转向被储存起来的、未受污染的传统研究资料，并根据预定设计来分析这些资料。尽管这些程序使她能够保持研究的"纯度"，但同样也阻止她挖掘其研究环境中呈现的那些最多产的、最有意义的洞见。

调查中的客观性是种假象，这一认识把自然主义者解脱了出来，使他们能
39 做真正有效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调查者自己变成了最重要的资料收集和分析仪具。在调查者的工具清单中加进人这台计算机(一种仪具，在收集和分析离散的、同步的资料时，有无与伦比的灵活性)，带来的优势远远大于所谓的劣势，即便继续考虑到保留研究客观性的理由。

人类仪具能以一种互动的过程进行资料收集和分析。当然，这只需要遵循人们在解决日常问题时用到的常规过程即可。一旦获得了资料，就赋予它们临时意义。当新的资料获得时，意义被修改。显然，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会解决问题，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有能力在新的和自发的资料的基础上修改分析。旨在确保客观性的传统限制，似乎是要取消调查者在观察和分析能力上的差异，其做法是宣告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无效。自然主义调查者则在那些可以就观察和分析能力的效力提供反馈的环境中使用这些能力，最大程度地发展它们。在全书中我们都会强调这一论题。

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上，自然主义研究与传统研究的另一个差异是，前者不制定预定设计或建好需要遵守的程序。在资料收集前，传统调查者就准确地知道要收集什么样的资料，如何存储它们，如何重新获得它们；而自然主

义调查者缺少这一优势。然而,自然主义调查者从一开始就力图从研究语境中引导出一种整体的、尽管是临时的设计,为后续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提供指导。尽管在研究进程中,这一设计会经历多次调整和改进,但它对资料收集、分析和重获的指导价值,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正因为这样,它奠定了审计跟踪的基础。

尽管审计跟踪的主要功用发生在研究彻底完成之后,但从一开始就必须加以考虑。不只一位调查者因为在研究开始没为审计跟踪做准备,因而错过了它的诸多价值。作通盘的考虑,最好是,尤其是在研究的早期阶段,尽量保留过多的而不是过少的记录和文献。自发设计不断提高了研究过程的效率, 40
并且能使审计跟踪的材料得到系统的收集。

报告研究

自然主义研究的特征之一是,它赋权给那些与研究有关的人们。我们早就提过,研究的可信性本质上在于,它能把研究环境中的各种现实建构返回传达给那些持有并能确认它们的人。在第 8 章中,我们会讨论与语境中的干系人交涉自然主义研究结果的必要性。同样,研究的使用者(读者)也应该通过研究报告得到赋权。

我们早就提过,自然主义研究的深描允许和鼓励读者以一种积极的角色参与研究。我们同样也看到,主要是由那些把深描应用到接受语境中的人承担可转移性的任务。调查者在写作报告时的义务是制作一份文献,它允许读者积极的参与,为发展可应用于其他语境的工作假说提供基础。

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PP. 357-360)主张,案例研究和随带的方法论报告,是自然主义研究报告的优选模式。这与传统研究的常规报告格式相反,后者从调查问题或假说、到研究设计(包括研究中可能用到的仪具和统计工具)、到基于初始假说和问题的发现陈述,最后到结论和建议陈述,这样一路下来。常规报告局限于调查问题和设计,而且,至少到报告结尾提出建议为止,常规报告还限定于直接对它们做出反应的资料。相反,案例研究允许深描,后者把读者替代性地带入语境中,使他们能与已有的资料进行互动。当然,调查者应该认识到,读者无法做出完全独立的判断;就如任何研究一样,读者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调查者明确的及暗含的偏向和判断的影响。然而,在好的自然主义研究中,由于读者能在资料的总体语境中与它们进行互动,因此有勇气从新的方向更深入地拓展调查者的分析。 41

这要求一定的写作技巧,而常规研究报告通常没有这种要求。把读者替代性地带入环境的能力,通常是与最高级的书面表达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做调查的人一般不具备这种能力。如果每项自然主义研究都要求这样的技术,那

么许多研究就无法完成,甚至不可能开始。本书的目的是鼓励、而不是打击这样的研究。不过,我们提到这种写作能力对于自然主义报告者的价值,是想鼓励写这种报告的所有人注意到写作技巧的优势,并有意识地发展这种技术,来确保他们的研究不受表达形式的拖累。

进一步的研究

1. 阅读一下 Hollingshead(1975), Lortie(1975), Whyte(1943), Wolcott(1973),或 1980 年前出版的长篇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注意在哪些地方,作者为确保可信度而遵循传统的程序;在哪些地方,他(她)遵循的是更符合于自然主义研究的程序。判断一下,对于研究目的来说,方法和程序有多么合适。然后把你的笔记与读过其他选集的人的笔记做下比较。采用不同的方法论能提升这些研究吗?注意,这些研究是在自然主义(建构主义)范式形成前做出的;考虑一下,如果它们有意识地遵循新的范式,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2. 阅读 Kuhn(1970)和 Lincoln & Guba(1985)的第 1 章和第 2 章。试着就下述问题推出一个结论:从实证主义到自然主义的转换是否真的体现了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与其他经历相同过程的人一起讨论你的结论。

3. 回过头想想你在第 1 章中考虑过的 Lightfoot(1983)的“描摹”。赖特弗特的工作是可转移的吗?为你的答案提供辩护。

4. 考虑你在第 1 章开始计划的自然主义研究。为你提出的基本问题尽可能提供最好的临时答案。你的这些答案是基于什么样的证据?你会到哪去寻找这些信息?你会提出哪些后续问题?你会提出哪些额外的基本问题?

启动研究 3

中国有句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开展任何类型的调查，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启动研究，踏出第一步。完成一篇学位论文或其他重要的研究，意义非凡，以至于一些有抱负的调查者从不开始研究过程，而且很多人从没完成过程。然而，如果一步一个脚印，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增了。过程以确定一个难题开始，它为研究提供了方向。难题一旦确定了，即使很模糊，调查者也能开始寻找能对难题加以调查的地址。在某些情况下，难题和地址会同时出现。调查者或其他人可能在具体社会语境中遇到一个难题，需要额外的理解，他（她）就会开始关注那一特殊的难题。一旦确定了难题和地址，难题就要持续得到提炼。难题并不是处于语境真空中；只有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它才有意义。在自然主义研究中，由于对难题的界定植根于不同干系人的建构性现实中，调查者不可能提前获知，所以难题的界定和提炼会在研究启动后持续一段时间。不过，本章的目的在于帮助调查者了解难题确定和地址选择过程，这是调查的起步阶段，它们将会大致框定研究的本质。

确定一个难题

在人类语境中，调查的潜在难题范围极其宽泛和分散。如何发现一个值得调查的难题？如何陈述自然主义研究的难题？这些重要的问题对于调查者来说是常见的，而且在启动任何研究前，都必须得到回答。

任何称职的房地产销售员会说，好地产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位置，位置，位置！"在调查中，整个研究计划始终都应该满足的三个标准是"兴趣，兴趣，兴趣！"第一个应该问的、也是在许多确定难题的决定中作为指导的问题是："调查者的兴趣是什么？"相关性、时效性、可行性和其他的考虑在选择调查难

题时都至关重要。然而，即便难题很重要，也具有可行性，但如果调查者没兴趣的话，也会阻碍成功的调查计划的开展。在研究人类语境时，这意味着调查者有热情查明最初把他(她)与语境连接起来的中介词(mediating words)，有热情建构与该语境中的人们共有的现实。本书的作者提供了广泛的兴趣，每位都努力寻找那些能激发这种热情的调查难题。好的调查是项辛苦的、繁重的和费时的工作。如果有人计划花一年的时间(或更长)与一个人呆在一起，他(她)会希望后者令人振奋、能激励人、有趣和好相处。自然主义调查者会投入较长的时间到他(她)的研究中，对难题的兴趣可能是支撑调查者度过月复一月或年复一年的艰辛工作的支柱。

按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的界定，一个难题就是一种事态，它①需要额外的理解；②确定在候选行为进程中进行选择的必要；或③导致不合意的结果。"调查研究的目的在下述意义上是'解决'难题：积累足够的知识，引出理解或说明，这是一种辩证过程，让构成难题的正题和反题互相争斗，最后统一到某种合题中(PP. 226-227)。"

要取得调查难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从有能力、有经验的调查者那里寻求帮助。如果有抱负的调查者是个毕业生，那么他(她)的学位论文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合适的人选。在一张纸上草草记下一般的兴趣，并安排一次与主席的会面，应该会有帮助。这些兴趣应该会激起一些泛泛的观念，用作交谈的
44 基础。例如，如果某人对体育有广泛的兴趣，他(她)在第一次会面时可能有几个临时问题："女性的态度如何影响到她们的运动表演？"或"为什么男人要举重？"这些广泛的、开放的问题能引导出各种具体的难题，比如说："在田径运动中取得成功的大学女性，她们的姿势和表演中存在什么样的动力学？"或"这栋公寓大楼里取得成功的男士比起没成功的男士来说，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

学生和教授间的对话，或同事间的对话，有助于厘清和缩小研究的焦点。同样还有这样一些时候：主席或同事正好在类似的有趣领域做调查，可能欢迎毕业生或其他调查者在部分计划上提供帮助。施特劳斯和科宾(Strauss & Corbin, 1990)评论说："这种发现难题的方式有助于增加涉入'可行的'和'适当的'调查难题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更有经验的调查者早就知道在一具体的独立领域中有什么已经做了，有什么是还需要做的(P. 84)。"

同样，记住兴趣这条重要标准。如果有人选择在一个计划上进行合作，他(她)要为自己和有经验的调查者做出恰当的工作，就要对提出的计划真正感兴趣，这是至关重要的。

调查难题的另一个来源是专业文献。有关调查为你感兴趣的领域提供了什么信息？阅读现存文献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它有助于调查者发现什么样的难题是有意义的。难题的意义在于它的时效性、原创性、重要性，同样还有它

的学术和实践价值。与专业文献保持同步，能使调查者避免不必要地重复琐碎的或被糟糕设计的先行工作，使他（她）能预见有意义的方向和题材。

调查文献同样可以揭示先前调查中能得到拓展和增强的一些领域。拓展类似于常规调查中的复制，但有重要的差别，差别就在于自然主义调查把先行的研究作为基础的目的。第2章和第7章中讨论过的概推度和可转移性这两个重要概念，在这里就有用武之地了。常规调查认为，不受时间和语境约束的概推能为先验假说提供基础。例如，如果某条假说在一种研究中被当作很可能的加以接受，调查者就能重复第一个调查者的研究，来查看它是否产生相同的结果。如果结果相同，那么加强了对该假说的信心。如果结果不同，这就使 45
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两项研究中的一项或者两项都包含错误，并暗示要对第一项研究的发现的概推度做出限制。

自然主义调查者是在一套不同的假定下进行工作的，这些假定牵涉到现实的本质、认识论和概推度。自然主义研究的目的不是提出一套知识体系，由不受时间或语境约束的陈述形式的概推组成。其目的是发展那些揭示某一语境的共有建构，并为其他人的调查提供工作假说。因此，自然主义调查者在做与先行研究相似的研究时，其目的不是制造相同的结果，揭示先前方法论中的错误，也不是提高它的概推度。相反，其目的首先是拓展一项研究的过程和建构性现实，为另一项研究初步揭示研究语境。出于这一原因，拓展调查是用来取代复制这个传统术语的。对于自然主义调查者来说，拓展调查可以满足下列目的。

1. 拓展调查可以考察一种环境中发现的建构性现实在不同环境中的可信性和可转移性。例如，本书的一位作者实施了一项研究，对先行的一项工作做了局部拓展，后者考察了小学校长赞同的理论和实际的专业实践（Allen，1990）。作者的研究使用了原来工作中的一些方法和逻辑。不过，他为中学校长的专业实践提供了洞见，为知识体系做出了贡献，而且比起前面的研究来说，这次调查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址做出的。

类似地，夏皮罗和内丰（Shapira & Navon，1991）把在美国的"第三场所"做过的调查拓展到以色列的一些类似环境：

> 如咖啡馆这样暧昧的环境，为考察社会行为提供了尤其有趣的场合，因为这里可以有复杂的交涉、操作和适应过程。因此，不足为怪的是，休闲场所〔如酒吧、小酒馆和咖啡屋〕得到了各种调查者的大量考察……不过，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中做出的，并且是与该语境相关的。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考察"第三场所"的社会定义，应该为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普遍意义和特定文化意义提供有启发的看法。以色列这个语境尤其适合于这样一种 46
> 研究。首先……〔以色列〕社会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定义不同于〔美国〕盛行的定义。其次，以色列到处点缀着如咖啡屋这样的"第三场所"，它们的

外表非常类似于美国文献中分析的类似设施(P.108)。

2. 拓展调查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论来对发现做出调查。太多研究使用的都是常规量化的方法论。其中对许多主题的调查都是早早收场的,大致扫描一下这些研究,就可以发现对这些主题的理解需要用自然主义的研究加以拓展。自然主义的假定和立场能为持久的难题添加洞见,而这是常规模式不可能做到的。它能让教育工作者透过新的视窗看难题。古德(Goodall, 1990)解释说:

> 存在许多视窗,我们能透过它们看到世界,寻找意义。有些是由科学打开的,它们的玻璃格子被一系列杰出的、敏锐的心灵擦得发亮……但还有其他的视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透过其中的一个视窗凝视……而且,即便是这一个视窗,也经常被我们有限人性的呼吸弄得模糊。毫不奇怪,我们经常感到困惑……这……就像是透过卷起的报纸来捕捉沙漠或海洋的全景(P.10)。

不过,我们要提醒调查者,即便我们提倡方法的结合,我们却不提倡范式的结合。范式是看世界的方式,要把它与另一种看世界的矛盾方式结合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传统范式把意义简化为分散的词语,来寻求交流。自然主义范式通过拓展意义来寻求交流,即便新的意义与先前的知识相冲突。这就说明了,尽管自然主义调查者总是盯着候选方法得来的知识,但是要结合进一种试图简化意义的范式,自然会破坏其效力。

3. 拓展调查可以检查在时间中的变化。教育机构是动态的、有生气的、不
47 断变化的环境。几年前"可行的"或有效的,今天可能仍旧是或不是适当的。自然主义研究考虑的是处于变化中的社会的动力学和复杂性,有助于确定以前的调查发现在今天的可转移性和可靠性。

还有另一个调查难题来源就是当今的社会潮流和主题。许多社会主题能充当调查难题,适合教育工作者去做调查。例如,女权运动引起了教育资源和实践中的性别平等和性别成规方面的问题。公民权利运动导致了对少数民族儿童的教育和种族隔离的调查(Merriam, 1988)用来确定和鉴别社会潮流和主题的资源包括专业研讨会和期刊、报纸、电视记录片、新闻杂志和大学课程。

在确定调查难题时应该考虑到个人的能力和职业经验。如果调查者在专业教育上有广泛的背景,那么他(她)很可能熟悉那一领域里的许多难题。另一方面,如果调查者没有一点专业教育经验,那么最好不要在那个复杂的领域寻找调查主题。如果调查者没有必需的经验来建构与调查环境中人们的建构性现实相容的现实,那么建构与他们共有的现实,其困难性就会增大。许多有抱负的调查者开展了重大的计划,结果却发现,当到达分析阶段时,他们缺少必要的技巧或背景来继续做出满意的研究。在斯特劳斯和科宾(Strauss &

Corbin, 1990)看来：

> 利用专业经验或个人经验这种途径来选择一个调查难题，比起利用建议的途径或文献途径来说，可能显得更冒险。这并非必然正确。把你自己的经验当做试金石，对于你来说，这可能是更有价值的指示器，指示着一次可能成功的调查努力(PP. 35-36)。

有时候，个人经验和社会潮流结合起来，共同产生一个恰当的研究主题。诺尔斯(Knowles, 1991)对此做了说明：

> 我为当一名学校教师和一位父亲做了专业准备，结果我强烈地感受到父母双亲关注和参与儿童教育发展带来的好处。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我在南 48
> 太平洋上一个地理隔绝的地方工作，我的两个孩子无法上正规的学校。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设计了一个家庭教育方案。80 年代中期，我为学生的父母亲开了个暑期大学班，主题是关于户外教育的。由于开班取得成功，我受犹他州家庭教育协会的邀请参加了该协会 1985 年年度大会，并做了会议报告。与该家庭学校界的这些初步接触帮我建立了善意的标准，它有助于人们相对容易地进入许多家庭学校(PP. 206-207)。

诺尔斯继续描述了他的个人专长和他与迅速发展的家庭学校运动的接触如何引导了他的一项研究：确定和理解父母开展家庭学校的根本原因。

一个明显要记住的事是研究有关难题的可行性。你可能对日本中等教育感兴趣，但是，如果你靠研究生助理津贴过日子，只有有限的旅行预算，又不懂日语，那么很明显，研究这样的一个主题是不可行的。可行性考虑包括经费、有关的其他个体、交通费、地理上的机动性、家庭和选择恰当的地址。

如果调查者是位学生，那么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他将来的职业目标，不要纯粹为了毕业而选择一个论题或做一篇毕业论文。博士生的最终调查计划经常被视作一张“名片”，因为它能为调查者的名声和刊发文章提供基础，还为专业发展和机遇提供跳板。因此，选择有意义的难题这种过程极其重要。

在对话、阅读、确定研究的重要性、做出拓展决定和评估个人能力及职业目标方面，培养学者态度是很重要的。如果调查者做研究时以自满和专家的态度自居，那么研究就会受到限制。调查者应该质疑概念和程序，循着提示和建议前进，尽力以批判的态度思考和挑战专业文献中的陈述。每日在反省杂记中写下笔记和想法，培养这种习惯是有益的。调查者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都应该坚持这种反思性的写作实践。

49

陈述调查难题和问题

一旦调查者界定了一个一般性的难题，那么具体的难题也就能得到界定。

对一具体难题陈述的聚焦可以满足两个主要目的：

> 首先，这样的聚焦为研究划定了界限；它界定了区域，也就是所谓的恰当的研究领域……其次，这样的聚焦有效地决定了吸纳和排除新信息的标准。自然主义者即便很清楚研究的界限，也很可能去挖掘大量……无关的信息，因为研究的早期阶段是对资料收集网做更大范围的彻底搜索。聚焦有助于自然主义者……做出保留或抛弃信息的决定（Lincoln & Guba, 1985, PP. 227-228）。

自然主义调查中的难题陈述不是一个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目的，而是如我们提到的，是对困境或情景的一种表达，出于理解和指导的目的，这种困境或情景是需要处理的。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力图通过积累相关知识和信息来解决难题，并且要以此为指导，与被研究的社会语境中的各种关系人合作，共同建构意义。

尽管拓展调查的目的不是揭露先行研究中的错误，但先行研究中明显的不一致会给调查者提供一个难题，初步指导他的研究。例如，在阅读怀特的经典研究《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 1943）的过程中，博伦（Boelen, 1992）质疑了怀特的一些推论和建构。在意大利呆了四年，观察到年轻的男性习惯性地聚集在街角后，她怀疑，怀特所谓的“拉帮结伙”（gang formation）只是从意大利照搬过来的一种模型，被美国的年轻意大利人沿袭下来。

根据大拇指原则，难题陈述应该足够宽泛，能够包括关键主题和考虑，但也要足够狭隘，以便能为资料收集提供指导。

海曼（Helmer, 1991）做了这种陈述，它指导了他对轻驾车赛马文化的分析：

> 此调查的目标是透视非终点直道世界*，探索社会凝聚力和意义的一个
> 50 重要来源——马本身。米德在他的一个例子中观察到，“马不仅仅是用来骑的。它是一个动物，必须吃东西，属于某个人。它有经济价值。”（Mead, 1943, P. 12）在非终点直道上，它还有心理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就像劳伦斯描述的骑术表演者一样，非终点直道上的人们构成了一个牧人社会，在该社会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对于大量重要的社会现象来说十分重要。因此，该研究的目的是描述非终点直道上那独特的局部文化（Geertz, 1983），分析马如何不只是影响意义的局部系统，而且马本身如何构成了一种文化系统的焦点（P. 175-176）。

在难题得到恰当陈述后，下一步就是提出调查问题。自然主义研究依赖从资料中产生的理论（即，后验的），而不是先于资料的理论（即，先验的）。因此，调查问题的表达应该允许调查者发展和探索从研究语境中产生的理论。

---

* backstretch，离观众最远且与终点直道相对的椭圆形赛马跑道——译者注。

这些问题类型的一个基本范畴化系统是“谁”,“什么”,“哪儿”,“如何”和“为什么”类型。殷(Yin, 1984)做了详细阐述:

> 界定调查问题很可能是调查研究中最重要的一步,因此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耐心和足够的时间。关键是要理解,调查问题不仅有内容,如,是关于什么的研究?还有形式,如,我问的是“谁”,“什么”,“哪儿”,“为什么”或“如何”问题吗(P.19)?

一般说来,“谁”,“什么”和“哪儿”问题,或者是可以探索的(比如说,刻画这三所学校校长的一般行为模型是什么?是在哪儿学习的?),或者是可以预测的(比如说,新课程有什么样的成果?谁对这一变故负责?)。相反,“如何”和“为什么”问题更多是说明性的,处理的是需要在一段时间中追溯的操作环节(比如说,为什么学校里会发生打架事件?)(Yin, 1984)。

调查问题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划定研究对象的界限。在自然主义调查中,有大量调查的可能性。调查问题帮助调查者把调查难题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不过,做研究的时候,在限制调查焦点和考虑到创新的可能性及灵活性之间,存在微妙的平衡。施特劳斯和科宾(Strauss & Corbin, 1990)对此说过:

> 尽管最初的难题显得宽泛,但在调查过程中,随着概念及其关系显得相关 51
> 或不相关,问题渐渐变得狭窄和集中。因此,调查问题开始是开放的和宽泛的;但没有宽泛到……容纳所有的可能性。扎根理论研究中的调查问题是一种陈述,它确定要研究的现象。它告诉你,你要特别关注什么,你关于主题要特别知道什么。[它们]同样有助于定向过程和行为(P.38)。

就如提过的,调查问题与调查难题是互相关联的,而且应该是对后者的补充。下面是调查难题及其相应的调查问题的例子。

调查难题 1

> [20 世纪 80 年代]见证了空前的教育改革要求……这些难题表明有必要调查校长—教师互动的动力学,提出方法激励专业教育家投身于学校的整体运行(Allen, 1990)。

这个案例中的调查者确定了两所学校,它们似乎为考察已定难题提供了对比环境,该调查者提出了三个问题,为收集资料提供了指导,旨在理解每所学校发生的校长—教师互动的本质,以及它们对相应学校社会语境的影响。

调查问题

1. 假如校长表现出一种倾向:明确地界定和实现学校的运作目的,那么该学校的校长与教师间会有什么样的互动?

2. 假如校长表现出一种倾向:在管理学校的过程中把有效信息最大化,那么该校的校长与教师间会有什么样的互动?

52 3. 如何描述研究中学校的学习和组织文化?

调查难题 2

文化是作为一种普遍说明出现的,它说明了为什么某些学校比另一些更成功。不过,考察学校文化的困难来自于缺少可容易获取的仪具。难题是,如何使某物变得如此有力,但又难于量化、显露自身(Skipper, 1989)。

这个案例中,调查者希望尽可能充分地理解一所学校的文化,在许多观察者看来,这是一所"好中学"。她的初始问题是以下列目的为导向的:首先鉴别出那些代表和传达该中学文化的明显行为模型。她同时还要求环境中的各种关系人去鉴别和共享他们用来刻画学校的暗喻,来展开他们的建构。最后,她希望找出环境中主要的文化建构者和传达者。这引出了三个问题。

调查问题

1. 刻画鲁道夫中学文化的行为模型是什么?
2. 哪些暗喻最好地描述了鲁道夫中学的文化?
3. 是谁发扬和传承了该中学的文化?

调查难题 3

传播道德价值是公共教育最古老的任务之一,但当前成了最新的冲突来源。比起以前来说,当代的教育工作者要教育在文化上更为复杂的学生群体,但又缺乏系统的资料,表明能提出多少、以什么方式提出价值主题。教育界需要一种方法来进行道德教育,它要考虑到多元的基调,而且能被有效地结合进学校的课程和文化中(Harris, 1991)。

在这项研究中,调查者力图鉴别、比较和对照一些模型,两所完全不同(一是公立的、乡村的;一是犹太人的、市内的)、但都以在教育规划中强调价
53 值而出名的学校,就是用这些模型阐明和传达价值的;并把它们结合进教育规
划中。这引向了下面四个初步问题。

调查问题

1. 被研究的学校是如何提出和实践价值的?
2. 是谁最初策划把价值结合进各所学校的?

3. 教师、学生和校长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4. 在哪开展价值教育?

提出调查难题和阐明那些把调查者引向关键资料的问题,需要大量准备。当调查者被调查过程中要加以分析的大量资料吞没时,早点把时间和注意力投资到这个过程上,会带来许多有益的回报。

选 址

选择合适的地址是自然主义调查中的一项关键决定,因为调查者会在一个具体的自然环境中开展研究,观察和记录环境的日常运作。此外,在调查中收集的资料受被选择的地址及其直接语境的限制。选址影响到整个研究的生存力,所以应该对这一过程给予极大的关注。

是否任何地址都适合做具体的研究?是否存在理想的环境?首先,在确定了重要的、有望持续引起调查者兴趣的调查难题之后,调查者就得确定一个地址,它能最大限度地提升调查者处理那一难题的机会。一旦这点定下来了,那么其他的考虑就有助于确定候选地址的相对可行性。马歇尔和罗斯曼(Marshall & Rossman, 1989)写到:

> 理想的地址是①可能进入;②作为调查问题部分的许多过程、人、规划、互动和/或结构的丰富组合有很高的可能性会出现;③只要必要,调查者就能设计恰当的任务来维持它们的持续性;④资料的质量和研究的可信性可以通过避免糟糕的抽样决议而得到合理的保证(P. 54)。 54

我们不应该把词语理想的和完善的相混淆。乌托邦式的环境不存在。不过,有些地址比其他一些更好或更适合。调查者应该尽力找到其资源范围内可能的最好地址,而且初步的选址指南是具体调查主题的难题和问题。例如,如果难题关系到计划中的价值教育开展,那么重要的是选择一种力求把价值维度整合到教育规划中的教育机构。相反,如果难题关系到学校—家庭交流的广泛寓意,那么几乎可以在任何一所学校组织和多个地址中开展调查。

有几种办法能帮助在可能的候选地址中做初步筛选,并把研究的焦点限制到最好的场所中。一种方法是问卷调查。调查者的调查难题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后者能分发到许多学区。根据对这些调查问题的反应,调查者能对每个可能地址的可行性做出初步决定。一位笔者在为其研究选址时就使用了这种办法。他的调查难题强调调查校长—教师互动的动力学,还强调提出方法促进专业教育家投身于公立学校的整体运作。选址过程主要有两个阶段:

阶段1——在此阶段,要求德克萨斯4A级中学和5A级中学的校长对一

系列与校长—教师互动有关的场景做出回答。问卷上的每一条都是对一假想情景的陈述，后附李克特4点量表回答。条目的格式是："在此情景中，我会……"校长对调查表的回答反映了每位校长赞同的领导理论的工作假说。

阶段2——在此阶段，调查者实地探访地址，访谈了两位校长，他们在领导风格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比。调查者使用了质性访谈方法，确定校长的专业实践似乎与他们在调查回答中赞同的理论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调查者挑选出那些学校来做自然主义调查(Allen, 1990)。

另一种选址方法是与其他对你的研究主题有所了解的专家进行对话、访
55 谈和交流。

这里有个例子，摘自一篇关于价值教育的毕业论文：

研究是在1989—1990学年春季做出的。在此之前，调查者花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与学校的行政人员、大学教授、研究生和其他教育者进行交谈，以便挑选两所力图把价值维度整合进各自文化中的学校。最后有两所学校被选中了，其一是因为它们在把价值教育整合到它们的教育规划中的名声，其二是因为校长在学校里对价值的强调。

我对每所学校的校长做了访谈，来证实这些地址是否恰当，获取进入的许可，以及建立调查者和回答者之间的信任。两位校长都表达了参与研究的兴趣，并约定了我实地探访的日期。

开展研究的许可可以从各学校系统的有关部门获得(Harris, 1991)。

赖特弗特(Lightfoot, 1983)为她的选址过程提出了洞见：

我们搜寻精华——范例性的学校，它们可能告诉我们教育成功的各种定义，以及如何取得成功。其次，我们想要多样化的中学——多样化的哲学、资源、人员和类型。第三，我们期盼有代表性的地理位置。我们的选择是不科学的。不做随机抽样，不做大规模的意见调查来鉴别好的学校。有的学校被挑中，只是因为它们在办学人员中的名声、它们的居民和周围社团对它们的高度评价，以及因为它们提供了简单的和慷慨的进入通道(P.11)。

一位笔者做了一项研究，采用了类似的选址过程。有位负责人听说了相关情况，为她在其辖区内的中学安插了一个顾问职位，这样她就能作为参与观察者的身份撰写研究。被慷慨地提供进入一所在当地口碑较高的中学的机会，并不容易拒绝。接受了参与观察者的角色后，她就能进入学校的文化，变成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她作为调查者的角色不是隐蔽的，但她充当学校顾问
56 的角色是(而且，很可能是更重要的，被视作是)她呆在学校里的最重要的原因。她能直接地体验和记录该系统中的参与者如何对系统的新成员而不是外在的调查者做出反应。在这种系统中，是扮演参与者的角色，还是非参与者的

角色，是调查者必需做出的一个决定。

调查者是使用上述的一种方法，还是方法的组合，有一些考虑；对于自然主义研究来说，选址时一般都会考虑这些问题。在做每项考虑时，调查者必需谨记指导规则：选择过程应该与调查难题相关，并接受后者的指引。

一个主要的考虑是可达性。调查者能否获得通道？马歇尔和诺斯曼（Marshall & Rossman, 1989）评论说：

> 就概推度、兴趣和研究现象的例子范围来说，一个地址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如果调查者不能获得进入该地址、其范围内的群体和活动的通道，那么研究就不可能取得成功（P.56）。

可达性牵涉到地理位置和获得入口及有关的“监视人”的合作的能力。词语理想的同样引人注目。先前讨论调查主题的选择时，许多相同的考虑，如个人能力和可行性因素（比如说，资金、交通、家庭、住宿、食物消费和设备），在选择合适地址的过程中也会出现。

获得进入可能地址的入口是一种努力，需要制定妥善的计划，它属于选址过程的一部分。开启任何环境的钥匙被掌控在某些监视人手里，或者是那些有权允许别人进入其世界的人手里。在与这些人交谈的过程中，调查者必须谨记，自然主义研究是高度互动的，依赖于持久的观察、非常集中的对话、访谈和汇编成卷的文献。善意、信任、合意，以及调查者与回答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它起始于与监视人的初步接触。马歇尔和诺斯曼（Marshall & Rossman, 1989）写到：

> 开展质性调查的调查者需要想出和培养一些角色，方便获得入口，让环境容易接受自己，并轻松得到参与者的合作。他们需要表明，他们在开展调查时，能做到既不破坏环境，也不伤害到环境中的人（P.63）。 57

获得进入一个合适地址的通道可能非常困难，可能会促使调查者改变研究的焦点。泰勒（Taylor, 1992）第一个提议对沉迷于科层组织（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的人的权力联合开展研究。她确定了几群沉迷者，他们都同意充当研究的对象；她还从作为调查地址的几个企业组织那里获得了口头支持。不过，不可克服的障碍悄然却有组织地出现了，早前受到的支持在一个个被提议的地址中没有了，她的计划挫败了。泰勒从来就没有满意地获得过监视人的支持，这主要是因为，她提议的研究威胁到了他们对其组织的控制，针对这一点，他们用自己的控制权拒绝她的进入。开展这项研究的努力失败了，对它的记录最终出现在另一项研究中（Taylor, 1992），后者分析了协商进入组织的通道这个难题。该分析确定了获得进入研究地址的通道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克服这些问题的一些可能策略。对任何处于鉴定自然主义研究地址的过程中的人，我们极力推荐她的这项研究。

耶格尔和克雷姆(Yeager & Kram, 1990)对企业伦理做过研究,在他们能确定两个调查地址前,接触了12个企业——5家银行和7所高科技公司。就像泰勒的情况一样,有几个公司开始表示了兴趣,但在获知调查的细节后,委婉地拒绝了。尽管拒绝的理由通常很含糊,但调查者断定,它们一般关系到研究的侵扰性(经营时间、资料的敏感性),对伦理领域的相对低的兴趣,或两者兼具。在获得进入两个地址的通道后,他们开始在两个地址发展与内部管理成员的亲密关系。这些关系亲密的群体为该项计划提供了内部支持,为计划的合法性提供了更广泛的基础。它们同样还有助于建立与被访者的关系——尽管他们本身并不被要求作为被访者,而这种关系最终被证明是重要的资料来源。耶格尔和克雷姆同样还在两个地址上许诺赠送最终的反馈报告的副本、请教他们对报告的反应、他们的修改意见、恳请他们的合作、以及请教能促进分析和调查的实践效用的额外信息,增进了他们与经营人、执行人之间的关系。

调查者同样必须对一个潜在的地址做出判断:在该地址中,是否有很高的
58 可能性存在着一种丰富的组合,其中有许多可能成为调查难题组成部分的过程、人、项目和互动(Marshall & Rossman, 1989)。这可以利用"先有民族志"来实现,也就是说,参访地址,与回答者交谈、观察、记录和鉴定该地址是否"适合"调查者的目的。

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写到:

> 这样的先有民族志不仅有助于降低调查者的侵扰性,而且提供了文化同化和信息定位的底线,它对于促进正式工作的效率和成效有着无比的价值。它为调查者应对将发生的事做好了准备,同时还能增强人类仪具的效力(P.251)。

比费罗(Bifano, 1987)在对小学校长的研究中,挑选出三个地址做广泛的研究。在其中一个地址上做先有民族志研究的阶段,调查者确定该地址并没有她想要研究的特点。她同样发现,在该地址的先有民族志中,她被拒绝获得重要的资料来源。结果,她放弃了这个地址,挑选了一个候选地址。无论这个地址在回答调查问题方面可能显得多么完美,调查者都必须能够有机会接触到回答那些问题的方法。比费罗本来能继续选用这个被挑出来的地址,并为她的调查问题找到局部答案,但那些答案无法反映被研究学校的精确、完整的面貌。调查者必须抵制一种寻求折中的诱惑:出于方便而以调查质量为代价。

调查者需要做一个决定:是在一个地址还是在多个地址做研究?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因为要预先处理流行数年的传统调查的假定和方法论。一般来说,传统的观念认为,先界定目标群体,然后从中随机抽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在一些案例中,小的样本量是合适的,在另一些案例中,大的样本量会更好些,但在实际中还从没听说过单个的样本量。不过,我们必须谨记,常

规调查中的概推度这一整体目标不会出现在自然主义调查中。

这里提出一个警告:除非做了充分的先有民族志和调查,否则不要鲁莽地只定下一个调查环境。把调查局限于一个环境,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结果不如你最初想的那样。因此,单一案例设计需要对潜在的地址做仔细考察,把 59
歪曲的可能性限制在最低范围,并最大限度地扩展收集案例研究资料所需要的通道(Yin, 1984)。

有些案例中,某些地址可能是优选。比如说,如果一群调查者正研究一个具体难题,有些地址能得到认同,调查者各自调查一个地址,然后集合起来分析他们的发现。在另外一些时候,某一个体可能希望研究两个或更多的不同地址,来考察建构性现实从一个地址到另一个地址的可转移性。对地址数量的决议,不应该由预定的概念或传统调查者的压力决定,而应由调查难题和研究目的决定。一个地址可能满足许多目的。

选址过程中的另一个考虑是对调查者花在地址上的合适时间量做计划。所有的自然主义调查者都面临一个困境:在一个环境中是呆长时间(一个月到一年或更多)还是呆短时间(五天到少数几个星期)。如果时间较长,调查者就有更多的机会做个人间的互动,收集更多的资料,建构与研究环境中的人共有的现实。不过,其不利可能有,调查者过度认同回答者,因此破坏了外部观察者本可赋予共有建构的价值。同样,短期参访也可能带来不利,比如说,短暂停留可能无法满足建立善意、发展信任、理解文化、获得充分的深度资料所需要的时间,因此降低了建构与环境中的人共有现实的可能性。那么,多长时间才够?该问题的答案关系到调查难题、语境的范围和复杂性,以及调查者的能力和技巧。

工作假说

潜藏在提出调查难题的过程中,关注问题、指定合适的地址,就是工作假说的演化。事实上,无论是否被明确陈述,在调查过程开始前,工作假说以种子的形式存在,而且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成形。在调查开始前,这些假说植根于调查者的价值定向中,并建基在他(她)预先构想的关于研究主题和原 60
因的观念之上。随着调查过程的展开,这些观念应该得到明确的阐述和不断的改进。在某些案例中,工作假说甚至改得跟最初的形式毫不相似。不过,这些假说不应该被看成是先验的无用假说,常规研究中的那些假说就是这种类型,设计出来就是需要加以接受或拒绝的。

几位笔者对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做过研究,我们能在其中发现临时工作假说演化的一个例子。研究的整体指导观念被陈述如下:"大型购物中心在

1975 年后成为美国社会的恰当表征。”随着研究的开展以及成形，这个临时陈述的本质变得越来越隐喻化。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个陈述看成是需要接受或拒斥的可概推的假定，而是看成一个命题，需要调整以适合于刻画具体的语境。这种方法能使调查者保持灵活性，满足了调查焦点在研究过程本身中进行演化的需求。下面是初始陈述的某些演化发展：

> 大型购物中心的某些方面在 1975 年后刻画了美国社会。
>
> 大型购物中心只是美国社会的某些特定部分的恰当表征。
>
> 大型购物中心在 1975 年后刻画了美国社会的文化多元主义。
>
> 大型购物中心是过去的村庄广场在现代的转型。

无论是在开始被陈述时，还是在其最终的形式中，对于研究场所或其他场所来说，工作假说一直就被看作是临时的、尝试性的。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就阐述过这种观念：

> 场所跟场所之间总有语境上的差别，而且，即便是同一个场所也会随时间发生改变。据说，有人问一位中国哲学家，是否有可能两次穿越同一条河流，他回答说甚至一次也不能穿越同一条河流！不断的变化使任何结论都不可能
> 61 是永远正确的；我们只能说在如何如何条件和环境下结论才是正确的（P. 124）。

本质上，工作假说是一般的陈述，适用于具体的调查语境。这些系统的陈述为调查提供了意义和方向。它们是工具，为研究计划提供指南，而且应该随着现象模型的出现而得到逐渐调整和提炼。

工作假说也是架通研究的桥梁。对中学 A 所做的彻底的、自然主义的研究可以增加人们对这种组织的理解和洞见。它们不能概推到中学 B；但是，在对中学 A 做了研究后，或者读了另一个人对 A 语境做的深描后，调查者就为研究中学 B 做了更好的准备。为什么？因为有了关于 A 的经验，无论是第一手的还是替代性的，调查者就能系统提出工作假说，把它们加以调整和提炼，使之适用于新的语境。同样，工作假说能连接对同一环境的不同研究。在博伦（Boelen, 1992）看来，怀特的建构和结论开始是与她自己的问题互动，然后是与她从康纳维尔居民的访谈中收集到的资料互动，工作假说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生成、调整和提炼的。

自然主义调查的工作假说是可检验的，就像更常规的调查假说一样，为调查和调查者指示了方向。但与传统假说不同的是，它们与资料收集和分析做真正的互动，随着研究过程的开展而做调整和被调整。

启动:一种互动过程

应该谨记的是,当调查者着手进行研究时,研究过程很少是直线前进的。系统地提出调查难题和问题、选址、以及生成工作假说,这些步骤更有可能是互动的,而不是分散的。两个例子有助于我们明了这一点。

有位毕业生想为他的学位论文确定一个难题(Jackson, 1991)。有段时间他对年长工人的习惯和体会很有兴趣,但他的兴趣也仅止于此,而没有加以提炼。在他正式的课程论文快要结束时,他成了一所大学的设施部门的实习生。 62
在此实习期,他了解到该部门确实想更多地了解保管员的工作和园艺服务的运作。由于这些领域的许多雇员年纪较大,调查者就把该设施部门粗略提出的难题与他自己的研究兴趣结合起来,想要做一项自然主义研究,关注年龄在50岁以上的那些保管员和园艺工人。下面对一个研究难题的一般性陈述就体现了这种结合:

> 训练文献包括大量对训练年长工人的轶事性和描述性的叙述,而与年长成人训练特别相关的调查发现则很少,而且是支离破碎的。而与那些做低级技术工作的年长工人的训练有关的发现,该文献则包括更少。因此,有必要以调查作为基础建立一种广泛的模式,来帮助推动有效的训练,提供年长成人面对他们将在1990—2000年阶段受到的挑战时的所需。这对于保管员和景观维护工人之类低技术领域的雇员来说,尤其适用(Jackson, 1991,P.3)。

这又引出了下述调查目标:

> 1. 确定大学里年长保管员和园艺工人的训练和维持所需。
> 2. 提出一种模式,推动训练并维持那些年长工人(P.5)。

调查者是以一些隐蔽的工作假说开始的,这些假说指导他系统地提出用于从工人那里收集资料的访谈问题:

> 年长工人能在他们的大多数工作中继续发挥作用。
>
> 年长工人能继续得到训练,只要训练的策略对头。
>
> 长时间地使用年长工人,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作用。
>
> 年长工人,即使做低技术含量的工作,也能在他们自己的再训练中成为重要的伙伴(Jackson, 1992)。

注意,我们所鉴定的不同元素间的自然流动在启动一项研究的过程中很重要。对于不同研究来说,这种流动可能会不同,但调查者能做一些事情来推 63
动它。尽管在上面的案例中,流动是"自然的",但它并非简单地就发生了。

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调查者有明确的兴趣，并对此有相当多的背景知识。他还有意识地置身于有年长工人、有可能产生自发题材的场所（即实习）。

同样还要注意，研究是如何以一种隐蔽的协定出现的——这种协定既可以服务于有关机构的需要（即了解其保管员的工作和园艺服务的运作），还满足调查者的需要（即想找到一个关注年长工人的专题）。这对于自然主义研究来说比较理想。该研究不是对某人做的，而是作为调查者、机构和回答者之间的互利关系出现的。

莫布里（Mobley，1992）在开始她的博士论文调查前，在营养学教育领域工作了25年。这段时间内，她变得日益重视与客户的专业互动，重视这种互动对客户的行为变化产生的影响。由于糟糕的营养模型与低收入、低文化和少数民族高度相关，因此一个基本问题出现了："我们要提出怎样的建议，能对那些面临危险的群体成员的营养习惯造成显著的影响？"因为通过专业接触，她对糖尿病教育领域的人们有所了解，而且因为她有机会进入那些为低收入、主要是少数民族人群开的糖尿病教育班，她对难题的陈述结合了她的兴趣和机会：

> 糖尿病教育旨在满足低收入少数群体的需要，利用媒体节目和设计、生产教育资料得到传播。此外，为增强公众对肥胖与糖尿病发病之间关系的意识，一些节目也在播放。许多对糖尿病教育的研究都关注病人教育是否有助于新陈代谢控制。不过，对于那些被要求参加教育计划、鉴定糖尿病教育原则的适用性的病人，我们还需要了解他们的动机、担心和愿望……教育节目以明显的需求和理论模式为基础，但后者可能并非致力于低社会经济群体的需求或态度。教育需求是由传播教育的人、而不是由那些被要求参加旨在提高对疾病
> 64 的自我管照的糖尿病教育计划的人界定的（Mobley，1991，P.3）。

注意，有些工作假说是在陈述难题时隐蔽地或明示地提出的，比如：

> 出自低收入少数群体的糖尿病人与其他糖尿病人有不同的动机、担心和愿望。
>
> 糖尿病人明显的需求和现存的理论模式可能并非致力于低社会经济群体的糖尿病人的需求。
>
> 传播糖尿病教育计划的人所想的，与参与该计划的人所看到的，以及实际发生的，存在着差异。

这些工作假说接着引出下述调查问题，指引了莫布里的研究：

> 1. 糖尿病并发症干预基金教育计划（Diabetes Complications Intervention Grant Education Program）中正发生什么事情？
>
> 2. 参与糖尿病教育计划的客户/患者是如何看待所发生之事的？

3. 客户/患者希望计划中发生什么事,来帮助他们自我管照其疾病,尤其是管照其营养状况?

结 论

经验丰富的登山运动员知道有件事很重要:在攀登陡峭的山顶时,小心翼翼、有规律地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一次有意识地跨出一步。如果盯着更前面的一步,那么不仅会把自己置身于险境,而且可能造成无法抵制的恐惧,而不敢继续攀登过程。写作毕业论文或做任何重要的研究,就如攀登珠穆朗玛峰,重要的是要特别关注开始的步骤:确定真正感兴趣的、可研究的难题,谨慎地提出调查难题以及表述调查问题,在调查者的资源中鉴定最好的地址。这不但会提升开展计划的可能性,而且有助于确保研究的成功。

进一步的研究 65

1. 比较对比 Whyte(1943)和 Agee & Evans(1988)各自投入其研究的不同方法。或者,如果你愿意,挑选另两种主要的研究进行比较和对比。

2. 阅读 Hollingshead(1975)。在他自己看来,他的研究焦点是什么?把他的看法与 Elmtown 人的看法比较一下,看看结果如何?对于自然主义调查者来说,这有什么寓意?

3. 想想你在第 1 章开始的自然主义研究的焦点。在此阶段,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提炼那一焦点?按照那些步骤行动起来。

设计一项自然主义研究 4

假定自然主义调查者坚持忠实于语境，那么有人可能会问："自然主义研究中难道应该存在调查设计？"对这一重要的质疑，答案是："是的——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主义研究中的设计要极其谨慎：它不是武断地强加给相关语境的，它要考虑到语境全面的丰富性。因此，自然主义研究的设计通常不是在研究开始前就完全制订出来，而是随着资料的收集、初步的分析以及语境得到更全面的描述才自然出现的。

考虑一下传统设计的关键成分（Krathwohl, 1985）：

1. 先行调查的结论
2. 理论视角
3. 调查问题和假说
4. 方法论设计
5. 资料收集
6. 资料分析（描述统计）
7. 结果的意义（推理统计）
8. 结论

尽管其中大多数成分的某些方面也同样存在于自然主义调查设计中，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也能像为常规计划所做的那样，为自然主义调查计划制定相
67 同的先验方案，那就错了。主要差别在于初始调查方案的专一性。自然主义调查者应该考虑那些从先行研究中得来的洞见。事实上，如果有种理论视角是建立在先有的自然主义调查之上，那么自然主义调查者甚至可能就只利用这种视角（Lincoln & Guba, 1985）。自然主义调查者会有调查问题（但不是确定的假说）。至少为了收集资料的预备方法，自然主义调查者需要有一般的方案，但这些方案比起常规研究中的来说，要不确定得多。自然主义调查者需

要考虑在资料收集后如何分析资料，以便确定他（她）的方法能收集到有用的资料。自然主义者需要考虑到其研究的意义，同时记住，可转移性止于相关的接受语境（Lincoln & Guba, 1985; Guba & Lincoln, 1989）。

设计自然主义研究

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 P. 226）为自然主义范式中的设计提供了一个实践定义。他们是这样陈述的：设计"意味着为某些广泛的可能性制定计划，不过，并不确切地针对每一种可能性指出要做什么。"至于如何处理具体的变量和事件，常规调查者需要做出先验的决定，反之，自然主义调查者"把自然环境放在首位"，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自然主义调查者需要为预期的环境制定计划，但是，至于如何处理它们，有关的决定需要留待调查者更好地理解了时间、位置和人类互动的语境之后才做出。

我们在第3章考虑了如何启动研究。做了这项工作后，自然主义调查者下一步需要做什么呢？正是在这点上，许多初入门的调查者感到有些不确定，因为自然主义研究的自发本性拒斥调查者使用许多常规设计技巧和保障。不过，尽管这可能被看成是一种不利，但自然主义范式提供了常规范式完全无法与之匹配的指导和优势。我们会尽力表明为何如此。

社会语境中的常规调查仿照了物理科学中使用的方法；但物理科学与之有重要的不同。就如我们提过的，常规调查尽其可能地把调查者与研究对象 68
隔离开来，不让调查受到污染。在此，我们不打算争论这样的一种立场对于研究原子或兔子有什么样的优越性。然而，这类研究与社会语境中的研究有重要差别。调查者不可能进入原子内部；他（她）只能从外部"看"（即，做出推理并演绎出有关知识）。调查者不可能进入兔子群中，和它们生活在一起，不可能与它们交流和共享建构性现实。然而，对于自然主义调查者来说，进入社会语境的内部、与该语境中的干系人共享建构性现实，以及建构那些既增加调查者的知识、也促进干系人的知识和效验（efficacy）的新现实，这种能力是研究的核心。调查设计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这反过来意味着，在实施前，自然主义的调查设计一直是尝试性的。即便在调查启动后，后续阶段所采纳的形式，也要随着调查者从社会语境本身中得来的附加信息而得到提炼。

常规调查设计建基于所谓的"黑盒"调查之上。调查者提前详细规定，要使用什么样的仪具，在什么样的节点使用，对谁使用（通常是随机选择的，因为，对回答者的质量进行区分，被看作是一种自己强加的限制而被拒斥）。类似的限制也被施加在调查的输出上（即，什么可以作为有效的证据得到承认，以及分类方式）。

用同样的隐喻来说，自然主义调查者爬进“黑盒”的内部（并且发现黑盒内部有光线，这是令传统调查同行感到惊异的事）。在那里面，他（她）能区分干系人，确定他们是如何关联的，并且挑选其质量符合调查标准的回答者。调查者还能对照干系人的建构，来检验其他的信息（他（她）自己的建构，以及文献和记录中的资料），并把他们各自的建构彼此联系起来，这样它们就能得到相互的理解和拓展，共有的建构和赋权也能得到发展。调查者在相关社会语境（黑盒）中开展调查时，他（她）会多次周旋于干系人之间，分享建构、建立共同的理解和定向。最终的研究形式以及报告形式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自然
69 发生的。对这一自发过程的考虑，在自然主义设计中是十分重要的。

不过，自然主义调查者能提前计划一些事情来推动这一自发过程。我们可以简要地一一加以考虑。

1. 交涉和建立入口条件。在第 3 章中，我们谈到了选址在启动自然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性。我们还简略地讨论了建立入口条件的重要性。我们会在本章后面的部分深入讨论这一点。除此之外，继续重建和发展作为研究基础的协定也同样重要，我们将讨论其必要性。我们会在第 7 章中提醒大家注意，在研究启动之前，入口条件实际上不可能跟有关社会语境的监视人彻底商定下来；它们必须随着研究的开展而进行再交涉。为再交涉过程制定计划应该是调查者早期计划的一部分。

2. 为立意样本选择制定计划。调查者必须及早考虑到，不同干系人群体的成员如何被挑选出来，作为研究中初步的回答者。这会在第 5 章中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3. 为资料收集制定计划。类似地，调查者需要着手阐明，他（她）需要从相关社会语境中寻求什么样的资料，最初他（她）认为哪些策略（结合访谈、观察和文献搜索）很可能发现他想要的资料。第 5 章会进一步阐明这些资料和策略。

4. 为资料分析制定计划。同样，即便在调查者正式启动研究前，他（她）也能预想，持续分析会与收集到的资料如何互动；在产生研究报告前，如何开展最终的分析。

5. 为研究中的质量制定计划。可信度是靠研究的实施方式确立的，除了为此制定计划外，调查者还要考虑建立研究的真实性（在第 7 章中会加以讨论）。

6. 为传播研究的发现制定计划。调查者需要考虑到，最终的研究报告的听众是谁、向哪些听众传达的目的，以及最有效的传达模式。

7. 为研究制定后勤计划。调查者需要考虑，研究大概要进行多长时间，如何为研究的各种场所制定进度表，如何支持研究。

8. 回顾临时设计。调查者需要定期重新检查他（她）在临时设计的上述

每一步骤中做的准备。新信息和新条件会产生新问题,这需要调查者改变计划和策略。

一位笔者做的一项研究的进度如表 4.1 所示。

表 4.1 一项中学案例研究的进度表 70

阶段Ⅰ 开始每天的或每星期的杂记 制定先有的民族志 为不系统的、探索性的访谈确定访谈问题 实施不系统的访谈并分组资料 收集关键事件 开始成员核对过程 检查参考资料和人造物 开始资料分析(资料范畴化) 实施负面案例分析 提出初步的扎根理论	阶段Ⅱ 继续杂记 开展同侪报告会议 修改扎根理论 为系统的访谈确定访谈问题 开展系统的访谈并分组资料 继续成员核对过程 继续收集关键事件 继续分析参考资料和人造物 继续资料分析
阶段Ⅲ 继续杂记 开展同侪报告会议 修改扎根理论 继续成员核对过程 提出临时大纲 撰写临时案例研究 开展成员核对 修订案例研究	阶段Ⅳ 开展全面的成员核对(评论小组) 修订案例研究 委派和推动外部审计 离开学校 发布报告

摘自 Skipper, 1989。

当调查者爬进黑盒时,这些要素就变为一张初步的道路图;事实上,它们是设计的一部分,用来回应系统已经提出的调查难题和调查问题。随着设计过程的开展,对该难题的定义、用于跟进它而系统提出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假说,都得到不断的提炼和拓展。当设计被实施时,就有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我们会经常提到),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一互动的、循环的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和设计回顾过程一直持续着,直到出现饱和状态:不再出现有意义 71
的新信息或不再形成主要的新建构。尽管新信息或新现实建构的出现不可能彻底终止,但我们可以认为,当用于搜集新信息所必须的努力"不值得花费额外的精力和资源"(Lincoln & Guba, 1985,P.233)时,就达到了饱和状态。

入口条件

就如我们在第 3 章提到的,获取调查地址的入口是启动研究的一个重要元素。当开始交涉时,入口条件变成调查设计的重要元素。它们限定了调查

者需要做出的许多后续决议。

在约翰逊(Johnson, 1975)看来,获取入口时面对的难题的本质取决于,田野调查者是选择研究大型的、正式的组织,比如福利署,还是研究一个开放的环境,比如街角团伙。此外,难题的本质还取决于,调查者是要做公开的还是隐蔽的调查。在秘密的调查中,调查者不让别人知道他要做的事,这解决了获取入口的难题;但这样的决定并不能保证,该环境中的成员会相信调查者,会让他(她)获得有效的信息。

在对一所最高戒备监狱所做的研究中,调查者了解到,要获得进入监狱的入口,他需要成为一名雇员。结果他经过完整的矫正官训练,成为一名狱警。在监狱工作的期间,他的训练保证了他和其他人的安全。开始时,整个系统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的调查目的。其有利在于保护他不会淹没在那些"磨斧头"的人之中(Fleisher, 1989,P. 93)。其不利是,在囚犯眼中,"当你屁股上挂着钥匙时,我并不关心你……自称什么人,你只是其中的一个"(Fleisher, 1989,PP. 97-98)。

社会学中,更可能的是,在正式组织起来的行政系统或企业里,调查环境不允许做隐蔽的研究;在街角团伙或种族社团这样的环境中,更可能是公开的研究。一些例子有:怀特的《街角社会》(Whyte, 1943),甘斯的《城内村民》(Gans, *The Urban Villagers*, 1982)和利维特《城镇居民》(Gans, *The Levittowners*, 1967),以及加莱赫的《十五年后的潘威里》(Gallaher, *Plainville*
72 *Fifteen Years Later*, 1961)。这种调查类型似乎不同于大型组织中的研究,因为调查者要成功地获得入口,更多地取决于田野调查者与社团里的关键领导人建立善意的能力。确认其他人理解和接受调查计划,这一责任往往主要由该关键领导人承担。要成功地获取入口,部分还需要田野调查者说明其兴趣的能力,而且该说明要得到相关环境中的成员的理解。换句话说,成员想要了解调查者的目的是什么,想要知道其活动的可信根据。换句话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或"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跟你谈话?"对这些问题做出恰当的回答,能促成调查者和回答者之间的交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满足双方的愿望和需要。

不过,按照约翰逊(Johnson, 1975)的看法,这种互动的交易模型是对该过程的一种过分简化,因为它忽视了语境中现存的权力关系的重要性。例如,它忽视了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之所以回答,只是因为上级支持那项调查。另一些人之所以回答,只是为了排遣厌倦或孤独。有些人把回答当成是发泄不满的机会。调查者必须意识到,回答有许多可能的动机。

有些调查者使用三阶渐进入口策略(Johnson, 1975)。例如,在对福利署所做的一项研究中,调查者请求允许与她的同事在下班时间进行访谈,为对社会福利所做的一项更大型的研究计划提供帮助。第二阶段是请求在社工进行日常活动时观察和陪同他们。第三阶段是要获得使用磁带录音机的许可。这些阶段是由"经历"这些要求组成的。换句话说,该过程的根据在于,调查者

担心的是,使用磁带录音机的要求会造成威胁,而且可能遭到拒绝。利用这种过程,即便这一要求被拒绝,调查计划也不会完全搁浅。

有助于获取入口的另一项策略(Johnson, 1975),是从相关组织的管理官员那里获得一封介绍信,或是从大学官员那里获得印有抬头的信笺,或者两者兼具。这样的信可以说服官员为调查者提供行政支持或学术尊重,为调查扫清障碍。经验还表明,这样的信尽可能保持开放,而不是提出较长的、更详尽的提议,防止组织中的任何成员用组织原则拒绝调查。同样,调查者不要把研 73
究锁定在一条途径上,因为随着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进行,它可能与研究设计背道而驰。

在做出获取入口的决定时,有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成功的入口不是调查计划的起点,在此之前,调查者还要收集与有关环境中事物的一般运作方式有关的背景信息。

自发设计

研究设计是调查者的一种努力,它要为某类现象提供秩序,使它们对调查者有意义,而且帮助调查者把那一意义传达给他人。常规调查者一般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能确定,在一给定场所中,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常规设计或设计组合。然而,自然主义调查者认识到任何人类环境的复杂性,进入环境时只带着他(她)认为忠实于该语境、有助于回答相关问题的设计。就如描述性语言学家向当地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一样,自然主义调查者认识到语境的复杂性,他(她)对结构的建立要限制在这样一个范围:对该语境和回答者的现实建构的理解要允许设计自然发生。

调查者发现研究的一个大致焦点、并开始寻找一个地址时,设计就开始自然发生了。确定了地址、做了工作安排时,设计的主体部分就早已就位了。在这个时候,设计仍然有改变的可能,即便在研究正式开始之后,自然主义调查者都要继续寻找途径改善这种设计;但某些重要的决定必须要做出。有两个例子能帮助阐明这一点。

回忆一下第1章的例子,该例描述了,一位笔者作为顾问团的成员是如何承担起评价大型政府机构的教育规划的任务的。读者会想起,该团的任务不会比这更具体了;有了这一整体性任务,作者的职责就是提供对机构的组织分析。就如前面提到的,该职责事实上很模糊,而且该团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推动研究,还要随着它对该机构的理解的加深来设计研究。然而,即便在笔 74
者有了相当程度的结构、并开始设计他的那部分研究时,情况也跟他被邀请参加团队时的是一样的。尽管他以前从没有在这样的机构中工作或学习过,但

它是一个公共机构，而且他既作为参与者、也作为调查者，花过大量的时间呆在公立学校和大学。其次，他被要求提供一份组织分析，而这是他经常为学校和其他教育组织所做的事。他早就对他在这种机构中要寻找什么有了一些想法，也对如何获得信息有了大量想法。此外，作为团队的一员，他同意定期与其他成员聚会一次，提供一份报告，而这份报告可能成为整体评价的一个共存部分。这些要求限制了他要做的事和他做事的方式。另外，尽管对于如何做评估，委托评估的机构没有提供详细的指导或限制，但它要求最终的报告要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准备好。有了调查者的背景、预期，以及团队和雇佣机构设置的限制，大量的候选设计就被排除了。

四年前，一所新开的城内*中学的校长，在开办这所学校并把第一批教员和学生带进来时，邀请这位笔者与他共事。校长与他（当时他是一所地方大学的教授）大体上达成协定：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到学校内的任何事物——教员个人、学生个人、班级、会议、学校活动，等等。另外，笔者还被授权随意接触学校的所有公开文献，而且可以参与一些活动，比如校长的内阁会议，只要他的议程允许。达成协定的还有，笔者要就校园发生的事情提供基本反馈，就如何加强其运作提供建议，但如果会产生负面作用的话，就不要暴露机密的信息或个人的身份。作为回馈，笔者可以自由地为其调查收集与学校有关的资料、分析和使用它们。初步的协定仅此而已，不会再详细，在达成时，很可能无论是校长还是教授都没有绝对确定它会带来什么结果。然而，它是开端，而且，就在作者开始考虑它对其调查的寓意时，一项设计开始自然发生。
75 他对其他中学做过研究，包括同一所城市的另两所学校。因此，即使在他初步与校长谈话的期间，关于如何对访谈和组织做立意抽样，他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因为他在那时计划花一学年的时间呆在学校，而且了解到他大概每周能在校园呆两天，所以他开始为资料收集和中期报告制定大致的进度表。指导他的那些初始问题早就了然于胸了。为其研究所做的设计也在成型，而且，尽管许多未料到的事件可能在一年内改变它的进程，但为研究制定的一些关键指导方针在与校长的第一次谈话中就确定下来了。

一旦研究启动了，自然主义研究的设计就持续出现。随着调查者越来越深入到语境之中，他（她）就会看到，早期的问题和工作假说，无论在启动研究时有多大的帮助，都太过简单了。第一批资料来源又揭示出调查者不可能想到的其他来源。本以为类似组织中出现的规则会在这个组织中出现，但却没有。未预料到的模型和事件要求调查者以全新的方式来思考和观察。刚入门的自然主义调查者，回顾一下初始的临时研究设计，因为发现它显得太幼稚，所以甚至可能料想，它是一项无用的冒险。然而，那些早期幼稚的问题和那项

---

* inner-city，也译“贫民区”或“平民区”——译者注。

临时的、过分简单的早期设计，实际上经常为丰富的研究铺平了道路，而且它们能充当有用的基准，提醒自然主义调查者，随着研究语境得到更充分的理解，研究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步。

在我们的第一个例子中，这位笔者是评估团的一员，调查者在他开始与机构中的回答者进行互动起，对他的初始设计做了一些重大的修改。他使用了他在做组织分析时的惯常方式，要求机构中的每一单位为他提供角色描述及其组织图。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获得一幅地图，帮助他为访谈和观察挑选一个样本，二是为访谈问题和观察进度制定细目。一个单位的主管要这位作者在一天早晨来到他的办公室，表示他的单位有个问题，问他是否能在那天下午花上两小时跟他和他的全体职员呆在一起。会议开始了，单位的职员坦白承认，他们确实没有组织图或角色描述，至少没有常规意义上的，而且他们不确定如何制定。他们在会议上提请作者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发现，尽管职员从没有详细地做出计划，但该单位的运行结构简直是对利克特系统4 76
(Likert, 1967)的教科书式的表征，后者是一种组织，其中，角色的职责以一种相互支持的方式交叠，在个体合作完成组织任务的过程中，赋权给这些个体。尽管许多组织理论家和观察家都大力举荐，但那种组织类型仍不普遍。传统组织图和角色描述与它并不是很吻合。这项发现使作者在观察那个机构（包括每个单位的组织方式，它们与客户、核心管理层、以及彼此之间关联的方式）的方式上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变。调查者针对每个单位提出了新的问题。现在，对这些单位进行比较和对照有了更丰富的基础，对它们的评估也有了更有效的方法。从许多方面来说，那项简单的发现完全改变了那位笔者的设计的本质。那两个小时的会议所提供的信息，本会随笔者深入研究那一单位时自然出现，但在研究中较早出现，无疑为研究的主体部分做出了贡献；如果没有该信息的话，就不可能有这种贡献。僵化的初始设计在这种新信息出现时不能充分利用它，就会遏制它本来能为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

笔者对大城市中学所做的调查设计得到了类似的调整。尽管他在许多中学花了时间，对其中一些学校做了研究，但他发现这所特殊的中学确实在一些方面比较独特；通过研究其人口统计资料或形式上的组织结构，是无法预测到这些方面的。教员之间、与社团成员之间，以及与校长和所有团体之间独特的互动，为这所学校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使之有别于所有其他的学校。危机出现了，不仅有助于调查者、同样也有助于组织中的所有人员界定正在形成的这种文化。有些危机能强化作者关于该文化所了解到的信息。然而，有些危机促使他完全重整他对该文化的现存理解，引导他重新阐述调查问题，而且以他从没预料到的方式改变他的资料收集计划。校长和教员在创造文化的同时就在学习该文化；随着调查设计的自然发生，他们成了作者的热心合作者。 77
“你是否这样考虑过它？”“你是否认为我们正在做的确实不同于其他的中

学?”这样的一些问题驱使笔者不断提炼他的前提,与此同时,他对该校的理解和他用于收集、分析资料的设计变得越来越精确。

丁沃尔、依克拉和墨里(Dingwall, Eekelaar & Murray, 1983)在对大不列颠儿童受虐的研究中发现,他们也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改变研究设计的某些元素。在编辑了27个案例文件、参加11次完全的听证会和25次案例协商会、做了17次访谈后,他们发现他们的程序并没有提供所需的各种信息。他们确定,有一种筛选过程在起作用;它“导致会议显然不能作为〔决策〕的平台;与之相比,承诺事先就做出有效决定的某种行为,反而更为紧要”(P.27)。因此,他们决定把焦点转移到健康和个人社会服务的内部运作上。程序的这种转移导致他们观察和分析“实地工作考察者、他们的监督人、那些做出和接受提名的人提供的候选案例间的持续转换……这引导他们鉴别出受虐或遭到忽视的儿童,确定各种可能的对待方式的分配比例”(P.27)。

即使设计的所有主要部分就位了(调查问题、访谈形式、观察进度和时间线),总还是需要做精心调整。在大量的准备工作后,艾伦(Allen, 1990)提出了下述访谈问题:

1. 你将怎样描述这所中学?

2. 你将怎样描述它的管理?

3. 你将如何描述校长的风格?

4. 在这里,决议是如何做出的?

5. 你看到校长的工作对于其他人完成其工作(学生作为学习者,教师作为指导者,等等)有何影响?

6. 你将怎样描述教员和职员的精神状态?

7. 你在这所中学看到什么问题?

8. 要获得对该校的一种精确写照,我还应该知道别的什么?

9. 要获得对该中学的一种清晰理解,我需要尽可能多地获得不同观点。请检查一下我们访谈过的人的名单。你认为谁的视角不同于这个名单上的人给我提供的视角?

78 不过,他早期访谈的反馈使他添加了两个问题:

10. 关于精神状态问题,我们关注的主要是教员和职员。现在加上学生。你将如何描述学校的风气?

11. 你有什么样的专业联盟?

在长期的资料收集之后,他发现问题11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因此撤掉了它。这个决定很谨慎,是在分析了反馈内容、考虑过它们与其他已获信息之间的可能关系后做出的。对那一问题的回答始终是封闭的(比如“德克萨斯州教师协会”或“美国教师联盟”),似乎与其他问题的答案所蕴含的信息

没有关系。其他问题都提供了与调查问题有关的大量信息。它们还偶尔提供有趣的、但与研究无关的信息。比如说,有位老师在回答精神状态这个问题时,答案中有段评论:"当某位学生缺课或行为不当时,系里的办公室没有电话,我就很难打电话给他父母。"尽管该评论应该被认为是与这位教师的心理状态有关,但对于学校全体教员和全体职员的整体精神状态来说,可能没有多重要。调查者有义务考虑所有搜集到的信息。有的信息后来可能会被认为太琐碎,即使吸纳进来也不会深化对相关环境的深描。如果有几个来源报导了没有电话造成的不便,或者如果这种不便似乎与其他教员的类似关注有关,那么就应该得到深入的考虑,因为它很可能与全体教员的精神状态有关,从而与学校的整体文化有关。假定一种评论可能开始显得无关,但后来发现极有关系,那么最好的做法是宁可失之谨慎地过度吸纳,直到完成资料分析。

总 结

比起常规调查设计来说,自然主义研究的调查设计的这些元素既要复杂,也要灵活。像语言一样,它们力图划分和安排调查者的活动,以便人类心灵能与新遇到的经验恰当地关联起来。不过,与常规调查设计不同的是,它们组成了一种"语言",它随着经验转移和新的经验出现而迅速做出调整。对自然主 79
义设计的复杂性不可能做出精确的预测;最多只能在研究结束后,靠追踪它在调查者的日记中的演化而得到描述。对初入门的自然主义调查者的最好建议是"要灵活"。就如我们所概述的,构成自然主义设计元素的准备方案,在实践中经常很难彼此隔离开来。它们会混合在一起,随着研究设计的持续展开而转移。因为人类心灵需要一门语言来把它自己投射到新的领域,因此,我们相信,我们概述的这些元素有助于新进的调查者。然而,调查者必须使用它们来培养自发设计,不要规定它的落实细节。用灵活性处理复杂性的能力,是自然主义调查者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

进一步的研究

1. 评论下面列举的一个或更多研究:Whyte(1943),Wolcott(1973),Hollingshead(1975),Lightfoot(1983),Agee & Evans(1988),或你喜欢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推断作者在其工作初期心里所想的设计。概述你就其中一项研究制定的设计。

2. 为你在第1章开始的自然主义研究提出一种初步设计。该设计应该足

以令你为之做研究的那些人满意。如果可能的话，从那些人那里取得书面反馈。对这些反馈做出书面回应。

收集资料 5

婴儿在收集和分析大批资料方面有惊人的能力。他（她）来到世上时，实际上一无所知，被味道、气味、视觉和声音轮番轰击。随着他（她）开始理解直接的世界并与其关联起来，结论就自然出现了。比如，一个微笑或一声咯咯笑，就对成人挤笑脸或重复无意义的短语做出了恰当的反应。哭喊一声就会引来成人为他（她）喂食或换尿布。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孩子开始使用语言来分类那些包围他（她）的不系统的经验。词语、短语和手势有助于他（她）与其他人交流，有助于强化关于环境所做的一些结论。

这一自然的归纳分析——或从异质的、具体的大量资料中建构意义——经常在正式教育过程中被抑制了，大多数成人必须进行再学习。教育系统经常用演绎的和说教的方法取代发现学习（discovery learning）；而且，当一个人进入研究所时，他（她）必须重新拾获最初自然出现的东西。在本章，我们将考察自然主义调查者如何搜寻和收集一些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资料，帮助他（她）打破分散的建构性现实之间的屏障。 81

收集资料的目的

自然主义研究中，资料收集的初始目的是获得一种能力：建构与环境中居民的现实建构相一致和相容的现实。这要求自然主义调查者能经验到“本地人”的经验，能以他们看待该经验的方式看待它。一门共同语言（如英语）有助于调查者进入环境，也能帮助资料的收集，但在获得入口之后，正是这门“共同”语言经常抑制了意义的流动，因为它的使用掩盖了调查者和回答者在建构性现实方面的差异。现在，由于推动意义流动的人主要是调查者，因此调查者必须采取公开的措施来克服这一障碍。回答者一般不会意识到，词语的

词典意义并不必然引导调查者忠实地重构回答者的现实。回答者在谈论他(她)的建构性现实时,并不总是能令调查者感到完全满意,因为,就如鱼会在一段时间内难以看见水一样,回答者不大可能意识到,共同语言会激发不同于他(她)正使用的那些建构。

出于这一原因,自然主义调查者要从各种来源那里收集资料,而且,最好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收集。回答者要回答问题,但同样也要受到鼓励,与调查者进行不那么系统的谈话,促使他们隐藏着的假定和建构开始浮现出来。要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中观察他们,这样调查者就能开始看出他们所说的东西的操作意义。调查者能从文献中获得对他们的建构性现实的深入洞见,这些文献为解释他们的话语和活动提供了一种历史语境。混乱的职务安排、墙上的运动奖牌、一尘不染的休息室,反映了一些价值,它们能帮助塑造回答者的建构性现实。从所有这些来源收集到的资料被放到一起,在与资料收集平行的过程中得到系统的分析。内行的自然主义调查者能逐渐以一种方式清楚地阐述回答者的建构性现实,而这是回答者不可能做到的。如果有位回答者阅读
82 完最终的研究报告后问到:"你怎么全都知道?",调查者就满意了。

自然主义调查在收集、分析和从资料中建构现实时,牵涉到五官和直觉的使用,这是人生在世上就有的。这种调查类型中,首要的仪具就是调查者本人。依赖于其所有的感官、直觉、思维和感受,人类仪具能成为非常有效的和灵敏的资料搜集工具。此外,人脑在其无数的复杂功能和能力方面是无与伦比的。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说明了为何自然主义调查者提倡把人类作为首要的资料搜集仪具:

> 由于实际上不可能设计一种先验的非人类仪具,其充分的适应性能容纳和适合可能遇到的各种现实;由于认识到所有的仪具都与回答者、对象是互动的,但只有人类仪具能把握和评价那种独特的互动的意义;由于仪具的使用影响到其他元素的互相塑造,而只有人才能察觉和评价那种塑造活动;而且,由于所有的仪具都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并与局部价值互动,只有人才能识别和考虑(在某种程度上)那些作为结果而产生的成见(PP.39-40)。

立意抽样

立意抽样在自然主义调查中非常关键。随机或代表性抽样不是优选,因为调查者的主要考虑不是把研究发现概推到广泛的群体或宇宙,而是最大限度地发现具体研究语境中出现的异质模型和问题。利用人类仪具所做的立意的、定向的抽样,扩展了被揭示的资料范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调查者鉴别自发主题的能力——这些主题充分考虑了语境条件和文化规范。

巴顿(Patton, 1990)写到:

> 立意抽样的逻辑和力量在于为深入研究选择信息丰富的案例。信息丰富的案例意味着,人们能从中了解到对于调查目的来说显得至关重要的大量题材,因而就有立意抽样这个术语。例如,如果评估目的是增强一项规划在[较低的]社会经济群体中的影响力,那么把焦点集中在深入地理解那些被慎重地挑选出来的少数贫困家庭的需要、利益和动机上,而不是对整个规划做大型 83 的、统计上有代表性的抽样,并从中搜集标准化的信息,所获就要多得多。立意抽样的目的是挑选信息丰富的案例,对这些案例的研究能阐明研究问题(P. 169)。

调查者在立意抽样时要做两个基本的决定。第一,他(她)必须挑选一定的人和物来做研究,即,那些最能帮助回答基本调查问题和最适合基本研究目标的来源。第二,调查者必须排除不调查的人和物;也就是说,必须有一种筛选过程,以便缩小所有可能的来源库。

巴顿(Patton, 1990)提出了几条不同的策略来做这两项决定,包括:

- 抽样极端的或异常的案例,获取与特殊的或不寻常的、可能是麻烦的或有启发性的案例有关的信息;
- 深度抽样检查那些深度但不极端显示有关现象(如,好生-差生,中等偏上-中等偏下)的案例;
- 最大变异抽样在于援引一些独特的变异,它们是在适应不同条件的过程中自然发生的。
- 同质抽样聚焦、减少变异,简化分析,以及推动群体访谈;
- 关键案例抽样允许信息向其他案例的最大应用和逻辑概推;
- 标准抽样在于挑选符合某一标准的所有案例,比如在门诊所里受到虐待的儿童。
- 机会抽样允许在实地考察过程中遵循新的指导,利用未料到的新事情和灵活性的优势;
- 随机立意抽样(仍旧是少量的样本量)为一个样本增添了可信性,当潜在的立意抽样超过调查者的负荷时(不是为了概推度或代表性);
- 政治上重要的案例抽样,为研究增加了关注度(或有意地清除政治上敏感的案例,来避免不想要的关注);以及
- 便利抽样节约时间、金钱和精力;最差的基础和最低的可信性;产生信息贫乏的案例。

立意抽样的另一个因素是样本量。基本的规则是,"样本量没有规则。"在质性研究中,更多的是寻求质量而非数量、信息的丰富度而非信息量。例 84

如,巴顿(Patton, 1990)提醒我们,皮亚杰通过长期深入地观察他自己的两个孩子,帮助我们理解小孩是如何思考的。弗洛伊德把其发现建立在对不足10个客户案例的心理分析之上。彼得斯和沃特曼(Peters & Waterman, 1982)在对62个公司做了考察后,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关于组织优秀的原则。

巴顿(Patton, 1990)补充说:

> 最终,抽样量是否充分,就如调查的所有方面一样,要接受同侪的评论、一致的确认和判断。关键是,抽样程序和决议应该得到充分的描述、说明和辩护,以便信息使用者和同侪评论人有恰当的语境来判断该样本。调查者或评估者绝对有义务讨论该样本是如何影响有关的发现、抽象程序的优点和弱点,以及任何其他与解释和理解报告结果有关的设计决议(P. 186)。

巴顿认为,使用少量立意样本的定向效力,避免从中做出过分概推,调查者能大有可为,减轻对不充分的样本量的担心。

我们可以在玛利尔(Maril, 1983)对德克萨斯捕虾者所做的民族志研究中,看出立意抽样中的思维过程:

> 深入访谈在1978年、1979年和1980年的夏季继续进行。最终大约收集了来自8处不同港口的150次访谈……
>
> 只有那些在墨西哥海湾定期捕鱼的捕虾者才被访谈。那些在德克萨斯海湾和海峡用网捕虾的渔民则排除在样本之外。这些海湾捕虾者每日捕鱼,当日落时返回海岸;他们在水上工作,在陆地上生活,完全不同于在公开海湾捕虾的人。
>
> 访谈了58位船长和船东,还有[48位]索具操纵人员和[37位]队长。根据以前的经验,我知道索具操纵人员和队长是最难访谈的,因为他们最难找到;尤其是,队长是边缘化的劳动力,社会联系经常有限。同样重要的是,我意识到,索具操纵人员和队长不喜欢回应一位陌生的访谈者,他们中有很大一部
> 85 分人都是没有正式证件的工作者(PP. xv-xvi)。

资料搜集来源

在质性资料搜集和分析过程中,要注意为具体语境的社会和文化维度建构一种全面的、整体的描绘。为了获得这种整体的质性描绘,每一个案例、地址或事件要被视为一个独特的实体,有其自身的特殊意义和自身的关系群,这些意义和关系是在它存在的那一语境中自然出现的,而且依附于该语境(Patton, 1990)。调查者的工作是揭示语境中这些显著的和微妙的维度。布

鲁恩(Bruyn, 1966)激励参与观察者"寻找被观察者的生活的本质,总结和发现一种核心的统一原理"(P. 316)。

在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有时候很难区分收集结束和分析开始的时间,因为搜集和分析是互补的、持续的,而且经常是同步的过程。不过,资料收集的基本手段和来源会在本章加以讨论,而资料分析在第6章才谈到。在自然主义调查中,调查者基本上可以使用四种一般来源:访谈、观察、文献和人造物。

登津(Denzin, 1987)反思了他对酗酒者的体验的研究,他提到了这些互动来源的贡献:

>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我都在编织自我的生活故事,把酗酒者呈现给读者,就如他们把自己呈现给同道中人一样。我同时还以各种三角测定的形式,组合大量的资料和方法,包括访谈、观察、参与、档案分析、文本批判、符号学,以及对酗酒的虚构描述和自传描述的研究(P. 24)。

访谈

许多人认为访谈就是一个人(即调查者)问问题,而另一个人(即对象)回答问题。然而,在自然主义调查中,访谈更多的是采取对话或互动的形式。德克斯特(Dexter, 1970)把访谈描述成一种有目的的交谈。访谈能使调查者和回答者及时地反复沟通;帮助他们重构过去、解释现在和预测未来(Lincoln & Guba, 1985)。访谈同样有助于调查者理解较大的语境,并把环境中人际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层面带入到该语境之中。费特曼(Fetterman, 1989)写到:

> [访谈]要求言语的互动,而语言是谈话的用品。词语和措辞在不同的文 86
> 化中有不同的涵义。人们交换这些言语用品来进行交流。[调查者]很快学会体会信息提供者的每一个词语的文化或亚文化内涵和它的外延意义(P. 48)。

访谈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其范围从非常集中的或主导性的,到非常开放的,没有什么是预先就设定好的。不过,最常见的是半系统的访谈,它受到一套需要探究的基本问题和主题的指引,但无论是确切的措词还是问题的顺序,都不会事先确定下来(Merriam, 1988)。殷(Yin, 1984)补充说:

> 最常见的案例研究访谈具有一种[开放的]本性,其中,调查者可以问一些关键的回答者关于事实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问回答者对实践的一些看法。在某些场合,调查者甚至可以要求回答者提出他们自己关于某些事情的见识,而且可以把这样的一些见识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

这一开放的或非正式的访谈过程类似于、但又不同于非正式的交谈。调

查者和回答者以一种混合了交谈和置问的方式进行对话。费特曼(Fetterman, 1989)做了进一步说明:

> 问题一般是从交谈中自然出现的。在某些案例中,它们是偶然出现的,源自参与者的评论。在绝大多数案例中,〔调查者〕有一系列问题要问参与者,而且会在交谈过程中等待最恰当的时候询问他们(如果可能的话)(P.49)。

弗莱雪在加里福利亚州隆波克的联邦监狱里做过调查,在此过程中,无论什么时候进入一个监狱分区,他从不告诉监狱里的职员说他们正在接受访谈。"作为雇工,我与某个在上班时间的雇工或顾问一道工作时,我们'只是聊聊'"(Fleisher, 1989, P.102)。

然而,我们不应该产生一种印象,以为访谈应该悄无声息地进行。在进行有目的的交谈前,调查者应该做大量的思考和准备。有一些指导方针能帮助
87 调查者进行访谈。

一个指导方针是,调查者和回答者应该有共同的词汇。访谈要求言语的互动,而术语和微妙之处需要尽可能地清楚,并得到相互的理解。词语和措辞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意义,个体通过交换这些言语表达的涵义来进行交流。调查者不仅应该鉴别他(她)和被研究文化共有的术语,而且要鉴别有多重意义或有分歧意义的术语。此外,问题必须得到谨慎的表达,以便获得贴切的信息。巴顿(Patton, 1980)做了如下说明:

> 使用被访者能理解的词语、反映回答者的世界观的词语,能提升访谈中获得的资料的质量。在许多案例中,假如被访者对具体的词语没有感受,那么答案可能根本没有意义,或者可能就没有答案(P.227)。

老练的访谈者能从被访者使用的词语中了解大量的信息,超出了那些词语的外延意义。这种技巧对于获得它的自然主义调查者来说,显然是一笔巨大财富。对于那些希望发展此技巧的新进调查者,我们强烈推荐斯普拉德利的《民族志访谈》(Spradley, *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1979)。就如斯普拉德利指出的(P.9),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编码在语言形式中,调查者既能从偶然的闲谈、也能从长时间的访谈中获取大量信息。这本真正实践性的、高度集中的书详细地描述了如何鉴别有效率的回答者,与回答者如何形成有效率的关系,如何从回答者的话语中做出推论。它精彩地表明,词语如何使交流得以可能,但又经常向局外人隐藏了关键的文化意义。它描述了局外人〔调查者〕如何从被访者的词语中做出推论,打开先前被隐藏的意义。

谨慎地选择问题的措词,是调查者在访谈过程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西摩(Seymour, 1988)举了两个例子阐明了这一点,它们来自销售领域里所做的质性研究。

> 在最近的汉堡王/麦当娜的比较广告中,汉堡王声称,他们的火烤比麦当

> 劳的油炸受到更多人的喜欢,相差大概是三比一。关键的问题是"你是喜欢火烤的汉堡还是油炸的汉堡?" 88
>
> 夏皮罗,一位独立的调查者,决定用另一种方式问这一问题:"你是喜欢把汉堡放在热的、不锈钢的烤架上烤,还是喜欢把生肉放在敞开的煤气火焰上烧?"结果有53%的人喜欢麦当劳的烧烤过程。
>
> 罗佩尔准备在《财富》杂志上就民众对政府力图维护和平的努力的态度做一项民意调查,预备了下述调查问题:"美国是否应该倾力促进世界和平?"97%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美国是否应该参与那些促进世界和平的规划?",问类似的回答者这个问题时,只有60%的人持肯定答案(PP. 141-143)。

弗莱雪(Fleisher, 1989, 第12页)在研究监狱的过程中,发现监狱里的世界有着自己的词汇,其中,惩教官把囚犯称为"歹徒"而把他们自己称为"看守"。囚犯经常把他们自己称为"暴徒"(Fleisher, 1989, P. 114)。在他的研究中,囚犯和狱管使用了大量监狱词汇,比如说瘸子(洛杉矶的一个街头帮派)、菜鸟(新来的一位囚犯)、烤架(一个铁条门)、墨迹(一种纹身)、PC(保护性羁押)和邮局(一个工作地点)。

从对话中获取丰富的资料,其关键在于提出好问题,仔细地聆听和做记录。准备一些反映基本调查问题和研究难题的一系列措词谨慎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不过,调查者必须谨慎些,不要受到那些问题的限制,要让它们在访谈过程中自然地出现。梅里姆(Merriam, 1988, PP. 78-79)引用了巴顿(Patton, 1980)描述的六种基本问题,它们能用来获得不同类型的资料:

> 1. 经验/行为问题旨在引出对经验、行为、举止和活动的描述(比如,"你做管理人的时候,有哪些经验是记忆最深刻的?")。
>
> 2. 观点/价值问题旨在发现人们想什么。它们告诉了人们的目标、意图、欲求和价值(比如,"你为什么当个老师?")。
>
> 3. 感受问题旨在理解情绪反应(比如,"当行政机关要求你调到不同组织层时,你有何感受?")
>
> 4. 知识问题旨在获得事实方面的信息(比如,"这所学校有多少老师?")。
>
> 5. 感觉问题确定回答者对什么样的感觉刺激——视觉、声音、触觉、味道或气味——感到敏感(比如,"你为什么喜欢在你的房间摆上植物?")。 89
>
> 6. 背景/人口统计问题旨在了解回答者的教育、先期经验、年龄和住所等(比如,"你能简要地说明一下你的教育背景吗?")

有些类型的问题应该予以避免。例如,要避免那些可能歪曲被访者的问题,或有抵触性的问题。"校长在今年辞退了你,你有何感受?"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梅里姆(Merriam, 1988)进一步忠告:

> 避免多重问题——或者实际上是一个双关问题,或者是一系列的单个问题,无法让回答者有机会一个个地回答(比如,"你对这所学校的全体教员和课程是怎么看的?")……同样也应该避免引导性问题。这样的问题会导致回答者接受调查者的观点。"在丢掉工作后,你有什么情绪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一种成见,暗示了丢掉工作的任何人都会有情绪问题。最后,所有的调查者小心不要提出是/否答案的问题。用简单的是或否就能回答的问题,很可能太过简单,而没有价值(P.80)。

伦理考虑应该永远居于自然主义调查的前列。每个调查草案所共有的第一要素,就是调查者对研究中的人和群体的尊重。访谈牵涉到的伦理问题包括:调查者的动机和意图、研究目的、利用匿名来对回答者的保护、预先确定对于研究内容谁有最终的发言权、对卷入研究的被访者的时间和数量的敏感性。有时候一些未料到的环境可能给回答者带来伤害。有时候,回答者由于一些出现在访谈中的非常敏感的资料,而身陷易受攻击的境地。调查者和回答者也时常形成一种类型的关系,带给调查者一些可能给个体或群体造成伤害的私人信息。几乎所有用于搜集资料的策略都存在伦理的维度。调查者最好是谨记,在自然主义研究中,回答者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十足的伙伴。调查者的目标是理解收集到的资料,通过它们看到回答者的建构性现实。在获许进入回
90 答者的这种非常私人化的世界后,调查者能有什么权利来伤害或摧毁这个世界?

记录访谈资料最好的一些工具是笔和法律垫*。一列预先设计好的、得到谨慎措词的问题,在必要的时候,应该方便得到检查。进入访谈的最好途径,基本上就是进入谈话的最好途径:"你怎样开始教书的?""谈谈你自己。""你究竟喜欢这所学校的什么东西?"如果可能的话,在谈话过程中做下记录,在访谈后留些时间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记下你的回复,注意你可能遗漏的任何细节。

弗莱雪(Fleisher, 1989)在他对监狱的研究中,从没有藏起他的口袋记事本,而且当他与人交谈的时候,随意地使用它,尽管有时候他要从事惩教任务,需要他的注意力或身体活动(例如,彻底搜查一位囚犯),而不可能使用记事本。尽管监狱里的所有狱警不反对在他们面前记录信息,但同样的行为最初令罪犯感到紧张。后来,随着他们适应了弗莱雪的双重角色,这不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围绕访谈者希望探讨的核心问题和主题而组织好的计划,是半系统的访谈中最重要的工具。访谈者应该把它们写在纸上,也应该把它们不可磨灭地印在心里。这样,当回答者自发地渐渐应对议定好的、但还没问出来的问题

* legal pad,有译为"横线薄"、"拍纸薄"等——译者注。

时，访谈者就能利用个中的好处了。利用回答者的自发行为的好处、而不是由于维持访谈的进路而抑制自发性，这种能力是极其重要的。合适的后续问题旨在获得新领域中附加的必要信息。有时候，访谈者可能发现，在回到最初的主题前，充分地探讨这一附加的领域，是大有可图的事情。好的访谈计划能为调查者提供这种灵活性。

许多调查者提倡使用录音带或录像带记录装置。这可以确保所说的全部东西都记录在磁带上。此外，调查者能在听或看带子后，对其访谈方法进行反省，来改善访谈策略。用磁带记录访谈的一个不利是，回答者有时候过分注意记录装置。（不过，就如弗莱雪在囚犯面前做记录时所发现的，对于法律垫和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里应该使用个人的判断力。）另一个问题是设备失灵。很多时候，调查者记录访谈，同时做笔记来确保质量和可信的资料。记住，有效资料的流动永远是优先的。如果回答者对某类型的设备感到不适，那 91
么应该消除那些有抑制作用的东西，保持资料的流动，让它得以继续。

确定回答者

回答者是访谈中的关键人物。他们作用很大，因为他们的视角对于洞悉和理解有关现象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社会学家把好的回答者说成是报导人，他们理解文化，同时有能力对它进行反思，并向调查者说明正在发生什么（Merriam, 1988）。被访者的态度、倾向和立场，在塑造语境的整体图景方面，显得异常重要。因此，选择好的报告者，这是调查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好的报告者"是能就研究主题表达思想、感受、观点和视角的人"（Merriam, 1988, P. 76）。

确定回答者，要以调查者想知道的东西为基础，同时还要从那些其视角符合调查者所需信息的人中选择。看哪些个体能为理解研究中的现象做出贡献，在此基础上挑选个体，这意味着要进行立意抽样（Merriam, 1988）。举例来说，在对一所学校价值的教导策略进行的质性研究中，教育纲领的整体图景要包括大批人士的体会，包括老师、学生、父母和社团成员。

第一个被挑选出的回答者，可能是由于监视人指定的，可能是因为他（她）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结构中地位明显，甚至可能只是因为调查者容易找到。当从这位回答者那里收集信息接近尾声时，就要以他（她）提供的信息为基础，挑出第二位回答者（经常是在第一位回答者的公开帮助下）。在挑选每位新的回答者时都要重复这一过程。开始的时候，回答者被挑选出来，是因为他们可能为调查者的理解提供新的建构。在该过程的后期，回答者被挑选出来，更可能是因为调查者发现他们有能力详细地阐述或清楚地表达早就被引 92
入的建构。因此，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 1989）提到，回答者是"连续地"（一次一个）和"依情况而定地"（以从先行回答者那里了解到的信息为基

础）挑选出来的。

准备访谈

这个步骤既包括调查者也包括回答者的准备。调查者必须为访谈做准备工作。这种工作包括决定恰当的问题和它们的顺序、练习与恰当的替代性角色进行的访谈、决定访谈者自己的角色、衣着、礼节层次等（Lincoln & Guba，1985）。调查者同样必须让回答者做好准备，让他（她）在访谈过程中尽可能感到舒适和从容。为被访者提供有关的研究信息、保证使用匿名、说明访谈资料会做什么样的处理以及不做什么样的处理、跟回答者一起确认访谈的时间和地点，这都能帮助被访者在接受访谈时感到舒适。

启动访谈

泰勒和博格丹（Taylor & Bogdan，1984，P. 87-88）提议，在每次访谈开始时都应该对五个问题做出说明：

1. 调查者的动机和意图，以及调查目的
2. 利用假名保护回答者
3. 对于研究的内容，谁有最终的发言权
4. 报酬（如果有的话）
5. 时间和地点这类后勤问题，以及议定要进行访谈的次数

开玩笑以及缓和紧张气氛在访谈中很重要，回答者应该有充分的热身时间。一些泛泛的问题（例如，"你怎样进入教育界的？""能稍微谈谈你自己吗？""你喜欢你工作的哪些方面？"）为被访者提供了放松的机会，能聊一些没有威胁性的话题。

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1985）暗示，这些"大漫游"（grand tour）问题"使回答者有机会练习与访谈者在宽松的氛围下的谈话，同时就回答者如
93 何建构语境的一般特征，提供有价值的信息"（P. 270）。

在访谈中保持效率

有些策略能提升访谈的质量。不过，最好的策略就是在访谈中保持自然、做回自己。费特曼（Fetterman，1989）持相同的看法：

> 保持自然比任何表演都有说服力得多。扮年轻并不能赢得青年的信任，只会令他们怀疑……首先，民族志训练强调要在包括访谈在内的实地调查中做到诚实。在访谈环境或其他地方，欺骗性的游戏没有市场。其次……目的是要从被访者那里获得信息，不要让他（她）他知道提问者关于相关领域有多少了解。第三，即便完美的演员也会在长时间的访谈中犯错，因而削弱了可信

性。保持自然是最好的防护措施(P.56)。

在访谈中,一个常见的程序是以泛泛的问题启动访谈,随着访谈的进展而变得越来越具体。有时候,访谈者需要与回答者共同探索或遵循一条特定的思维路线。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做了如下说明:

> 老练的访谈者擅长使用探测器——定向的信号,用于寻求更多的或扩展的信息。探测器可以采取沉默的形式(回答者排斥听觉真空,但必须清楚,"轮到"回答者发言了);"抽水机"的形式——如"un-hun"或"umm"这样的声音,或是鼓励性的挥手;简单地要求更多信息("能告诉我更多吗?");要求示例;要求对访谈者的复述做出反应("你觉得我理解了你说的……吗";或"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你的话,你似乎说的是……"),或对一些简单问题做出反应——访谈者特别提出这些简单问题是为了润色或拓展回答者所说的内容(P.271)。

就如费特曼在上面所提到的,访谈者应该谨记,被访者在其所知、所解和所感方面,是专家。访谈者的工作是进入被访者的这个丰富的资料库,而不是强行施加他(她)自己的解释或建构,即使不是有意的。访谈者应该集中取得最完整的图景,能传达被访者的相关现实建构。 94

结束访谈

明确的开始和结尾对于访谈过程来说很关键。当访谈结束时,访谈者应该回顾或总结一下,根据他(她)的理解,哪些是访谈的重要部分;给回答者充分的机会,澄清或修改可能造成混淆或不悦的那些方面;感谢被访者的合作;用一封感谢信作为访谈的补充,指出回答者提供的信息的价值。在终结访谈前,调查者经常从回答者那里寻求一种附加信息:鉴定其他可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来源的人。通过询问一些问题,如"关于这个主题,还有谁能提供信息?"或"谁可能对此持不同的看法?",调查者经常能利用局内人的知识来丰富他(她)的立意抽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结束原则是永远不要做最终的结束。也就是说,访谈者应该尽力一直开放调查者和回答者之间进行交流的通道。"如果你想到还有什么对于研究比较重要的,请联系我";"为了进一步的澄清,稍后我可能联系你。"这样的一些表达有助于保持交流通道的开放。

访谈对于搜集资料有重要价值。在调查者探测和提出适合于回答者的知识的问题时,它们有助于他(她)及时地来回应对。它们能帮助调查者发现人们想什么、一个人的理解与另一个人的理解比较起来如何,有助于把那些不同的反应放到共同的群体信念和主题的语境中(Fetterman, 1989)。

观察

自然主义调查者搜集资料的第二个来源是观察。马歇尔和罗斯曼

(Marshall & Rossman, 1989)是这样定义观察的:"对被选择出来做研究的社会环境中的事件、行为和人造物的系统描述"(P. 79)。访谈有助于调查者及时地来回应对,观察能使调查者在五种感官的帮助下发现环境的当下互连(interworking)。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 1981)说明了观察的力量:

95 因此,为观察所做的基本的方法论论证,可以总结如下:观察……最大化调查者的下述能力:把握动机、信念、关注、利益、无意识的行为、习惯等;观察……能使调查者以其对象的方式看世界、生活在他们的时间框架中,就现象本身来理解它,就环境中的文化本身理解处于自然状态的、持续发展着的文化;观察……为调查者提供机会内省地体会群体的情绪反应——也就是说,在一种真正的意义上,它能让观察者把他自己作为一种资料来源;而且,观察……能让观察者在隐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他自己的知识和群体成员的知识(P. 193)。

观察同访谈一样,能采取很多形式,从非常集中的到不系统的。在研究过程的早期阶段,观察不要那么系统,以便观察者能拓展其隐性知识,并对有重大影响或突出的东西有所把握(Lincoln & Guba, 1985)。通过比较这些类型的观察,调查者能用宽角度的照相镜头捕捉环境的图像。在哪些限制该图像的范围,不应该提前决定;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让焦点得到发展和演化。一位笔者在《鉴定中学的整合价值教育途径》(*Identifying Integrated Values Education Approaches in Secondary Schools*)这项自然主义研究中示例了这一过程:

我只通过仔细地观察,就发现了数量惊人的重要的、深度的资料。没有什么是太微不足道或不重要,而不值得做记录。例如,教室的装饰细节、老师和学生的特殊习惯、空教室(即,椅子、黑板报、架子上的书,等等)、课堂上学生之间的非口头式交流、午餐或课间休息时学生与老师间的交流、上学前和放学后走廊里的情况,以及许多其他细微的细节都被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晚上我会看看我的日常记录,而且经常回想起一些可以添进资料库的事件、谈话、评论和场景。事实上,我是在用我自己的眼睛这种敏感的、宽角度的镜头来给学校照了张书写照片。这个过程使我能捕捉到当时在那所学校看到的生活,同时把对自然环境的侵扰降到最低。资料搜集过程中的集中谈话和访谈有助
96 于加强和阐明这幅整体的图景(Harris, 1991, P. 182)。

这种过程鉴别有重大影响的、突出的特征,"捕捉"被观察的组织的"生活",该过程要求有一段充分的时间,在自然主义研究中开展丰富的、有效率的观察。莫布里(Mobley, 1992)在对糖尿病患者的研究中提到,还需要时间来让观察者融入被观察的语境中,这样她的出现本身就不会成为被观察行为

的一种主要诱因。

观察可以用几种方式划分，这取决于调查者和环境之间想要有的关系。巴顿（Patton，1980）提出了一个连续统，在做质性研究的过程中，它可以用来思考个人的角色和关系。在该连续统的一端是完全的参与者，他（她）是有关群体的完全成员，但隐瞒了作为观察者的角色。在另一端是完全的观察者，或者远远地隐蔽地观察相关群体，或在餐馆或机场这类完全公开的环境中伪装自己。这两端都有很高程度的保密性，而隐蔽研究有许多的伦理问题。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1985）评论说，“伦理考虑要求，除非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否则要避免隐蔽性”（P.274）。

在绝大多数实例中，自然主义调查者会选择一种居于两端之间的角色，或者作为参与观察者，或者作为观察参与者。当以参与观察者的角色出现时，调查者的活动被群体所知，服从于调查者作为参与者的角色。玛利尔（Maril，1983）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参与者观察的例子。

为了从捕虾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工作，玛利尔（Maril，1983）在1977年的夏季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充当墨西哥湾的一名捕虾队长。尽管开始的时候他发现他几乎不可能做这项工作，但他渐渐以一种合理的进度学会领导捕虾者。他还做饭，清洗船只，有时候在其他成员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时，负责看舵。尽管他的同伴从没有忘记他并不完全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海上工作的共同要求把他们中的四个人变成了朋友和同事。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下，玛利尔就能直接地理解和感受捕虾者因为捕虾的经济不稳定而感到的焦虑、长期远离家庭和亲人的体会。在参与者观察的这个阶段，他系统地记录了渔船上发生的每件事情。三个星期的紧张体验让他获得了一些洞见和现实建构，这 97
是他不可能从陆地上的捕虾者那里获得的，甚至也不可能通过与回到陆地上的相同人员进行访谈而获得。

在观察参与者模式中，调查者参加到群体中，从属于作为信息搜集者的角色（Merriam，1988）。在现实中，调查者可以游移在这些中间角色之间，或者寻找一种平衡。梅里姆（Merriam，1988）简要地提出了在做这种决定时的一些考虑：

> 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当一名局内人究竟有多大好处？本身就是群体中的一员，“走向自然”，或只是当一名成员，并不必然提供研究相关现象所需的视角。贾维（Jarvie，1982，P.68）提到：“游行队伍中的人对游行队所做的观察没什么特别的。旁观者的立场更好……”另一方面，史卫舍（Swisher，1986）能够从一个保留社团（reservation community）的父母和教师那里获得有关多重文化教育的可信信息，因为她本人就是该社团的一员。巴顿（Patton，1980，P.128）强调了所需的平衡……：“以局内人的身份体验这一计划，要求参与者观察的参与者角色。不过，与此同时，该过程显然存在着一种观察者的角色。所

面临的挑战是要把参与和观察结合起来，以便能够作为局内人理解该计划，同时又能为外人描述该计划（PP. 93-94）。”

重要的是观察和记录环境中发生的每件事情，因此调查者必须在某处以某种类型的计划开始。梅里姆（Merriam，1988）就观察中可能出现的因素，编辑了下述清单：

1. 环境：物理环境如何？语境是什么？该环境可能激励或抑制什么类型的行为？

2. 参与者：描述现场有谁，有多少人，以及他们的角色。是什么把这些人聚到一块？这里允许什么人来？

3. 活动和互动：在发生什么？是否有明确的活动顺序？人与人之间、人与活动之间是如何互动的？人们和活动是怎么联系的或相互关联的？

4. 频率和持续时间：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持续了多长时间？它是重复发生的还是只发生一次？如果是重复发生的，频率如何？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相对于这类情况来说是否典型？

5. 微妙的因素：不那么明显、但对于观察而言也许同样重要：

- 非正式的和未计划的活动
- 词语的象征意义和内涵意义
- 非言语的交流，如穿着和物理空间
- 不显眼的手段，如物理线索
- 98 什么没有发生——尤其是本来应该发生的。

关于质性调查中访谈的重要性和“如何去做”的问题，已经有大量的著作，而对于观察的精巧技术，则相对而言得到较少的关注。毫无疑问，访谈在自然主义研究中有重大价值。然而，绝大多数成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遗失了通过仔细的和直觉的观察来学习的天生能力。大量的东西要靠看、听、感受和闻，而不是仅靠谈话来获得。许多微妙的和重要的细节隐藏在日常的生命活动中。发展和提炼被低估的观察技术，应该在自然主义的调查实践中得到首要的关注。

新进的调查者应该为记录观察设计一种系统。对于观察一些特殊类型的人类互动，可以提出许多观察日程；大多数集中在非常狭隘的方面（比如，教室里的口头互动）。关于建筑特点、个人反应和社会语境的其他方面，也可以为这些资料的观察提出不同的日程。要鼓励新进的调查者去检验这些工具，并且尽可能构造他（她）自己的工具，使之适合一具体的社会语境。

视频设备有时候也用于观察，但摄影机可能在某些情况中显得太突兀，影响到回答者的行为或评论。当使用摄像装备时，可能需要一段调适期，也就是开始的一段时间，这时不做资料搜集。西摩（Seymour，1988）提到：

在最近为金佰利克拉克*所做的一项研究中，调查者用视频录制大约 200 小时的换尿布技巧，来帮助重新设计“Huggies”**。调查者提到“人们先是在摄影机前表演，但很快它变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另一部分。”在为公用事业公司所做的一项研究中，〔同样〕有个例子，摄影机放在人家的屋子里，以观察恒温器装置的细节：直到摄影机装好后的几个星期之后，调查者才开始试着搜集资料(P.71)。 99

访谈和观察间的互动

自然主义调查者应该意识到，访谈和观察以互动的方式建构了对社会语境的理解。出于该原因，调查者不能把这两种搜集资料的人类来源看成是彼此独立的加以处理。把它们结合起来的互动过程，与我们在第 2 章中讨论过的经验、语言及建构性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并行的。访谈和观察有一种互补的关系，就如语言和经验彼此提供结构和彼此丰富的关系一样。正如凯勒说的：“我接触事物、学习它们的名称和用法越多，我和其余世界之间的快乐自信的亲切感就越强烈。”(Keller, 1954, P.37)通过访谈，调查者常常能初步洞悉被回答者的个人习语包装起来的建构性现实。通过观察，调查者对回答者的语言在建构那些现实时所依赖的经验有了局部独立的看法。访谈为调查者的观察提供了指引。观察为访谈提供了探测器。两种资料来源的互动不仅丰富了彼此，而且为分析提供了基础；假如只有其中一种来源，分析就是不可能的。就如这种互动关系反映了语言、经验及思想间更基本的关系，它还引向了自然主义分析的整个过程，我们将在第 6 章关于解释—辩证方法的那一节描述此过程。

文献

文献构成了资料的第三类来源。文献这个词语指称一个广泛的领域，包括书写的和符号的记录，以及任何可取得的材料和资料。文献实际上包括任何先于调查和与调查同步存在的东西，包括历史描述或新闻描述、艺术品、相片、备忘录、鉴定记录、电视记录、报刊、小册子、会议日程和记录、录音带或录像带、预算或报账陈述、学生或老师的笔记、演讲和其他的案例研究。

来自于文献的资料同来自访谈或观察的资料一样，能以相同的方式加以使用。尽管调查者不应在调查过程的初始阶段，把自我限制(self-limitation)强加在可获得的文献的数量或质量之上，而应该在搜集文献的过程中使用自己的识别力和直觉，否则面对要加以分析的堆积如山的文献，只会头疼不已。 100

---

* Kimberly—Clark，美国的一家消费用品制造商——译者注。

** 一种尿布品牌——译者注。

举例来说，调查者不会把图书馆的所有书和杂志文章作为可能的来源，充当文献或文献评论工具。这里必然卷入某种隐蔽的但合理的筛选过程。

调查者的自发设计指导了文献搜索。梅里姆(Merriam, 1988)提到，它是一种灵活、但系统的过程，允许调查者把预感和临时假说作为指导，“偶然”发现有价值的资料。她评论说，该过程既使用了技巧，也使用了直觉，与访谈或观察中使用的技巧和直觉没有本质差别。

人造物

自然主义调查中另一项重要的资料来源是调查环境中物质性的人造物，这些人造物为理解文化中的技术、社会互动和物理环境提供了洞见。人造物可以是技术设备(如，计算机的打印输出和磁盘)、艺术作品、书写器材、工具，和几乎所有其他的物证。如果调查者要探讨人及其物理环境间的系统关系，那么对人造物做详细的研究是必要的。殷(Yin, 1984)举了一个例子，其中对教室中实际的/提倡的微机使用做了研究：

> 尽管可以直接观察到电脑的使用，但有种人造物——电脑打印输出——同样可以取得。学生出示这些当成作业的打印输出，保留这些输出组成的笔记本。每页输出不仅显示了已经完成的作业类型，而且显示了做作业的日期和花在电脑上的时间。通过检查这些打印输出，实施案例研究的调查者能发展更宽广的视角，来考察所有的课堂应用，超出了在短期内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东西(P.89)。

人类和非人类的资料来源

我们已经描述了四类资料来源：访谈、观察、文献和人造物。前两类可以划归到“人类来源”范畴，后两类则划分为“非人类来源”范畴，尽管这可能有点误导人，因为有趣的文献和人造物一般源于人类的思想或活动。另一种方
101 法是划分为“静态的”(文献和人造物)和“动态的”(访谈和观察)。这种范畴化暗示了它们之间的某种相互关系。

我们在这章花更多的篇幅探讨人类来源，主要是因为它们是动态的。它们是变化的，对调查者的出现和推动做出反应。因此，调查者必须采取措施，不只是循着计划从那些来源中搜集资料，而且要为没有预见到的偶然情况做出计划，这些情况会影响到计划，打开新的和未预见的连串信息。调查者必须提出新的策略，来发现一些密码，开启这些人类来源所包含的资料。这些来源不仅是库藏丰富信息的仓库，而且它们本身就是自动的、并且经常是不可预测的信息生成器。即使有过，调查者也很少完全穷尽所有可能的人类来源。

文献和人造物中也蕴藏着同样丰富的信息,大量信息都没有被调查者利用到,但并不对搜索者的出现或推动做出反应。结果是,这些静态的非人类来源提供了一种语境,能作为基础来理解和评价源自动态的人类来源的资料。因此,两种类型的资料来源,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彼此作为图形和基础*以一种方式互动,该方式拓展了它们的整体意义,但同时模糊了图形和基础间的区别(Hofstadter, 1980)。

登兹(Denzin, 1987)对资料搜集方法的描述,阐明了人类和非人类来源间的动态互动:

> 我的材料来自于长达五年的调查,主要是在一个人口大约150 000的中型社团里做的……我观察了A. A.**在2000多次公开和封闭会议中的的工作。我从物质滥用治疗(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中心和解毒规划那里搜集了一些观察。我与主动的、处于恢复期的酒精中毒者及其家庭成员做了讨论和访谈……我还与治疗员、医师、精神病专家、社工、医院急救室的护士谈过……我检查了戒酒匿名会的文献……和世界A. A.服务印发的大量材料(P. 21)。

自然主义研究中的资料收集方法经常假定了一幅挂毯上不同颜色和形状的线条的质量。一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平衡源自于自发设计,同时又塑造后 102
者。奇斯(Chace, 1992)在叙述他对加里福利亚马利斯威里(Marysville)市年度柏凯节***中的解释限制(interpretive restrain)的研究中,阐明了资料收集方法的这种结合:

> 妻子和我参加了周末的柏凯节,见证了一个当代加里福利亚社区的中国民俗宗教仪式……我们对这些主要的事件做了观察和记录,拍下了大多数活动,与当地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进行了非正式的访谈。我们度过了紧张的周末,因为了解到这种庆祝仪式每年只有一次。我们分散四处走动,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地点做出观察。在庆祝活动和晚会中,我们断断续续地对比和讨论了我们的观察和评论,这既加强了我们对活动的理解,又突出了我们的经验差异。
>
> 为了补充我们的观察和偶然的访谈,我们收集了为节日活动制作的各种打印材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柏凯游行队伍播音员那长达28页的讲话稿、当地议院发布的商业通告,以及地方报纸对节日的大肆宣传和报道。此外,我们取得了18页的图册,这是那个社区在20年前为支援柏凯寺而制作的,该图册

---

* figure and ground,也有译为"形—基"。认知世界的第一步就是要从周遭的背景中区分出目标物。图形和基础构成的关系是分辨和区别感知对象的必要条件——译者注。

** Alcoholics Anonymous的缩写,有译为"戒酒匿名会"和"戒酒互助协会"——译者注。

*** Bok Kai Festival,加州有很多中国的庙宇,其中就包括柏凯寺——译者注。

包括了一些简要的历史记录。这些资源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它们包含了许多社区成员拥有的知识,而且在我们的访谈中,人们经常只是向我们重复这个信息。

在节日之后,我们进一步访谈了一些美籍华人和英美人,他们有的生活在马利斯威里或以前生活在这里,有的过去参加过这里的节日。这些访谈提出了更多的具体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仪式的理解和解释。此外,我们还能返回那个寺庙并多做些拍摄(PP. 10-11)。

记录资料

就如我们在前面对访谈技术的讨论中所注意到的,在搜集资料时对其进行记录,经常给调查者带来一种困境。理想上说,调查者喜欢那些最可能精确地描述研究环境中的关键事件的记录。然而,尽管调查者能在事件发生时靠使用磁带录音机或做记录来提高精确性,但这些策略的突兀性*经常阻止了
103 调查者对它们的使用。在某些环境中,对它们的使用可能严重地封锁了调查者接近额外资料的通道。不存在调查者可以遵循的固定指示,尽管对调查者的一般建议很简单:“收集资料时,要能为调查环境中的事件提供最完整的描绘,但绝不要让资料收集程序切断你接近你可能需要的额外资料的通道。”

洛塞克(Loseke, 1992)在她关于受虐妇女和庇护所的论文中,说明了她解决该困境的方法:

> 我主要有两种形式的资料用于分析。第一种是记录,来自于庇护所的日志、工人对南海岸内的生活的持续纪事。这种组织性的文献是由工人编撰的,而且只有工人才能阅读其内容。该日志用于实践目的,有助于轮流值班的工人间的交流,他们彼此很少见面,但都参与完成庇护所的共同工作任务……
>
> 我的田野调查记录是第二种主要的资料形式。这些记录有时候来自职工会,开会时,工人们允许我录下他们的商议;有些记录来自与工人或顾客的互动,在我速记时我尽力把它们逐字转录。不过,几百页的田野调查记录中的大多数并非如此详细。我早就确定,南海岸许多最关键的事件不可能变成资料收集事件。例如,尽管我见证了几位客户的选择决议,而且,事实上,我自己负责一些,但在这些时候我既没有做记录,也没有打开磁带录音机。在倾听工人

---

* obtrusiveness,有译为“强制性接触”,有译为“切身利害程度”,由于这里的本意是指一些资料收集工具可能太过显眼,造成被访者或回答者的一些不自然行为。因此不采纳这两种译法,而把它译为“突兀性”——译者注。

和客户对话时，我也没有做记录。我永远是走回家或回办公室，重构我的所见和经验(PP. 168-169)。

我们发现，要记录社会语境中的人类行为，一种特别有用的普遍技术是建构关键事件。就我们的用法来看，关键事件有两个独特的特点：

1. 它是发生在被研究的社会语境中的特殊事件。
2. 它应该“关键地”反应该语境的运作。

这里，“关键”意味着，事件反映了被研究社会语境的重要特征。关键事件或者是学校组织的常规运作中最突出的事件，或者是与常规运作形成鲜明对比的事件。这就马上引起了一个问题：“调查者如何识别一个关键事件?”首先，在一种新的社会语境中，调查者除了他(她)先前对社会环境的了解外，104
没有更好的指导了。初看上去，这似乎完全不合适，因为每种社会环境都有其独特性。然而，跨语境的人类行为和人际模型有足够的相似性，几乎能为任何调查者提供充分的背景，来启动关键事件的收集。

事实上，关键事件收集的最大作用之一就是，呆在一种环境中的早期阶段，观察者实际上不可能确定，被观察的事件是该看成常规事件(即，示例了社会语境中的主要事件)，还是该看成与常规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事件(即，界定语境边界的事件)。推测某一事件是主要的，还是边缘的，能引导可检验的工作假说的形成，而后者为研究提供了指导。例如，想象一下，你在研究一所初中，在研究的第一天，你和校长站在走廊上，本来是空荡荡的走廊，但那时恰好有个 12 岁大的男孩走到拐角处，然后从你身边跑了过去。这时校长的行为就能告诉你学校的有关情况。如果她追喊那位小伙子，做下笔记作为将来的参考，或完全忽视这一情况，那么作为观察者，你就能了解到学校的有关情况。即使一位新进的调查者也应该意识到，该事件反映了学校的运作。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你观察到的是常规情况还是例外情况。对许多更关键事件的收集能帮助这个问题，并且可能引出对学校里起作用的建构性现实的丰富洞见。

调查者应该以描述的方式来记录关键事件，要做到尽可能地详细。许多关键事件的描述有两个最突出的弱点：①它们是以判断的形式出现的；②它们过于做总结，太过于概括。考虑下述的关键事件描述：

1. 校长定期与其两位助理讨论潜在的逃课问题，他们建议校长应采取强硬的立场来预防逃课。

2. 校长 A 先生与他的两位助理正讨论如何对待一位新来的学生，他有潜在的逃课问题。B 先生是校长的行政助理，他行事风格独断，对学生非常强硬，愤愤地宣布，如果有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事情提交给法庭处理，这既威 105
胁到那位学生，也威胁到他的父母。

3. 校长A先生、校长行政助理B先生和校长的指导助理C先生，某天下午在A先生的办公室开会。谈到了一位新生，尽管他在以前的学校有逃课记录，但还是被接收为本校的学生。B先生大声说："我已经清楚地告诉那位学生和他的家长，我们要出勤率。只要保持出勤率，我们就一直接纳他。如果没有，我们就把它当作法庭案件处理。"

描述1太过总结化，太过概括。描述2判断性过浓。描述3最接近应有的关键事件描述。此外，关键事件应该有下述特点：

1. 它应该只包括一个事件或主要的描述。

2. 它应该尽可能具体地确定人物、地点和事件。

3. 它应该或者被作者观察到，或者能得到多于一个来源的证实。

4. 它应该或者集中反映典型的事件，或者集中反映非典型的事件，来帮助界定组织的运作。

记住了这些原则，希望运用关键事件技术的调查者就可以开始了。我们建议，关键事件应该记录在索引卡上，每张卡上记录一个事件。卡的一角标明日期和时间。新进调查者早期记录的关键事件中，有很多没有采纳我们提出的建议。这并不很重要。定期回顾他(她)的关键事件的格式和可用性，调查者就能调整系统满足他(她)自己的研究目的。对于调查者来说，一个明显的好处就在于一种记录模式，它适合记录范围宽泛的重要资料，而且能卓有成效地推动分析过程。

用关键事件来理解社会语境、揭示其中的人发展的建构，本书的一位笔者(Erlandson, 1979, 1992)对此已做过描述。他发现，通过成批地收集学校和其他人类服务组织的关键事件(或请那些组织中的个体帮助收集关键事件)，他就能利用那些事件把有关组织的本质有效地传达给外部人士。他还特别地邀请那些不熟悉有关组织的个体，利用一批关键事件来推测该组织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推测该组织的成员有什么信念，即便关键事件中并没有特别提及这种
106 信息。他还请他们预测组织未来会有什么发生。然后让组织中的成员核对这些推测；在某些案例中，时间的推移有可能允许核对已经做过的预测。那些对组织的认识来自于对一连串单个事件的理解的人们，做出来的推断和组织成员所提供的信息相当接近。在有些案例中，关于组织的预测可能得到核查，这里也可以发现惊人的相似。似乎发生的情况是，各自揭示相对分散的信息片断的单个事件，一起制造了一种网络，捕捉和传达了组织的规则性和互相依存性。特别有趣的是一些人的能力，他们先前对组织一无所知，却能告诉组织成员一些事情，而关键事件卡上并没有提过这些事情，组织成员也把它们看作是内部秘密。

我们发现，对于记录资料来说，关键事件技术是一种非常有用和全面的工具。该工具尽管特别适用于记录被观察到的事件，但也能记录访谈日志描述

的事件。事实上,它同样可以记录访谈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这样就能提供一种描述,表明被访者如何把访谈者先前认为没关系的两事件关联起来,或表明被访者对一段信息的反应。有文献记录的事件,比如一次会议或一个官方决议,同样可以收纳进来,配上写着简单概要或总结的便签,或者是在索引卡上附上会议的备忘录,方便以后回头参考原始的文献。关键事件的收集与我们描述过的为访谈确定回答者的程序是平行的。就如回答者的挑选首先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提供不同信息、然后是因为他们有能力阐述或说明自然出现的主题,关键事件聚焦于那些界定社会语境边界的事件和那些揭示其主体部分的事件。我们的经验表明,人这台计算机是奇妙的工具,在有关社会语境中呆上一段有限的时间,就能感知到某事件在该语境中是边缘性的,还是核心的。

我们发现,对于记录和组织自然主义研究中的事件来说,关键事件技术是一种有效的重要工具。与记录调查者本人的经历的日志一起,关键事件技术 107
(当然,受到用作参考的文献和访谈记录的支持)是我们在某些研究中用到的唯一记录策略。被作为单个事件加以记录的关键事件,能推动持续的分析(我们在第6章中就会看到)。它们同样能为审计跟踪打下坚实的基础(第7章会有描述)。

思考和感受间的关系

人类仪具是奇妙的资料处理有机体,比起可想象到的最精巧的非人类仪具来说,它对于意义的各种细微差别更为敏感,也更能恰当地对它们做出反应。然而,它的敏感性和灵活性源于它与它所遇到的资料进行互动的能力,而这种互动意味着,它受到了这种相遇的影响,有时候是积极的,有时候是不利的。在调查者了解有关语境的头几天,这些互动效应一般尤其显著,但在研究过程的始终,它们会在不同的时间反复出现。经验丰富的调查者能识别这些高昂的和低落的情绪期:要对具有惊人敏感性的人类仪具做必要的调节。

约翰逊(Johnson, 1975)描述了思考和感受的关系。作为进入研究领域的调查者,他(她)的个人担心、忧虑、无知的感受、困惑和无能,都影响到了思考过程,包括收集和精确地分析资料的能力。约翰逊认为下述做法可能有所帮助:延迟做任何记录,直到计划进行了几个星期之后、焦虑开始减退。约翰逊报告说,在其研究过程中,他在困惑期做了记录,后来发现,无论是从描述的角度,还是从洞见的角度而言,它们都不是特别有价值。他发现,由于他不了解有关环境、其任务和语境的官方规则(official rule),因此那些记录显得微不足道和幼稚。实地调查工作者一般同意,开始的焦虑感受最终会减退,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自那以后就会一帆风顺。约翰逊在他长达10个星期的调查中做

了记录,下面是一段摘录:

> 这个下午我还和巴兹(Buzz)交谈过。我开始就问他,在我们上星期呆过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孤儿抚养家庭(Young Foster home),那些小孩最近情况如
> 108 何。巴兹用下面的话开始了他的描述:"噢,J. J. *,你绝不会相信我弄得多糟,"他接着描述一些细节,他视之为他自己的无知、不称职的行为、错误的判断……等等。现在,我承认,对于了解社工或社会福利工作所需的信息,我并不完全知道,但我……足以知道……不会有哪位社工……把那看作是不称职的行为……他是我迄今遇到的最聪明的家伙之一……相当明显的是,他今天下午有点说反话(short-con)的意味……我今天确实受到了影响。在离开那个场合后,我走出办公室,到了停车场,随后出了身冷汗,感到虚弱和恶心(PP. 153-154)。

这段摘录显示了调查者的个人感受和身体状况。他走到停车场,让自己镇静下来,恢复理性状态。有时候,由于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事件,可能需要延迟一天或两天的记录,以便做连续的、得到恰当平衡的描述。这个例子同样表明,在个人的理性表现和个人的私人感受之间可能存在断裂。除了采取从有关语境中暂时撤退出来的办法外,第 7 章中讨论的同侪报告也能帮助调查者更有效地处理思考和感受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

对自然主义研究中正在使用的基本人类仪具也要做记录。这种仪具很敏感,对研究环境做出积极的回应。该人类仪具——调查者,受到思维和情绪的支配,肯定会在研究过程中发生变化,而且会有希望地成长。记录这种变化是必须的,这既因为记下与环境的互动很重要,也因为调查者和环境中干系人的成长是调查的一种重要产物。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建议写简单的日常日志,每位调查者把他(她)自己的具体情况添加进去,记下自己的感受、态度、学习和洞见,让日志随他(她)一道成长。

总 结

对于在归纳分析中发展理论,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 Strauss, 1967)提了两项重要的要求:"①节约变量和公式,以及②理论广泛的适用范围"
109 (PP. 110-111)。自然主义研究中,分析和资料收集同时进行,有助于调查者更有效地指导资料收集阶段,建立既节约的、又恰当的资料库。

访谈、观察、文献和人造物的收集,一道带来了多重的视角,使调查者能在

---

* 这是对作者的简称,他原名为 J. F. Johnson——译者注。

其感官的帮助下，更好地理解整体和本质。有种隐喻被称为“神入理解”，它对此做了描述。麦卡锡（McCarthy，1991）解释说：

> 该术语……来自大众科幻小说《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这本小说是罗伯特·海因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写的。小说中的英雄是人类出身，生长在火星上，有一些惊人的力量，包括“神入理解”的能力，后来回到了地球上。英雄做了这样的解释，“神入理解意味着沉入……透彻地理解……”该术语是一个隐喻，暗示着一种深奥的概念和体验：完全理解某物、以一种直觉的、“啊哈”*的方式进入它的能力（P. 219）。

人类生来就有“神入理解”、沉入大量信息并理解和组织该信息的能力。在自然主义调查中，资料搜集过程使调查者能重新发现直觉学习的乐趣和奇遇。

进一步的研究

1. 回顾你阅读过的、大体上遵循自然主义范式的两项或更多的研究。描述各种被用到的资料收集方法。说明一下这些方法是如何彼此互补和互相支持的。

2. 为观察选择一个有人类互动的环境（可以是教室、办公室、餐馆、图书馆、或某个有适当限制的类似环境）。当该环境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人类互动时，挑选一天中的某个时间段来做观察。然后观察30分种的时间，记录下所见、所听、所闻和所感。最后，把这些观察编进记录在3×5卡片上的一系列“关键事件”中。

3. 把问题2中整理的关键事件作为基础，设计一次与环境中的人进行的开放式访谈。至少与环境中的人进行两次访谈。把访谈信息记在你的关键事件中，使用这些信息和来自文献、记录的附加信息，就你的观察和洞见，撰写 110
3～5页的总结。保存你的关键事件、访谈资料、文献记录和总结报告，留待将来之用。

4. 为你设计的自然主义研究决定你要收集什么资料，你要用什么方法收集它们。描述一下，这些资料收集方法是如何相互关联起来的，与研究的整体目标又是如何关联起来的。

---

* aha，感叹词，意指恍然大悟——译者注。

资料分析 6

质性资料分析最好被描述为一种连续的发展进程，而不是一个阶段；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一次终了的事件。马歇尔和罗斯曼（Marshall & Rossman，1989）解释说：

> 资料分析是赋予一堆被收集到的资料以秩序、结构和意义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凌乱的、含糊不定的、费时的、富有创造性的和吸引人的。它不是以线形模式行进；它不是井然有序的。质性资料分析旨在为资料范畴之间的关系寻找一般的陈述；它构建扎根理论（P. 112）。

对自然主义研究中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是从调查者到达相关环境的第一天就开始的。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是与理论和主题在研究过程中的自然出现携手并进的。从一项自然主义研究中节选的一段分析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出这个过程（Harris，1991）：

> 实地探访（对两所学校）开始于1990春季学期的早期。最初只是泛泛地探访各所学校。访谈和观察内容记录在一个法律垫上，随后和源自文献的资料一起转到3×5记录卡上，每张卡上记录不同的信息单元……资料分析贯穿于该调查过程之中。资料的来源有访谈、文献、非语言线索（nonverbal cues）以及其他质性的和量化的信息库。归纳分析旨在把资料归类到各种范畴，这些范畴提供了那些单元所源自的语境或环境方面的描述性或推理性信息。以"看似相同"的特征为基础，把每张载有具体信息单元的3×5卡片进行分类，划入到临时范畴。由于这些临时范畴开始聚集大量的信息单元卡，研究者写下说明或范畴标签，以此为基础决定卡片的归入/排除（PP. 54-58）。

这类研究使用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描述的持续比较法，来在分析过程中引出（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从范畴中发展出来的，

也就是说，是从资料中引出，而不是先于资料的。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 1967）对此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 对事件做持续比较很快就能引出范畴的理论属性。基于全部范围的范畴类型或范畴连续统，分析员开始思考范畴的范围、其边界条件、主要结果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别的属性（P. 106）。

杜斯特、魏德迈和苏奇尔（Durst, Wedemeyer & Zurcher, 1985）在他们研究离异家庭父母关系的过程中，运用了持续比较法。由于研究对象为数不多（21 对配偶），因此他们关注那些对离异家庭有用的适应策略（adaptive strategy），并用持续比较法引出扎根于调查资料的理论视角。他们的一套调查方法如下：把事件和在开放资料中重复出现的回应加以评估和比较，以便把它们与其他事件整合起来。当模型和主题得到确定时，概念框架也就成型了。这样自然出现的主题，尽管不是决定性的，但为离异家庭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框架。

在研究工人行为的过程中，霍德森（Hodson, 1991）也选用持续比较法分析他从非系统的访谈和观察中获得的资料，打破了常常强加在此类研究上的理论约束。他说明了他对该方法的运用：

> 在扩展该资料库的时候，我采用了持续比较原理：在寻找一致、差别、异常和反面案例的过程中，把最近的回应与先前的回应进行比较（Glaser, 1965; McCall & Simmons, 1969）。 113
>
> 每次访谈后，我一字不差地记下访谈内容，根据当时使用的范畴把它提供的材料归档。这些材料通常以段落的形式出现，它们是交叉分类的，隶属于几个范畴。在我归档每条陈述时，我把它与那一范畴内的先行陈述进行比较，并持续记录该范畴的内容。这些范畴不时发生变化；一些范畴会消失，而又以更普遍的名称出现。一些范畴从先前的范畴发展出来，但两者已经完全不同了。有些范畴或两个一组，或三个一组，所做的任何评论一般可以归档到其中的任何一个范畴中。例如，对松散工作与糟糕的工作关系的情况所做的评论经常涉及体罚管理（abusive management）。类似地，描述个人程序设计的陈述，也经常包括对这些程序提供的自主性是否满意的陈述。这有助于揭示范畴之间的关系。
>
> 当我感到多余的访谈几乎不会带来新信息时，就会停止这一过程（PP. 50-51）。

迈尔斯和休伯曼（Miles & Huberman, 1984, P. 21）说："我们认为，分析由三种同步的活动组成：资料简化、资料展示、引出/验证结论。"在上面引用过的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 Strauss, 1967）的著作中、在林肯和古巴

(Lincoln & Guba, 1985)以及当代的著者的著作中,资料分析的这种互动过程都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主题。尽管我们反对迈尔斯和胡伯曼((Miles & Huberman, 1984)的资料简化和资料展示方法,但我们认同的是,资料分析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调查者要特别注意的是,资料分析不仅发生在资料收集期间,而且发生在资料分析后。传统调查的主要陷阱之一就是这样的一套观点:看现象、抽身去分析它们、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做出结论。自然主义调查项目中的资料分析必须包括收集和分析的互动过程,还必须在项目结束时形成一种格式塔。

资料分析的互动过程

自然主义研究的资料分析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在资料收集期间,就在调查地址中进行资料分析。一是在一段时期的资料收集后,离开调查地址进行资料分析。注意,第二部分的资料分析是在不同实地探访之间的那些阶段实
114 施的,这既包括资料收集完成前、也包括收集完成后的时间段。

就如第5章提到的,资料分析与资料收集紧密相连。上面也提过,传统研究把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割裂开来;而在自然主义研究中,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是不可分割的。自然主义调查者的一个假定是,人类仪具能不断精心调节,以生产最丰富的资料。这种持续调节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之一是,资料在被收集的同时,也得到了分析。资料分析常常使资料收集程序和策略的修改成为必要。这些修改会产生新的资料,然后受到新的分析。该过程的结果是有效地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而后者又能引导出一些候选假说,并为共有的现实建构提供基础。

资料收集和分析的互动原则是区分自然主义调查和传统调查的主要特征之一;也许该原则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人类仪具对最初的可得资料做出反应,并立刻形成临时的工作假说,这些假说又引导调查者调节访谈问题、观察策略和其他的资料收集程序。通过改进后的程序获得的资料,又检验和重造早就形成的临时假说,而假说又进一步修正资料收集程序。在最后的报告没有完成之前,这个不断改进的互动过程不会停止。即使在最终的成员核对中(见第7章),如果资料施压,要求变化,那么解释就会面临挑战和改变。

尽管很大一部分互动过程受到调查者的直觉的支配,而且在外部观察者看来,在经验老到的自然主义调查者开展该过程时,它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但是决不能凭运气。初入门的自然主义调查者应在每次访谈结束后、每次观察的后期、每天的实地调查结束后,有意识地开展这个过程。关键问题必须提出来:我从这位回答者那里了解到什么信息,可以用来形成问题问下一个回

答者？出现了哪些假说，提示需要额外问题、额外回答者或要对这个回答者进行一次跟踪访谈？从我的观察中形成了哪些主要的工作假说？哪些资料被挑出来挑战这些假说？我如何调整我的观察技术，来加强、拓展和改变我的工作假说？我如何能更有效地收集和分析资料？

一位笔者的调查需要他在家和被研究的学校之间进行300英里的往返穿梭。他经常在他所研究的学校一周内连续呆上两天，其余时间回到他在大学的家里分析收集到的资料。在每次回家的途中，他都会按下语音触发(voice-activated)的录音机的“录音”键，录下他的想法、工作假说、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不确定性和有助于改进资料收集材料的主意。这有“谈论”反省杂记的效果。调查者以后能重放录音带，记下有用的资料，为他的下次实地访谈做更充分的准备。 115

在资料收集期间的资料分析过程中，调查者也使用一些确保研究的可信度的方法论工具(见第7章)；现列举如下：

1. 三角测定。利用这种方法，调查者找出一些不同类型的来源，它们能够对相同事件或关系提供洞见。例如，如果一位教师报告说，学校的出勤率在过去的两年中急剧下降，那么调查者可以检查出勤记录，以便能详细阐述引发这个报告的事实基础。如果教师报告说，学生变得越来越冷漠，调查者就可以访谈教导主任、学生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找到学生变得冷漠的原因。调查者也可以分析学社的社员花名册、学生刊物的内容和其他有别于教师关于学生冷漠的报告的来源。三角测定可以确定收集到的信息是否可靠；不过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多重来源扩展了有关信息的意义并为之提供了深描，拿上面的例子来说，这种深描可能揭示不断增长的冷漠。

2. 工作假说的提出。在采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调查者回顾已获得的资料，并就被研究的现象提出假说。本质上，这简直是采用“盯着你的鱼看”方法来判定什么样的主题会出现或重现。资料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引导出不同的解释。调查者挑选出来的假说，应该看似最能表征那些资料来源提供的建构。在一项对工作场所中的工人的研究中，霍德森(Hodson, 1991)在调查开始时，认为他研究的是有组织的怠工。在初步的观察和访谈后，他的假说聚焦于巧妙的抗工、推托和有偿出力这类行为。

3. 工作假说的检验。研究者检验那些已经提出的工作假说，确定它们的可行性。例如，如果一组通过不同方式收集到的资料促使调查者提出如下假说：校长的领导风格是协作型的，那么，调查者可以与环境中作为资料来源的人以及没有直接对资料做出贡献的人进行成员核对，或让一名同侪报告者分析资料和挑战假说，或利用他(她)认为其他有用的方法，来检验这个假说。 116

回答者能帮助调查者进行资料分析，从而有效地传达他们正在使用的建构性现实。对此，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是使用回答者的暗喻。史克普

(Skipper, 1989)要求学生、教师和校长辨别描写他们学校的暗喻。这些暗喻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把握到回答者无法直接描述的建构性现实。与回答者一起探讨这些暗喻,有助于研究者开始理解和部分地分享这些现实。

写作是一种基本的分析活动,它对于连接来自调查地的资料分析和远离调查地的资料分析,尤其显得至关重要。莫布里(Mobley, 1992)在研究糖尿病人期间,不厌其烦地在三个笔记本上做记录。第一本的内容包括病人参加糖尿病教育课程时记下的笔记,以及莫布里对这些课程的观察记录。根据这些记录,她为每个病人建了档案。联系第一本笔记中描写的语境,她记下了她访谈病人的录音记录。第三本充当杂记,记叙了她的反思、态度以及新出现的问题。这种持续分析不仅不断地增进了她的理解,从而系统地丰富了这项研究,而且为她的后续观察和访谈指示了新的方向。

在每段资料收集期之间、以及资料收集结束时,资料分析有助于格式塔的形成,该格式塔的成分既包含那些看似无关的已有描述,也包括那些似乎自然而然地一道出现的描述。在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 P. 333)看来:"资料分析把取自语境中的建构整合、重建成有意义的整体。"这个过程有三个要素:①分组资料;②自发范畴指派;③反面案例分析。每段资料收集期之
117 间的分析还有第四个要素:④桥接、拓展和表层处理资料。

分组资料可以这样定义:把资料分解为最小的信息段,在没有附加信息的情况下,它可以作为独立的观念而不是对有关语境的广泛理解而存在。这并不是说,只要阅读了某个单元,就能充分地理解整体。据说,只要在内容的某个部分中找到一个观念,就可以说存在着一个资料单元。一个单元可以由几个单词、一个完整的句子、几个句子或一整段话构成。单元还必须有启发性,也就是说,它旨在理解语境的某些方面或研究者需要采取的某种行动(Lincoln & Guba, 1985)。按照这些限定(即,一个观念,但有启发性),单元也应该是能独立存在的最小信息段。一旦确定了单元,调查者就把它们编码,作为审计跟踪的一部分,在需要的时候就很容易读取它们。

帕纳兹(Pennartz, 1989)描述了他分组来自访谈记录的资料的过程,分组的目的是为了把符号学运用到关于城市环境看法的分析中:

> 至于从文本中选出的片断,我采用两条标准。第一条标准是,一个片断是否包含一个符号或符号载体和一个解释项,它是否暗中或明确地把愉快的经历当作一种情感回应。第二条标准涉及给定信息的精确性(P. 237)。

他给出了一个例子:

> 要是那些商店不在那儿……并且你能想象那些外观……它们有些个性,令人感觉友好……(你为什么认为这些外观令人感到友好?)恩,我是透过这个小凸窗提到这个那个商店的……想着那个凸窗,我想象我非常愉快在那里

小憩一会儿,观看经过的事物(P.238)。

他用这个例子阐明解释文本的程序:

> 想着那个凸窗,我想象着坐在那里……
>
> [另外一个完整的片断]:非常愉快,观看经过的事物……
>
> [文中包含了一个符号(小凸窗),一种情感回应(友好的)和一种解释(愉快地坐着,观看经过的事物)](P.238)。 118

自发范畴指派牵涉到把所有的资料单元整合并分类到观念的范畴中。这样,当调查者自己的背景和潜在的理论与这些资料产生互动时,刻画某一具体环境的思想范畴就会本能地自然出现。这些自然出现的范畴应该被当作是某位分析员对资料的组织。也许任何别的学者都不能发现相同的范畴。调查者必须明白,这种实践产生的建构只是许多现实建构中的一种(Lincoln & Guba, 1985)。这种技术包括以下几步:

1. 阅读第一个资料单元。把它放在一旁作为第一个范畴的第一个条目。

2. 阅读第二个单元。假如感到其内容与第一单元的相契合,那么把它放入第一单元所在的那个部分。假如不是,把它放一旁作为第二个范畴的第一个条目。

3. 继续此过程,直到所有单元被指派到各种范畴中。把既不符合任何范畴也无法构成新范畴的单元归到杂类。要知道,这些资料不是在堆"垃圾";而是环境的组成部分,如果调查者不进入研究语境,很可能就发现不了这些资料。此"杂类"范畴在后面会被重审,确定这里面的资料是否应该指派到其他范畴,或由于在"杂类"范畴中存在某一共同主题,而指派成一个新的范畴。它们还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处理,一起收入最终的报告,或者因为它们不能为此研究提供额外信息而被丢弃。

4. 提出范畴标题或描述语句,或者是两者,把各种范畴区分开来。把它们写在不同的卡片或纸片上以标明这些范畴。它们并不是太具体;它们只充当临时决定规则,判断任何一份资料能否包括进某一范畴,或应该排除在该范畴之外。

5. 重新开始。把记有标题或描述语句的卡片或纸片作为各个范畴的标记。把它们拓展应用到工作领域以作为范畴的基础。从第一张卡片的第一个范畴开始,重复这一过程。这个重要步骤使研究者进一步关注每个范畴的内容。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调查者不应受到原有范畴的限制。他应允许新范畴 119
的出现和让集合为空的旧范畴分解。在这个步骤中,调查者很可能把卡片从某一范畴移到另一范畴。这个步骤应与第一步一样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调查者在此处和他(她)最初把单元放置到其所属位置时是同等自由的。和资料证明一样,这个过程可以经常重复。

以上过程看起来很简单，其困难是，当一个资料单元可以合理地置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范畴时，该如何处理这个单元。这时，调查者就要求助于各范畴的描述语句或标题提供的临时决定规则。假如这个资料单元仍然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范畴，调查者就应该确定，该单元是否对两个或两个以上范畴有充分的贡献，来为其归类提供辩护。因为资料的意义是由它们出现的那个语境决定的，因此某一个单元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范畴不仅有重要的、而且有迥异的贡献。然而，调查者把某单元置入一个以上的范畴时应加倍小心。显而易见，把任一单元置入任一范畴，会完全摧毁范畴化活动的价值。把它们置入自己对其范畴意义做出极小贡献的范畴中通常会弱化分析。

在霍德森(Hodson, 1991)的研究中，他提到：

> 每次访谈后，我一字不差地记下访谈内容，根据当时使用的范畴把它提供的材料归档。这些材料通常以段落的形式出现，它们是交叉分类的，隶属于几个范畴。在我归档每条陈述时，我把它与那一范畴内的先行陈述进行比较，并持续记录该范畴的内容。这些范畴不时发生变化；一些范畴会消失，而又以更普遍的名称出现。一些范畴从先前的范畴发展出来，但两者已经完全不同了。有些范畴或两个一组，或三个一组……例如，对松散工作与糟糕的工作关系的情况所做的评论经常涉及体罚管理……这有助于揭示范畴之间的关系(P.51)。

注意范畴化过程是如何对应于语言的形成和功能的。像语言一样，这使人们可以提出一些替代的建构，自然主义的研究者也许会考虑这些建构，这时他(她)就是要寻求建构一些现实，这些现实与在得到研究的背景中的人物所
120 建构的现实，应该相容和一致。这个重建过程为研究的可信性奠定了基础。

由于此书强调语境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向读者建议，一般来说，最好是尽可能地把资料单元置于它们的原始语境中。考虑下面从访谈中节选的例子(Allen, 1990)：

> 罗伯特认为要尽可能多地给孩子机会……他是个富有革新思想的校长。无论你有何种念头，他都乐意让你尝试一下。他相当有耐心；不过就纪律来说，耐心也可能是缺点(P.79)。

在此例中，调查者把四个语句分开，放入不同的资料单元中，因为它们各自表征的是独立的观念。该研究中出现的范畴包括"罗伯特·格林校长"、"纪律"以及其他范畴。节选中的第一句话被认为最符合罗伯特·格林校长这个范畴。第二和第三句话也似乎特别符合同一范畴。节选中最后一句话引起了一个问题：它同时符合罗伯特·格林校长和纪律这两个范畴。假定有问题的单元所在的语境是对校长的描述，那么就把该语句与前面紧挨着的那个句子放到一块，使语境能解释该单元的意义。这就引出了一个观点：调查者应

以语境为导向,这极其重要。节选中第一个语句后的省略号表明,该语句和下一语句之间自然出现的单元最符合其他范畴,并出现在案例报告的其他部分。

另一方面,格林校长关于纪律的陈述可能要做完全不同的分类:"主要问题是这些'住校外'的人;本以为他们离开了,却还没走"(Allen, 1990,P. 120-121)。这相当清楚地涉及纪律问题,它所包含的信息本可以通过书面记录获得,或在保持意义不变的情况下从其他人那里取得。与其说它涉及罗伯特·格林校长这个范畴,还不如说它关涉的是纪律范畴,因此,很可能应该把它归属到后者。

格林校长的另一个陈述(Allen, 1990)可能就纪律和罗伯特·格林校长两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因此完全可以随意划分到任何一个范畴下,甚至同时划分到两个范畴下:当我发现我所熟识的小家伙吃B午餐时,或在他的第 121
五阶段课堂上,他本应只需花一分钟去卫生间却分成五次到卫生间时,我多次发怒(P. 120)。

反面案例分析涉及提出和思考候选的资料解释,尤其是记下那些反驳调查者的现实重构的资料片断。要在单个的资料片断的基础上检验假说,以确定假说的可行性。假设要得到不断修改,直到假说与资料之间不存在理解上的根本性差别。在假说与所有资料之间达到100%的一致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体的视角会带来不同的现象报告,就像一位目击证人可能报告说攻击者的胡子剃了,而另外一名证人则可能报告说他是有胡子的。

反面案例考虑是极其有效的分析工具。在资料收集期间,自然主义调查者应该与回答者的候选解释合拍;假如深入的探究表明某种解释有根据,就应该鼓励回答者阐明它,并把它拓展为一个完全的反面案例。同侪评论者也可以做同样的事。调查者本人以"如果……会怎么样?"为问题所做的发散思维也会有同样的功效。反面案例考虑应该延伸到已成型的假说。每次有意义地延伸工作假说的机会都能显著地改善和强化它。

有一种反面案例分析方法可能有用,它类似于法庭上使用的一种方法:反对(或少数)意见。假如,在细致的回顾和成员核对后,调查者确信他(她)的描绘是准确的,但是语境中的某些人、甚至一位关键的干系人都不同意该描绘,那么调查者可能希望和持不同意见者一起找到一种候选解释。而其他的人可能希望写一份回应,收入调查者的报告中(Allen, 1990),或想要调查者提供一种代表不同观点的候选解释。由于假定了多重现实,所以调查者不应低估反面案例分析的重要性。实际上,假如把这些报告作为反对意见收入,反应了有关环境的语境的内在复杂性,增加了深描的机会,那么调查者应该感到满意(见第7章)。 122

自发范畴指派和反面案例分析关注在下一轮的资料收集中的资料搜索,其方式包括桥接、拓展和资料表层处理这些过程(Guba & Lincoln, 1981)。当

调查者注意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范畴和资料片断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关系，而先行的资料收集没有明确地鉴别出来时，桥接就是恰当的。当访谈、观察和其他资料收集程序重新开始时，这种“缺环”假说就为调查者指明了方向。当一种自发范畴看起来可行但不完备的时候，拓展就成为需要。为该范畴补充资料的一些尝试为更进一步的资料收集提供了导向。当资料分析为研究语境界定了临时边界，并表明未开发的、有可能很丰富的资料来源（在下一轮的资料收集中可能被挖掘出来）存在于这些边界内，这时就可以应用表层处理。

互动过程：一个示例

一位笔者在20多年前就校长职位这个主题写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他的日常程序示例了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之间的互动过程。尽管时间过去久远了，科技也能给调查者的程序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是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之间的互动过程仍旧基本保持一致。

为了编写案例研究，调查者首先发现有必要鉴别一些情景，它们应能揭示校长在领导一个组织时所做工作的方方面面——当然，这个组织是以某个政府机构和动态社会为语境，旨在教育社会年轻一代。通向作为案例研究基础的各种情景的通道，是各种各样的来源：报刊文章、广播和电视报道、专业协会之间的联络以及与学校校长的谈话。有了一个通道后，调查者就联系环境中的其他人，如果可行的话，获取其他的媒体报道，以便确定某个情景是否为案例研究的目的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环境。确定环境和情景都合适后，调查者就根据他所获得的初步信息，约见环境中那些似乎能充当案例研究的关键报导者的人。

当调查者要进入调查环境时，这些初步约见的回数一般限定在为期三天
123 的时间段内（这依调查者的日程表而定）。最初的约见一般限定为一个小时，并且在这个三天期内要相距时间足够长，以便使研究者能腾出时间继续约见、约见其他个人、在学校和社区里做观察、获取包括当地媒体报告在内的相关文献和记录的副本。

在每次资料收集的当晚，调查者把他的资料总结在3×5卡片上，每张卡片包含的内容似乎自然地代表一个单独条目、一个事件或一次互动。过长的文献和记录被简要地总结在一个主要参考卡片上，它们的关键成分则记录在不同的卡片上。遵照这个过程，他根据直觉把卡片分成不同的组。在把所有卡片分组后，他分别检查每一组，给它们贴上标签，并总结出看似能反映这些卡片内容的中心思想。做完这些之后，他重审每组的标签，并找出他用于分组卡片的规律。此后，他将设计一种可替代分类系统和依据新组分发卡片。接

着他设计一种候选的分类规律,并按照新的组来归类卡片。然后,他重复审核中心思想的这一过程,并设计出另一个分类系统。此过程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不能再设计出一种新的分类系统为止,或直到他太疲倦以至于无法继续下去为止(显而易见,这两个终结点是同步的)。当天晚上最后的步骤是在新分析的基础上审查第二天的计划:他该见其他什么人?他该回访谁?他还要提出别的什么问题?他应该观察别的什么东西?他还要取得别的什么文献和记录?在次日的早餐时他还重新审核了这些计划。

回家后,调查者再次审查他的资料,尝试着写第一稿案例研究。即使他感到多处信息不是很充分,他还是迫使自己坚持完成第一稿。这个过程无疑能揭示自发案例中的一些关键之处,它们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包括:①缺少的资料;②相争的解释;③无充分根据的事实。不过,这种被迫的分析实质上是为他的下次实地探访制定日程:他需要见谁,他要找出什么,他需要做的额外观察,他需要取得的额外文献和记录。只要对获得案例研究的资料是必须的,往返于调查地和家庭基地的这个过程将会持续下去。后续的实地探访(从第 124
一次之后算起,通常是两次或三次)一般比第一次短,而且资料搜集总是更有针对性。当然,为了最后的成员核对(将第7章讨论),还需外加一次探访。

解释—辩证过程

在示例互动过程中出现的许多要素与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 1989)描述的解释—辩证过程的要素是对应的。他们之所以把此过程描述成解释的,是因为它具有解释特征,描述为辩证的,是因为它通过比较和对比不同观点来寻求一种黑格尔式的合题。就像古巴和林肯指出的:"此过程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某人自己的建构提供辩护,也不是为攻击他人提供的建构的弱点,而是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以让各方能互相探讨彼此的建构(P.149)。"

按照古巴和林肯对该过程的描述,调查者通常从某一个回答者着手,这是出于便利或其他突出原因而挑选出的,然后导出该回答者关于被描写和被评估的实体的建构。在访谈尾期,回答者被要求确定另一个持有不同建构的回答者。在访谈第二个回答者之前,调查者回顾一下成员核对过的和分析过的记录,为访谈做好准备。开始的时候,这次访谈允许第二位回答者跟第一位回答者一样能自由地表达。然而,当第二位回答者没有提供额外的信息时,访谈者拿出第一位回答者的主题并要求第二位回答者做出回应。最后引出第三位回答者的提名。

这个访谈、分析和鉴别新回答者的过程一直持续,直到信息变得冗余,或者直到它陷入两个或更多彼此冲突的建构范畴中。随着调查深入,继续挑选

回答者的基础发生转变。起初的目的是使不同建构的范围最大化。随着这个过程的持续，主要目的是确保尽可能多的干系群体有机会贡献他们的建构。

125 在第一轮访谈结束后，另外一轮访谈对象可以是同一组或类似的回答者。（古巴和林肯把对其他回答者的建构做出回应的整组回答者称为圈子。）如果使用相同的回答者，先行的回答者就有机会对圈子中其他人的建构做出回应。然而，无论第二轮循环是使用同一个圈子的回答者还是由类似的回答者构成的一个圈子，此过程的影响既是教育性的，又赋权于参与者，并让他们接触不同的建构从而丰富自己的建构。此外，在适当的时候，调查者把外部来源提供的输入（包括其他干系群体和文献）介绍给这个圈子。最后，调查者介绍本人的建构，并让它们与其他建构一样接受圈子中的成员提出的批判、整合和拓展。

用微型计算机作为资料分析的工具

20 年前在做自然主义研究时，人们很自然地使用记录卡和钢笔来记录资料。随后记录卡将依据自发范畴技术被分类。尽管现在这种方法还和过去一样有效——依旧有许多坚持使用这种方法的调查者，不过，现在用微型计算机作为工具处理收集到的资料，是很正常的。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与大部分计算机兼容的质性资料分析软件包正在大批上市。作者强烈建议，有兴趣的读者查阅一下特斯奇（Tesch, 1990）对质性资料分析软件包的讨论。

在调查儿童受虐时，丁沃尔、依克拉和墨里（Dingwall, Eekelaar & Murry, 1983）通过观察、访谈和其他方法收集资料，其记录有七千多页纸，近二百万个单词。没有计算机的帮助，对如此多的资料进行有效的分析是不可能。他们描述了他们遵循的程序：

> 分析如此大规模的材料，本身就是个问题。我们使用了一种计算机检索系统。基本原理类似于检索一本书的原理。建立一个初步的主题目录，并给每张资料贴上一个专门的参考号码。随后阅读每一页，并为里面的主题编码。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有其他的主题添加进来，尽管我们一般建议，为了限制编
> 126 码过程中引入的主题数，最好是多等，直到完成了基本的资料收集，创建了一个得到拓展的临时目录。该研究中，最初的编码由陶普斯·墨里和约翰·依克拉共同承担，同时由罗伯特·丁沃尔对每页进行检核。键入页码表，然后用计算机程序转化它们，创建每个主题所在地的目录。这些主题可以用不同的逻辑算子连接，用于下级搜索。之后我们可以检索索引，亲手搜寻我们随后要讨论的主题（PP. 22-23）。

在处理自然主义研究取得的资料的过程中，本书的每位作者都在一定程

度上使用了微型计算机这种工具。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位笔者在其资料分析过程中采用的方法(Alllen, 1990)。在该方法中,任何单词编程包和数据库管理系统都可能被用到。

艾伦(Allen, 1990)曾就城内中学的校长—教师互动开展了研究。他最初的资料收集方法是与两所中学的教职人员做个人访谈。访谈过程中的内容用磁带录下,调查者也尽可能地用纸和笔做记录。个人访谈后的两天内,调查者把手写记录和录下的访谈转移到计算机硬盘上。每次访谈内容都用一个单独的文件夹存储。一旦信息输入到计算机里,在自发范畴技术中用到的资料分组工作就会持续下去。

当每个完整的访谈逐个出现计算机屏幕上,艾伦就会仔细地浏览并做资料分析。当他认为新的资料构成了单独的单元时,就会在每个单元的结尾插入分页符,把它们相互区分开来。安装软件包是为了编页码和在每页上标出辨别性题头(identifying header)。打印时,每页都有一个单元的资料、可回溯资料来源的辨别性信息(通过题头)和页码。通常要用 12 张纸打印的一次访谈,此时则需多达 100 页或更多的纸。文献被打印出来,自发范畴技术则用来对成张的资料进行分类。辨别性题头和页码是重要的工具,有助于快捷地确定所需要的来源和语境。它也为审计跟踪提供支持。 127

杰克逊(Jackson, 1992)用 Ethnograph* 电脑软件包分析他与年老保管员及园艺工人访谈的资料。杰克逊一字不差地把记有每次访谈内容的手抄本输入 Ethnograph,并把手抄本有序地排列在纸张的左半部分,为编码做好准备。拿着手上的打印输出,他根据自发分类系统把资料范畴化。一旦完成编码,他就能通过单个范畴或范畴组合检索到信息。每组或合成组可能支持对资料所做的候选解释和拓展解释,因此丰富了资料分析过程。该过程与前面描述的一个过程没有本质区别,在后者中,一位作者根据候选分类系统排列 3×5 卡片。不过,就杰克逊的例子来看,计算机技术能极大地推进这个过程,可以用来综览候选的分类系统(以及相应的候选解释),并在分析过程中把它们互相整合起来。

组群资料分析

如果有更多称职的分析员参加这个过程,分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加强。这样带来的好处不只是线性增长的。每个分析员都不只是添上一段累积性的知识;实际上,该过程应该是互动的,不同分析员的不同定向反映在各自的分析中,既能用来激励或挑战他人的分析,也能结合起来,形成对资料意义

* Seidel, Kjolseth & Seymour, 1988。一种用于质性研究的分析软件——译者注。

的崭新的、更丰富的理解。

有一种组群分析格式是由麦克纳马拉、费特斯科和巴罗拿(McNamara, Fetsco & Barona, 1986)提出的资料库讨论。维特兹—邱吉尔(Witters-Churchill, 1988)在研究得克萨斯的校长们如何看待他们的预备课程时,采用了这个程序。为了分析对两个开放式问题的回答,她召集了两个四人小组,由来自教育部门的教授和学生组成。一组依据对两个开放式问题中的一个来初步分类回答;另一组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进行初步分类。每组都能对没有提
128 供初步分类的那个问题提出挑战。

这两组为每个问题的回答创建一种分类方案。首先,每组成员用 3×5 卡片分别记录其中一个问题的回答。随后,每组又分成两人小组,并把卡片归类到似乎要出现的回答范畴。全组重新聚集在一起,并分享他们提出的分类方案。调查者要求成员以两种方式来质疑被提议的方案:①提议的范畴是不是对回答的最好归组?②每个回答是否被纳入正确的范畴?这个过程持续下去,直到各组的成员达成一致。每组就其挑战的问题重复相同的过程。

在每组提出初步分类系统后,他们要为他们的提议准备正式报告和辩护。随后,每组要准备挑战对手组的分类系统。最后,两组聚在一起,举行两个小时的正式辩论会。在辩论期间,一组展示他们的系统,紧接着另一组提出质疑并提供相反的系统,随后第一组给出他们对其分类系统的最终辩护。对于第二个问题,也使用相同的过程。在辩论后,每组重新聚集,并用他们从另一组获得的信息修改他们的最初分类。他们的最终结果为维特兹—邱吉尔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她用它们挑战她自己的独立分析,并为她的研究创建了更有成效的最终分析。

威莫(1988)做了一项研究,旨在鉴别判断校长行为的标准,她在研究中采用了类似的程序。来自全美不同地区的优秀全职校长被分成两个小组,起初是个人,随后是独立小组,最后是两个小组在一个公共会议室展开讨论,并确定哪些是在位校长在各种实地环境中判定工作表现时本能地采用的标准。

毋庸置疑,有无数不同的具体程序可以发挥组群分析的优势;不过这两个简短的例子表明,任何组群分析都应包括几个要素。首先,要挑选有分析能力的人加入资料分析,这非常重要。使用既无经验也无技巧的人不会充实分析。
129 其次,每个分析员应先独立完成一份分析,以便为组群分析做出自己的贡献。最后,该过程还有一环:综合了个体观点的组群进行相互间的次级讨论。尽管这并不总是可能,但就如这两个例子表明的,这种次级组群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整个分析更有说服力和更有成效。

用三角测定法检验假说

一位作者在他对校长职位的研究(Allen, 1990)过程中,用到另外一种方法,它运用各种视角来观察被收集到的资料。在这种方法中,调查者把各个未加编辑的资料块(通常是单次访谈的完整手抄本)交给众多教育工作者,让他们做评价和解释。参与该分析阶段的人包括公立学校里的教师、大学教授和与教育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参与调查计划的人员被排除在该分析阶段之外,因为他们各自对整体的了解有可能影响他们所属派别的解释。目前,每个参与者的任务很简单:阅读访谈手抄本和观察记录,并根据所读内容写一篇对学校的简短描述。假定访谈内容和观察记录长短不一,评价者基于各自的特殊部分而引出与整体有关的推论,就会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当他们完成手中的任务时,参与者彼此之间不交流,也不和熟悉这项研究的人交流。在这部分独立评价和插补(interpolation)中,有件事情很突出:仅仅有一个评论者对学校的描述与调查者本人的先行分析引出的建构不相一致。这个特殊的反面案例源于一次访谈,实际上,这次访谈早就被认为偏离了其他回答者的视角。各方的独立描述间惊人的一致,以及这些描述与调查者本人对整体提出的独立解释之间的相似,使调查者更加坚信他的看法:他已获得一种对被研究学校的合理理解。 130

总　结

自然主义调查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分析是持续的,而且资料分析与资料收集是互动的。这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先行的访谈提供的信息指引了后续的访谈;访谈中了解到的信息有可能促使调查者在中途就改变这次访谈的进程。当调查者了解到的信息表明了某一资料的重要性时,就要抓住新的资料收集机会。各条工作假说要得到持续的检验。只要利用人这台奇妙的生物计算机就有可能实现这一切。除了在资料收集期以外,还要在各阶段的资料收集期之间、在资料收集结束时,持续进行密集的资料分析。通过对先前收集的资料的分析,调查者获得一定的信息,用于指导后续的资料收集期。分析永远不会真正完成,而且,甚至在最初的研究报告中,也可能收入那些对资料所做的竞争性解释。分析是一项丰富的、广泛的、奇妙的活动,也许比起自然主义调查的任何其他方面来说,它能更好的把调查者与研究语境关联起来。

进一步的研究

1. 再次考虑一下你在第 5 章（进一步的研究，问题 2 和问题 3）收集到的资料。为这些资料设计候选范畴化体系，并使用这些范畴来至少描写两幅候选案例场合（alternative case scenarios）（每套 PP. 3-5）。

2. 再次检查你在第 5 章（问题 1）中回顾的那些研究。描述一下这些研究中使用的分析过程。阐明资料分析是如何与资料收集互动的。

3. 再次考虑一下你从第 1 章开始就为一项自然主义研究制定的计划。现在，你能制定什么样的计划，来确保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过程是互动的？你能在你的计划中实现组群资料分析的优势吗？把这些推荐的程序放到你一直进行的计划中。

自然主义研究的质量标准 7

现在我们要考察恰当地评判自然主义研究的标准。在考察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回到建立可信度的需要这个问题上来,这在第 2 章已经涉及了。随着研究的启动和逐步开展,调查者必须为建立可信度设计步骤;最终的结果必须传达给听众这样的信息:这项研究值得关注。事实上,自然主义调查者必须特别关注可信度这个问题,因为正是在这方面,他们最常受到"草率的"调查和"主观的"观察这类指责的攻击。本章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帮助自然主义调查者了解并运用一些技术,来为自然主义研究的各个方面建立可信度。此外,笔者发现,在撰写和提供这类研究时,透彻地理解自然主义研究的各个方面与常规科学研究之间的差别,是有助益的。

通过建立可信度,自然主义研究能够合理地声称其方法的正确性。这样,自然主义调查者就能回应传统调查者的许多攻击,而且通常能使大多数中立的观察者确信,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也提供了对等的根据,表明它需要得到严肃的考虑。然而,由于自然主义调查者的范式假定,只是建立可信度还不够。可能更重要的是自然主义研究的标准,它们不仅仅对应于传统范式所要求的那些标准,而且是从自然主义范式本身中发源出来的。 132

自然主义范式的确重视个体所创造的独立现实,同时也必须重视个体对它们做出反应的方式,重视它们有哪些方法能够使个体有效地对环境做出反应。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 1989)已经找到了一些准则,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判断,对多重现实的这种灵敏反应性(responsiveness)就是真实性的标准。

最后,一些内在的原因促使调查者建立真实性标准,出于同样的原因,研究中的伦理考虑并不是"附加在"自然主义研究上的一个累赘,而是这种范式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由于该范式涉及研究语境中干系人的建构,因此他们必须受到尊重,并得到保护,不要受到调查的负面影响。自然主义研究的目的是从回答者本身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建构。一项研究如果破坏或摧毁其研

究语境中的建构性现实，事实上就是摧毁它自身。

如何建立可信度

在自然主义研究中，建立可信度需要运用一些技术，它们通过可信性而提供真值，通过可转移性提供适用性，通过可靠性提供融贯性，通过可确认性提供中立性。这些技术以及它们与传统研究的关系总结见表 7.1（改自 Lincoln & Guba，1985）。第 2 章中已介绍过列表中的技术。

传统研究班的学生很快就会了解到，在传统主义研究中，可信度是靠一些技术确立的，它们通过内在效度提供真值（例如，控制和随机化），通过外在效度提供适用性，通过可靠性确立融贯性（例如，测试项目的奇偶关联，测试—再测试或平行表格关联），通过客观性确立中立性（例如，跨主体的共识）。自然主义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些替补技术，用于支撑真值、适用性、融贯性和中立性。

提供可信度的自然主义技术

长期涉入

第一项有助于建立自然主义研究的真值或可信性的技术是长期涉入。

133 **表 7.1 建立可信度：传统研究与自然主义研究的比较**

标准	常规术语	自然主义术语	自然主义技术
真值	内在效度	可信性	长期涉入
			持久观察
			三角测定
			参考材料的合适性
			同侪报告
			成员核对
			反省杂记
适用性	外在效度	可转移性	深描
			立意抽样
			反省杂记
融贯性	可靠度	可靠性	可靠性审计
			反省杂记
中立性	客观性	可确认性	可确认性审计
			反省杂记

改自 Lincoln & Guba，1985。

特殊事件或调查者与回答者因彼此的在场而造成的陌生感，会导致一些歪曲，而延长涉入时间能减少歪曲，长期涉入能使调查者在一段延长的时间内了解一个组织或其他社会环境的文化，由此为可信性提供了基础。长期涉入还有助于调查者与回答者建立信任和增强善意。

歪曲可能是由一段特殊时间内出现的事件造成。公立学校在春季学期末、放假前的一个月是一段很反常的时间。日程安排更紧，机构日常工作更繁忙，学校专职人员压力更大。调查者如果只观察这个月的学校生活，就是在用严重扭曲的透镜来了解该校园的文化。另一方面，如果调查者的研究把这一时段排除在外，他可能又遗漏了理解该文化的关键。

研究中的歪曲可能由回答者或调查者引起，或出于无意或出于有意。调查者有时欣赏一种组织管理风格或一种教学风格，这种个人成见可能造成歪 134
曲。有时候关注可能造成研究中的个体做出特别的行为或反应，因此，仅仅关注他们就可能引起歪曲。例如，当校长观察一个班级时，教师们常评价说学生行为比平时变好了（或变坏了）。

另外，有时回答者或是想要取悦调查者，或是表达他们的个人倾向，或是想欺骗或迷惑调查者，或是根本不想回答，这些都可能造成歪曲。还有，一个有隐蔽计划的回答者也可能引起严重的歪曲。在史克普（Skipper, 1989）的研究中，两位被访者在回答访谈问题"呆在学校的期间，发生在你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时，举报了有关一位区行政人员的极端负面的信息。这是被一小伙人宣传的一种歪曲，这伙人别有用心，企图毁坏有关个人的名誉并由此削弱其威信。这种歪曲把研究导入错误的方向，大量时间耗费在调查这些最终证明是虚假的投诉上。通过长期涉入和持续的资料搜集，这类信息就能得到恰当的调查。调查者必须时刻小心，提防回答者有意或无意地传达的这类错误信息。赖特弗特（Lightfoot, 1983, P. 370）声称，在质性研究中，"那个人"*是研究工具，是洞察者，是选择者，是诠释者，是抵挡成见和偏见之类歪曲的卫士。赖特弗特还说："调查者应该意识到困扰他们进行理解的那些成见，并努力寻求相反的证据来反驳这些成见。"另外，她说调查者"聆听和接受他人的理解或判断，但不要被它们控制、鼓动或弱化"（P. 377）。

长期涉入同样也有助于调查者与回答者之间建立信任和培养善意。例如，在史克普（Skipper, 1989）的研究中，调查者是组织的一位新成员，是新任主管雇用她的，回答者视她为新任主管的盟友。在调查期间，她有意与主管保持距离，上班不和他同车，不跟他一起用餐。而且她每天在教师餐厅吃午饭。她同时进行了七个月的资料分析。在此期间，回答者看到她并非服务于主管人的利益，因此与调查者建立了信任，机密性受到尊重，而且回答者也投入到

---

* 指调查者——译者注。

研究过程之中。不过,信任是很脆弱的,调查者必须极度小心,因为一个差错就可以瞬间摧毁它。

135 弗莱雪(Fleisher, 1989)在他的研究中说,他开始赢得尊敬:

> ……通过参加每一次改造活动,尤其是"紧急事件"——斗殴、袭击、刺伤、逃跑和一次杀伤。对紧急事件的处理,是我每天参与监狱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创造善意、理解暴力(暴力既影响囚犯也影响到狱管之类的人员)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但是直到1985年参加过一次激烈的袭击后,我才开始看到干预暴力的正面社会影响。之后,狱管对我与以前不同了。在这之前,他们没有对我说过任何话……现在开始注意我了……在这个群体中,我有了一种归属感(PP. 108-109)。

约翰逊(Johnson, 1975,P. 111)陈述,实地调查者一致认为"在社会研究中,为了搜集资料,与信任有关的个人关系极其重要。"他还说,调查者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即,为人诚实、坦率、做个"好伙计",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关系到实地调查期间收集到的资料的效度。此外,他说,信任的建立要依赖一些因素:调查者要表明,他(她)有能力组织资料,为社会秩序提供一个合理的描述;表明他(她)对研究观察抱有兴趣,而且关心研究环境中的人们;还依赖于一些以"身临其境"(fitting in)的原则为指导的操作程序。也就是说,调查者应尽量缩短社会距离、采取"中道"策略,保持他所遇到的人和场景的完整性。

约翰逊(Johnson, 1975,P. 111)告诫说,在有些研究关系中,"适当的信任"取代了信任。他把"适当的信任"定义为"对于某人能够完成什么的一种个人的、常识性的判断。"他明智地说,一个有四个孩子的五十多岁的母亲,对一所地方大学的博士候选人所说的,具有现实局限性。

对于长期涉入必须提出一项忠告。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警告要反对人类学家所谓的"走向自然"。这种情况已被证实:调查者变得特别喜欢他(她)正研究的群体,结果忘记了调查者的身份,而且事实上,失去了研究的视角。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P. 304)表示,长期涉入容易
136 滋生这种走向自然的趋向。

弗莱雪(Fleisher, 1989)在监狱呆了几个月后,发现自己正走向自然。把他自己的思想与狱管及囚犯的思想区分开,变得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他的角色不再是一位人类学调查者,而是开始把自己看作一名从事改造的工作人员。他的研究日程开始与他作为局内人的思想观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狱管、囚犯的观念、意见和信念与他自己的混合在一起。他接纳与之工作和相处的狱管、管理者和行政人员的价值观。在朋友邻居面前他为监狱体制辩护,并且对无礼的囚犯的攻击性越来越强。他成为自己的报导人,根据自己的经验

和理解回答研究问题。当意识到这些时,他转向学术界同事寻求帮助,以重新获得自己的研究视角。有了他们的帮助,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一篇对弗莱雪研究的评论(Jacobs, 1991)中,作者指出,尽管弗莱雪向学术界同事咨询过,但作者怀疑,他并没有成功地重获他的客观性。雅各布声称(Jacobs, 1991,P. 115),“书中从这一点开始,我感到,他从他们的角度(着重号为引者加)描述狱管、囚犯和行政领导的生活,这种尝试有严重的偏见。”雅各布还说,最让他忧虑的是,尽管这是一部值得称赞的描述监狱生活的民族志,但是由于上述原因,一些片段可能被歪曲了;因此,这些资料并不支持改良监狱的建议。

赖特弗特(Lightfoot, 1983)说,即使做短期尝试的调查者,通常也意识到他们工作的干预性,包括他们在哪些方面干扰了环境。短期逗留的一个优势是,调查者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呆在有关系统中,对社会变化产生影响;然而,逗留时间短了,调查者就不可能有时间营造善意的氛围和取得信任。尽管长期逗留能导致调查者与系统中的参与者产生更多侵扰性的互动,但同时也提供了机会,建立一些关系,它们是获取深入的、精确的资料所必需的。

持久观察

长期涉入是为了减轻因调查者的在场而引起的歪曲,而持久观察却强调调查者的在场,强调调查者应该积极寻找那些符合自己的自发设计的资料来源。在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P. 304)看来,持久观察使研究有所侧重,没有重点的话,一项研究可能是一次盲目的投入。他们还说:“如果长 137
期涉入提供视野,那么持久观察则提供深度。”

赖特弗特(Lightfoot, 1983)认为持久观察有赖于调查者把握机会、承担个人风险的能力。持久观察并不是被动的,它要求调查者具有强烈的目的意识和主断(assertiveness)意识。她发现人们挺身而出迎接各种情况,精神集中深思熟虑地做出回应,而且重视把注意力集中在明确的目标上。赖特弗特补充说,因为她的每项研究花在实地调查上的时间相对较短,所以这种能力对于她来说尤为重要。

持久观察有助于调查者从看似无关的东西中挑选出有意义的东西,并确定反常的案例在什么时候是重要的。例如,史克普(Skipper, 1989)的研究就谈到,人们常说美国空军基地某所中学的学生具有竞争力,独立性强,然而在一次访谈时,一位教师讲述学生们如何依赖基地,以至于如果基地没有纸张他们也就没纸可用了。另一位教师说,在学校一次集体出外游玩时,学生们害怕在河边走,紧紧地抓住一个在场的监护人。开始,这信息可能看起来无关紧要或反常,但进一步调查则表明,只有在基地的钢丝栅栏围起来的这个保护圈中,这些学生才有竞争力和独立性,才能迅速地融合进去。出了基地有时就是

另一回事了。没有持久的观察，之前的假设可能就会得到保留。在赖特弗特（Lightfoot, 1983, PP. 13-14）看来，“真理在于多种视角的整合，而不在于选择一个视角，把它视为首要的和‘客观的’；……我必须时时留心倾听真理……不会因为它在中心模式之外而漠视它的存在。”

出于同样的原因，避免提前闭合调查是很重要的。提前闭合可能是由于资金问题，或是当事人的要求，或是不能容忍模棱两可的情况，也可能出于完成任务的愿望。无论何种情况，调查者都可能过早地欣然采纳一种解释，而后者很可能引导出不恰当的假说。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 P. 305）说：“有些场合存在着谎言、伪装或欺骗，过早闭合会使这些欺瞒行为更容易得逞。”

三角测定

利用不同的或多重的资料来源（时间、空间、人物）、方法（观察、访谈、光
138 盘、照片、文献）、调查者（一人或多人）、或理论（单角度对多角度分析），三角
测定能导向可信性（Denzin, 1970）。

如果一项研究重点集中在医院对病人死亡的反应与互动，资料可以来自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早上、中午、午夜）、医院里的不同部门（儿科、妇产科、特别护理科）和不同的角色群体（医生、护士、义工、病人亲属）。方法论三角测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通常的做法是把两种或更多种不同的研究策略结合起来。就医院这个例子来说，调查者可以询问某一特定医院的护士对于病人的死亡做何反应，来启动其研究。调查者可以通过观察护士对于病人死亡做何反应，来对这类信息进行三角测定。调查者也可以就护士对死亡的反应，与医生和亲属进行访谈和调查。诸如备忘录、记事簿、逸闻记录以及缺勤报告之类的人造物，也可以成为三角测定过程的一部分。多种方法间的三角测定（观察、访谈、文献）优先于一种方法内的三角测定（观察 A、观察 B、观察 C）。

在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9）看来，研究中的每一条信息至少应该得到另一种来源的拓展，比如第二次访谈或第二种方法。单条信息对于理解研究语境几乎没什么帮助，除非利用三角测定来丰富它。此外，信息的缺失也可以提供重要的信息。例如，史克普（Skipper, 1989）的研究中提到，校长声明：“我采取一对一的谈话，而不是利用备忘录。”该声明既可以通过与教师的访谈和观察、也可以因为文件中没有任何这类的备忘录而得到三角测定。

调查者三角测定指的是，投入观察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个人。当有多个观察者时，最老练的观察者必须离资料最近。“代人捉刀”的做法要予以避免。如果同事报告了相同类型的观察，那么对观察的信心就会增强（Denzin, 1970）。在本书的第 1 章中，一个有五名成员的团队独立工作，并各自遵循自己的日程安排，不过，对于被研究的那个组织，他们得出了三条收敛的结论。

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规定团队内要进行相互交流,以促使所有成员行动一致。他们还感觉到,团队成员因其他队员而保持“诚实”,可能有助于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性。

极少调查研究能够做到理论三角测定。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分析同一组资料的过程中,使用几种不同的视角(Zelditch, 1970)。例如,就医院这个 139
例子来说,我们可以发现,马斯洛或赫茨伯格的动机理论能用来筛选调查者搜集到的资料,由此扩展基于这些资料的建构。在第4章中,我们提到,一位笔者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但他的资料描述了一个利克特系统4的组织,这可以看作理论三角测定的一个实例。

三角测定取得的收敛程度暗示了一种评价自然主义研究的标准。换句话说,通过对多重的资料来源、方法、调查者或理论进行三角测定,所获得的收敛性越强,观察结果也就越值得信赖。不过,以这种方式取得的收敛性,绝不会导致资料的减少,只会通过部分重叠、基于不同视点的兼容性建构而引发意义的延伸。

合适的参考材料

语境丰富又完整的材料提供背景意义,支撑了资料的分析、解释和审计,合适的参考材料正是通过提供这种材料来帮助建立可信性。要获得这些合适的参考材料,既可以使用引人注目的方式也可以使用不张扬的方式。引人注目的方式容易在某种程度上侵扰环境。它们包括拍照、录像和录音,由调查者本人或其他人为调查者代做。不张扬的方式包括对小册子、目录册、报纸、年鉴、照片、备忘录以及教师邮箱中的信息的收集和述评,这些资料通常可以得到,是原来就具备的,与调查者没什么关系。所有这些合适的参考材料都能为调查者提供一个片段,而后者可能对其理解一个组织的语境极为有用。

有一些策略和来源,对于在学校这种环境中获得合适的参考材料可能尤其有用。其一,调查者应该在教师休息室设一个邮箱,这样就可以像组织中的其他个人一样收到所有的信息,不仅留意有什么,而且留意缺少什么。其二,调查者应该着手拍摄和搜集照片,并把它们保存在相册中。有位调查者就发现这些照片、以及在新闻工作部门找到的那些照片,在分析很多已有的假说时非常有用。其三,就中学来说,年鉴和校报很有价值。教职工们在每期年鉴中 140
用图画和简短的陈述概括当年的希望、梦想和成就。多种多样的年鉴提供很多信息,展示长期以来学校不断发展的文化。赖特弗特(Lightfoot, 1983, P. 17)指出,对于“要知道学校想要受到怎样的理解,它如何努力刻画其活动和事件,以及谁看来是主要的公众人物、最受欢迎的形象代言人”,这些信息非常重要。在其他环境中,可以采取类似的策略和来源来积累合适的参考材料。

尽管这类材料向调查者和研究的目标听众传达了丰富的意义，但不要作为正式分析的一部分加以使用。事实上，尽管它们是在研究期间收集的，却是在分析完成之后被用来支持审计过程和丰富研究所传达的意义。比费罗(Bifano, 1987; Bifano & Erlandson, 1989)在她对三所学校的学位论文研究期间拍摄了大量的静态照片。这些照片的重点集中在物理环境上(而不在人物上)，而且主要拍摄三所学校里对应的场景(教室、走廊、休息室、办公室、操场等)。她用这些照片做了两件事。首先，她请一群医学博士(physician)观看每组照片并说出他们对学校的印象。他们的评论与她对三所学校中人类互动的分析有着惊人的一致。然后，在最终的学位论文答辩中，她让答辩委员会成员观看照片，请他们谈谈照片的描绘与她记录的人类互动之间有多大的一致。在确认他们看到了高度的一致之后，她播放了医学博士们所做的磁带记录观察，而这些医学博士并未看到她的书面记录。她用这种建构的收敛引入了对其研究的审计跟踪。

同侪报告

同侪报告有助于建立可信性，其过程如下：找一位同侪，他是外在于研究语境的一位专家，对相关研究有一些大体的理解，让他分析材料、检验工作假说和自发设计、倾听调查者的想法和担忧。在这样的会谈中，同侪报告者提些盘根究底的问题，为反面观点做辩护，提供候选说明，而调查者则边想边说出并探讨各种假说。这类会谈也有助于调查者发泄一些可能给研究蒙上阴影的沮丧情绪。同侪报告者可以同情地倾听这些感受，尽可能地缓和气氛，并帮助调查者设计处理策略。这种技巧在帮助调查者应对一段孤独期上显得尤其有价值。

141 弗莱雪(Fleisher, 1989)在过度融入他正在研究的监狱文化时，把各个大学的同事作为同侪报告者，来帮助他重获客观性。他也认为，与他们的谈话有助于他设计其研究策略和组织其思想。

报告者应该是调查者的某个同侪(Lincoln & Guba, 1985)。如果报告者不是调查者的同侪，就存在着危机，例如，可能把报告者的建议弃置不用，或当作命令。一般来说，调查者不应该选择他的博士学位委员会的成员作为报告者，因为他(她)相对于调查者处于一种权威的地位。同侪报告可以是与朋友或同事进行的非正式过程。

此外，同侪会谈应该包括对自发方法论设计的讨论，而且每次会谈结束时，应该为审计跟踪准备一篇经过深思的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应该概述一下主题、担忧、自发假说，和以备存档的自发设计。

莫布里(Mobley, 1992)在研究糖尿病人的过程中，她选择了一位女士作为她的主要同侪报告者，这位女士是一名牙医，而且碰巧也是一个糖尿病患

者，并受过糖尿病方面的教育。当莫布里把她的观察研究、其当事人的看法与感受告诉她时，这位专业人士能够帮她解释她的所见所闻，并帮她确定她的资料对于糖尿病人是否典型，还是更可能源于其他因素，如当事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完成研究之后，她找到另一位同侪报告者，国内糖尿病教育领域的一位专家，请其阅读她的报告，挑战她的结论并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解释。

关于同侪报告，调查者必须意识到，他（她）既与组织内的成员、也与专业内的同事有关系（Johnson, 1975）。调查者必须能够在两个同时扮演的角色间转换自如。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和谈话有助于保持研究的诚实性，而且在与同事的接触中会产生很多关于研究的新想法。另一方面，调查者必须记住，同事、朋友及家庭成员有时会给予大量溢美之辞和鼓励的话语，有时又拒绝给予任何赞美和鼓励。调查者能否坚持计划常常取决于他们。他们能对研究、研究方向、和报告的内容产生极大的影响。这对于资料的搜集、分析和报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调查者必须保持警惕，因为通过这些必要的人际关系，调查者的个人感受与研究计划的相关努力融合在了一起。自然主义调查者必须忠实 142
于语境及其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如第2章所述的，自然主义调查者必须学会走出自我，才能通过回答者的眼光观察生活。

成员核对

利用干系群体的（Stakeholding groups）成员对范畴、解释和结论的检验，成员核对有助于可信性的建立。在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看来，它是建立可信性的最为重要的技术。也就是在这一步上，被研究环境的成员才有机会指明调查者的重构是否能得到承认。

不要把成员核对与三角测定相混淆，后者是不同来源的资料相互核对的过程。成员核对是针对一些建构而实施的，这些建构来自三角测定过的资料。

成员核对是连续实施的，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下面列举的是自然主义研究中经常实施成员核对的范围：

1. 成员核对可以在访谈结束时实施，对资料进行概述，让回答者立刻纠正事实错误或对解释提出挑战。

2. 成员核对可以在访谈中实施，检验先期访谈中搜集到的解释和资料。

3. 成员核对可以在与组织成员进行的非正式谈话中实施。

4. 成员核对可以这样实施：把研究报告不同部分的副本分发给不同的干系群体，让他们就报告的内容做出书面的或口头的评论。

5. 在提交最终报告之前，调查者应该把研究的整个副本分发给回答者组成的评论小组以及被研究环境中的其他人，来实施成员核对。

成员核对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容易，尤其是关于书面报告的部分。一位笔者发现，他很难让系统中的参与者阅读与他们自己或与他们的计划有关的

描述性文字。在准备让校长阅读一段与他自己有关的描述性文字时，系统中
143 的参与者提醒调查者，尽管这段文字很准确，校长也不愿承认调查者采访教师而收集到的部分信息。不过，当校长最终归还这段文字，并承认它很准确时，调查者把其他片段提交给校长，让他做评论，就容易多了。

当组织成员评论那些对其文化所做的“是非分明的”（the black-and-white）解释时，调查者必须做好准备，迎接各种反应。赖特弗特（Lightfoot, 1983）报道说，有位校长在阅读一项对其中学所做的自然主义研究时说到，阅读这篇报告时体验到了痛苦，部分是因为真相被揭露而造成的不快。

成员核对过程中也存在着危险。有些系统不允许批评。一所中学的职员和教员给一位笔者发来了报告，但没有提出评价或改进建议；一次同侪报告会谈很快就揭露了真相，也许该校现行的组织模式不允许批评或提供有建设性的反馈。对该系统的深入分析证明了这确是实情。结果是，成员核对过程被限定在少数的几个人，他们要有批判精神，做到诚实，而不是一味地粉饰太平。调查者发现，中学生在提供直接的成员核对、克服上述问题方面，显得极有帮助。

另一个危险是，如果所有成员共有一个秘密，或是密谋误导调查者，成员核对就有误导性。在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看来，如果调查者被蒙蔽，那么下一步的成员核对就很容易变成对已“发现”的东西的效度证明。人类仪具必须保持警惕。

反省杂记

反省杂记不仅有助于建立研究的可信性，还有助于建立可转移性、可靠性、可确认性。根据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反省杂记是一种日记，调查者有规律地记录其个人信息。杂记提供一些方面的信息，包括调查者的进度、后勤工作、洞见和方法论决议的理由。林肯和古巴提议要每日杂记。但在一天结束时做这种杂记需要大量的磨练。有些调查者发现，做每周一次的过程记录更容易、也更现实。打印出的杂记随后会成为研究的审计跟踪的
144 一部分。下面的内容摘自一位笔者（Skipper, 1989）的反省杂记：

十　月

这段时间里，我开始真正了解学生、他们的父母、老师和校长。我发现学生们在追求他们的目标时表现得特别有教养——尤其是那些争取奖学金的毕业生……老师们一直很友好，并完全接受了我。我和他们呆在一起的时间足够长，以致能看出每个人的缺陷。一些缺陷看来是由学校本身的情况造成的，这些学校的学生总是在变化。由于工作的要求，我只有到十一月才能开始正式的访谈过程。这很可能把我的第二轮访谈拖到一月份，不过，我还是认为这

也没大碍。

十一月

留给访谈的时间不多了，部分是因为我只有一半的时间呆在校园里。但至少我已经准备好了问题。我挑选出这些问题，是为了获得有关被访者的背景信息，用赫兹伯格的问题去了解经验的外部界线，以及获得交流模式方面的信息和回答研究问题的一些可能暗喻。

十二月

采访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老师们似乎很乐意有人倾听他们对学校的看法……我有点担心暗喻的使用，直到我从学生那里得到了一些。他们太好了！很难挑选最突出的一个暗喻。我很可能把几个混在一起。在校长把他的暗喻给了我后，我准备让他读读其他暗喻，看看他的反应。

一　月

今天我采访了校长。尽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访谈并不像我预期的那样有效率。他善于应对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开放式的问题；因此，我以后会用更多这样的问题来从他那里获得我需要的信息。 145

二　月

这周，我对校长说，我以为我本来最好是短期内进来把研究做完，然后离开。我在这里呆的时间太长了。我开始看透了一些教师。我必须很谨慎地使用"献身"这个词。它适用于一些人，但绝不适用于另一些人。我起初认为很多人都可以用"献身"来描述，但我发现错了，最好把他们看成是寻求自身利益的人，只做一些必需的事来保住教师这个理想职业……我正在把需要回答的问题列成清单，然后找到并询问那些能够回答的人。

三　月

我原提出过一种假说，认为学生是按其父辈的地位（官员对军士）而划分的；上周与学生访谈过后，我修改了该假说。有个学生把这叫做"虚构的"差异，因为学生只要愿意就能轻易地跨过这个分界线。同样，一位老师也认为一个问题学生到哪儿都会有问题。我让其他人验证这种修正……因为组织的变

故和可能的人事变动，可能影响到我以及我在学校的角色，因此我很快要停止我的工作了。

尽管坚持做反省杂记服务于一个不同的目的，但也不需要从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弗莱雪（Fleisher, 1989, P. 103）在狱中的最后一段时间，每天都整理他的日记，更新他的联络日志（囚犯和狱管的清单——他们在哪里谈话，他们谈了什么，谈了多长时间）。他还开始把他的访谈资料加以分类：例如“新来的看守（训练问题；家庭问题；个人历史经历；工作经验等）；……善意（我做得好吗？我怎么知道的？）；问题（谁是我下一个谈话对象？谈什么？）；关系网（谁把我介绍给谁的？他们是怎样联系的？）；等等。”有了这些问题，他开始下一轮的日常工作。

深　描

潜在的应用者是立足于资料库对可转移性做出判断的；利用多重的低阶抽象来描述资料库，深描为可转移性打下了基础。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 P. 125）写到：“读者为了理解有关发现（不充当部分深描的发现，尽管它们必须依靠那些得到深描的要素来加以解释），可能需要知道一些东西，描述必须都予以详细阐述……”
146
为了确保拥有写作深描的必需资料，运用所有的感官来保持对语境的清醒意识，这非常重要。呆在语境中的时候，停下来看看、听听、闻闻，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和互动，是很重要的。当读到一段描述时，读者应该能感受到，如果真的呆在有关语境中，会是什么样的。下面的内容摘自于赖特弗特的《好中学》（1983, P. 157）：

> 室内，木地板中逸出的陈年粉笔尘的气味提醒我是在学校……当我穿过走廊——浅棕色和金黄色的地砖、绿色主色配以浅蓝的墙壁、低矮的顶篷、狭窄的走道，我感觉仿佛在回到过去……布鲁克林中学（Brookline High）给人的感觉是舒适和古朴——超脱了很多现代学校建筑的新式造型、开放空间与明亮采光。

在这段文字中，通过种种描述，读者几乎可以用眼睛看到布鲁克林中学。在写作这类描述性的文字时，一些调查者发现，在语境中拉起一张椅子，坐下来做纪录，是很有帮助的。在这个角度，你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闻到什么？感受到什么？在做记录、写这类文字时，作者应该做到细心，既见森林，也见树木。例如，一位笔者坐在一个中学门口，出于描述的目的记了丰富的笔记，回家后却发现记录中没有一处提到学校墙砖的颜色。

弗莱雪（Fleisher, 1989）的研究中包含了这样一段深描：

> 1986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埃迪（Eddie）的牢房见到了他。他和考博依

(Cowboy)几个人同住,当天晚上同房的人都忙着筹钱,准备去杂货店做一次特殊的购物活动。埃迪坐在马桶盖上,数着考博依从沿排的牢房凑来的钱。对去杂货店他们都很兴奋。埃迪说他要买四箱六桶装的罐装橙汁,他自诩是一个高明的狱中造酒师,要发起"一个美味的桔子酒之夜,星期五盛会之夜"。

对一个地点的物理描述要比对人的描述容易得多。对人的描述决不能给人留下讽刺漫画的印象。有一位调查者要对一所中学的校长进行描述,这段 147
描述有可能演变为一幅讽刺漫画,在处理过程中,调查者说服该校的两个教师帮忙来完成这个描述。开始的一些尝试很滑稽。下面是最终的描述(Skipper, 1989):

老师们把他描述成"保守的"、"整洁的"和"老实的"人。有人用"乡绅"来总括他。他那"西部风格的服饰"和鳗鱼皮靴强化了这种描述。他身高中等偏上,一头打理得"纹丝不乱的"沙棕色头发。他体态显得非常健康,这是节食的结果:远离自制肉桂卷和学校餐厅的诱人午餐。亲切的笑容、良好的幽默感、容易脸红,这些特征使年近五十的他"看起来很年轻"。

在写这种描述文字时,引用语境中接受访谈的人的话,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这样读者和调查者就能对资料进行分析。对互动的描述,如下面的这个例子中的描述,同样也要成为深描的一部分。

在教室里,学生似乎受到了异常公平的对待。作为个人,他们得到了老师方方面面的关注,不过群体的身份则似乎减弱了。虽然在教室里学生似乎受到平等无偏私的关注,但因人施教的不同层次在肯尼迪还是非常明显。优等生与补习生在学校的经历也大不一样。教员把这种对比描述成"昼夜黑白之差,甚至不在一个平台上(赖特弗特,1983,P.85)。"

在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P.316)看来,究竟什么是适当的深描,仍没有得到完全的确定。并非所有的描述性资料都能成为深描;而且,"区分有关的描述符与无关的描述符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明确。"不过,为了变向地解决这个难题,林肯和古巴提议,调查者应该通过立意抽样,尽可能提供最广泛的资料,以备深描之需。

立意抽样

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提到的,自然主义研究依赖于立意抽样,而不是常规范式中常见的随机抽样技术。立意抽样需要一个程序,该程序受到一些自发 148
洞见的支配,而后者与研究相关,关注问题所决定的焦点;立意抽样还要有意地寻找典型的和离散的资料,从而最大化与语境有关的信息范围。在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P.210)看来,"调查的目的不是聚焦于那些能发

展为概推的相似性，而是详细地描述许多赋予语境以独特风格的细节。另一个目标是生产信息，充当自发设计和扎根理论的基础。”

根据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的看法，调查者应该以最大程度地拓展可能信息范围的方式，来选择最大变异抽样。这种抽样不抑制异常案例，并允许充分地揭示多重现实。立意抽样的程序依赖于自发设计，而非先验设计。只有当冗余信息出现，而不是达到一种统计置信水平(a statistical confidence level)时，才能做出停止抽样过程的决定。

一位笔者请被研究中学的校长指出他认为可以当作典型案例的那些教员和学生，以此开始他的立意抽样(Skipper, 1989)。这个群体被当作立意抽样中的初始群体。在采访之前，调查者并没有确定问题，这符合自然主义的研究设计。这里还用到了未成型的、探索性的访谈指南，它们同时还探索一些经验参数(高和低)。有个问题是“请谈谈鲁道夫中学。”另一个是“想想你在鲁道夫中学感到特别美妙(或糟糕)的那段时光。”每次访谈结束，调查者还会问：“为了了解鲁道夫中学，你认为我还需要找谁谈谈?”以及“谁可能对鲁道夫中学持不同的看法?”利用这些问题，调查者找到了那个了解被长期尘封、但重要的学校史的人。调查者一直寻找被访者来填补缺口、聚焦见解，直到冗余信息的出现。

审计跟踪

审计跟踪允许一位审计员确定研究的可信度，这样有助于可靠性和可确认性的建立。在研究中保留足够的记录十分重要。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 1985, P. 319-320)给出了审计跟踪材料的六种范畴：①原始资料(访谈
149 指南、记录、文献)；②资料简化和分析结果(3×5 卡片，同侪报告记录)；③资料重建和综合结果(扎根理论和资料分析单、报告)；④过程记录(杂记)；⑤与意图和倾向有关的材料(调查建议、杂记、同侪报告记录)和⑥涉及任何仪具的发展的信息。

施万特和霍尔本(Schwandt & Halpern, 1988)提出了一个计划、组织、记录和提交审计跟踪的四阶段模型。计划过程包括确定审计是否值得、如何构造、包括哪些内容、怎样准备和继续。组织过程决定保存什么样的记录(审计跟踪的实质)以及如何归档(审计跟踪的结构)。记录需要调查者很好地建立一个纪录和文件体系，这既是为了在调查开展时提高调查质量，也为了使事后评论研究质量成为可能。提交意味着赋予审计员在恰当时间进行审计跟踪的权力。

为了实施这种模型，施万特和霍尔本提供了相当深入的指导。他们为审计跟踪推荐了一个记录保存系统，来为研究语境和研究过程的深描作好准备。他们还建议，单独的条目(研究计划、被研究的事件、对调查者的决定和行为

的记述)和结构考虑(文件系统、交互参照、索引和资料),在建立审计跟踪时,应该结合进去。他们为审计跟踪提出了六类文件:三类描述研究的现象,三类描述研究的程序。

描绘研究现象的文件包括原始资料文件、资料简化文件和资料重建文件。原始资料文件含有引起发现的所有信息。它们包括观察、访谈、文献和其他来源的记录。由于它们距将进入研究语境的审计员最近,因此强烈地影响到研究在其眼中的可信性。它们既包括调查者已过滤的资料,也包括相对未过滤的资料(实际的引用或磁带记录);既包括按照抽象阶梯(第 2 章已有描述)而分类的低和高参考资料,也包括它们与调查者自己的建构之间的全部互动。原始资料记录中的时间和日期既能为审计、也能为研究本身提供便利。资料简化文件包括:①为方便交流而做的记录压缩;②用于迅速厘清已获资料的报
道(write-up);③归类组合资料的范畴;④用于概述大量资料的形象展示 150
(visual display);和⑤用于管理大量资料的计算机分析提要。资料重建文件追踪那些源自于原始资料文件和资料简化文件的主题,来为研究制定总体主题。它们包括:①展示研究中自发出现的新建构和工作假说的那些理论记录;②显示范畴关系的形象展示;③在逻辑上与那些被鉴定和检查过的资料范畴有关的发现和结论;④为研究所做的报告(中期报告或最终报告)。

显示研究程序的审计跟踪文件包括:与研究过程有关的笔记、与意图和动机相关的笔记和仪具、工具及来源的文字说明。过程记录包括方法论记录,后者提供的信息表明了研究中是如何采纳或做出程序、策略和每日决议的。它们也包括可信度记录(用于追踪那些旨在提高可信性、可靠性和可确认性的步骤)和审计跟踪记录(提供进入审计跟踪的路线图)。意图和动机文件包括:初始研究建议(使审计员能评估初始研究框架和自发需要之间的互动);揭示研究期间调查者的感受、反思、恐惧、偏见和自发价值的个人记录;随着调查者的思想过程的发展和它们对研究的指导,对该过程所做的记录。最后,审计跟踪文件应该为审计员提供指导研究(既在开始的时候,也在过程之中)的关键问题、用于收集资料的各种工具和用于分析资料的工具。

审计跟踪的关键是,在不提到来源的情况下,不报告"事实",在没有资料支撑的情况下,不做断定。一位调查者发现,把最终报告的大纲与原始资料、资料简化结果进行交互参照,能为审计提供便利(Skipper, 1989)。在最终的报告中确定一段深描,在研究大纲(有页码帮助)中找到对应的部分,并参考记录卡、照片或大纲提到的人造物,这能为评估研究提供便利。

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个过程,她在研究中把记录卡标上"IA"、"IB"、"IE1"、"IE2"等记号,表明被报告的信息在大纲中的哪处,也就表明了在叙述中处于
何处。照片被简单地编了号。人造物也被编码,用"B"表示空军基地信息, 151
"S"表示学校信息,"C"表示校历信息,"A"表示学校年鉴,"N"表示校报文

章。表7.2展示的是该项自然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审计跟踪,表明信息如何做三角测定。

确保真实性

尽管可信度很重要,但在自然主义研究中,它还不足以充当一种质量标准。它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可信度只证实了方法论的适当;通过建立可信度,自然主义调查者完全有理由要求维护其方法论,就如传统调查者为他们的方法论所做的一样。但是自然主义范式要求的更多。传统研究相信单一客观现实的存在,与之不同的是,自然主义研究从不同个体所建构的独立现实中获取力量。调查者必需赋予这些独立现实在那些个体的生活中、在它们运作的语境中、在研究报告中以一定的地位(Guba & Lincoln, 1989)。只有赋予这种地位,才能称得上"真实性"。自然主义者的职责就是要实现真实性。

方法论的适当还不足,因为它自身不能保证满足自然主义范式的这些宗旨。例如,想想下述建立可信度的两条策略的含义:长期涉入和持久观察。基于语境的理解能最大化本土观察者和外部观察者的共同优势;通过实现这种理解,调查者获得巨大的力量,能对被研究环境中的过程和结果施加影响。调查者既能明智地、也能不明智地运用这种力量。直到我们的逻辑进程的这一点上,很多传统调查者都会持同意态度。他们也会同意应该明智地运用力量,尽管大多数会承认实情并非总是如此。

当我们试图确定"明智地"这个词语的意义时,两个范式就出现了分歧。传统的调查者会求助于"已接受的实践"、"先行的研究"或"正统的权威"等诸如此类的标准。自然主义调查者不会否认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但同时也会要求,应该把它们同社会语境中各个干系人的建构一道引入解释的辩证(见第6章)。尊重这些建构、认识到干系人间的任何公共活动都依赖于由独
152 立建构组成的共有建构的发展,在研究中是极其重要的。

表7.2 审计跟踪

鲁道夫中学在过渡阶段的稳定性	索引卡	照片	人造物 B:基地 C:校历	 D:地区 A:年鉴	 S:学校 N:报纸
Ⅰ.丰富的历史(第44页)					
A.基地的位置/审计跟踪判断	IA,IB	4,5,6		B1	
B.基地描述/通道	IB	6		B1	
C.基地住宅描述	IB,IC				

续表

	鲁道夫中学在过渡阶段的稳定性				
	索引卡	照片	人造物		
			B:基地 C:校历	D:地区 A:年鉴	S:学校 N:报纸
D. 基地历史		B1,D2			
E. 基地的使命/个人教育	IE(1-3)			A(1,2),D2,P32	
F. 学校地区史/基金	IF(1-2)			N(34,35,41)	
Ⅱ. 高中(第47页)					
A. 周边道路					
1. 描述	ⅡA	7			
2. 体育场	8,9				
3. 树木	8				
B. 校园描述	ⅡB(1-2)	10,11,14,80,81		A(1-5)	
C. 中学办公室描述/秘书	ⅡC(1-6)	65,66			
D. 教师休息室描述		67,68			
E. 空地描述	ⅡE	15-18,24-28			
F. 主教学区建筑描述/列举	ⅡF	30－44,49			
Ⅲ. 校长——"为孩子们做到最好!"(第51页)					
A. 物理描述		2,90			
1. "保守"	ⅢA2(1-2)				
2. "整洁"	ⅢA2(1)	2,90			
3. "老实"	ⅢA2(2),ⅢA3				
4. "乡绅"	ⅢA4				
5. "西部风格服饰"	ⅢA4	2,90			
6. "头发纹丝不乱"	ⅢA2(1)	2,90		A16	
7. "体态健康"	ⅢA6(1-2)	90,92			

摘自 Skipper,1989。

公平是真实性的第一个标准。所有干系人的建构必须有平等的通道,进 153
入群体方向的确定过程。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 1989)说到:"评估者的职责是寻找、传达所有这样的建构,并清楚地阐明这些建构——及其底层价值系统——起冲突的方式(P. 246)。"调查者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所有的干系人,并设法获得其群体内的建构。调查者还要努力获得一条开放的通道,分有这些建构(干系群体和调查者之间),并确定结论、建议和行动步骤。公平还要求一种持续开放的过程,为那些认为群体方向的确定过程是折衷产物的干系人提供上诉渠道。

由于人类语境及其内部的权力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研究最初获得的知情同意也必须不断地进行更新。如果某一社会语境的现实发生改变，使干系人觉得有关研究不利于其利益，那么，允许调查者进入该语境实施研究的形式协议，就成了毫无意义的证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调查者坚持认为最初的形式协议应该得到尊重，那么他就是在自找麻烦，其活动也就会适得其反。调查者所依赖的公开过程已被紧紧关闭，没有任何形式协议能将其打开。当然，知情同意的不断更新使调查者变得极其脆弱*。

传统调查者认为研究程序和通道问题应提前确定，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脆弱性实在是一件龌龊的事情。如果调查者不能掌控研究过程，那如何确保研究的效度、可靠度或客观性呢？不过，有经验的自然主义调查者认为，这种脆弱性不是研究实施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实际上是一种财富。以第4章描述的一位作者的案例为例，在一所新开的城内中学的第一年，他与校长及全体教员共事。校长和教员间的协议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公开和笼统的。双方均认为交易（获得资料的机会与反馈信息且提供建议之间的交换）是公平的，能使双方受益。他们都默认，如果任何一方在任何一点上对于协议不满意，那么协议作废。由于调查者认为，对于该校及其程序的合适理解，只能通过干系人的各种
154 建构相互之间的、以及与他自己的建构之间的辩证互动，才能获得，因此，调查者运用这种互动过程来确定资料，并发展一些能真正用于学校运作的干系人建构。校长则认识到他从调查者那里获得了相当有价值的反馈，因此留心调查者获得资料的通道不被阻塞。双方认为他们都能从最初非常松散的和非正式的协定中受益；通过此利益的实现，双方获得了力量。每一天都有协定的更新和详细说明，这不仅对于调查者来说是一种解放，而且也远比在一开始的正式协定中把一切规定妥当所获得的多得多。

本体的真实性作为第二个标准，源于一些建构的拓展，个体把这些建构带入有关社会语境中，以改善他们对周边世界的体验方式。要证明是否满足第二个标准，可以利用回答者的明证（testimony），看那些建构是否真的提升了他们的理解，还可以利用那些做了记录的观察，看看他们的建构是否得到拓展。

教育的真实性是指，回答者对其他干系群体的建构的理解和欣赏，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拓展。我们可以从回答者的明证或通过观察它们基于辩证过程的增长，来判定这个标准是否得到满足。

触媒的真实性指的是，干系人的拓展性建构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决定和行为。要知道是否达到这一标准，我们可以看看回答者是否愿意用他们的拓展性建构作为行动的基础，看看他们在研究过程中进行学习时的实际决定，以

---

* vulnerable，名词为 vulnerability，尽管译为“脆弱”，但文中的本意指调查者会随时遭遇新的情况，因此需要不断做出调整——译者注。

及在一段连续的时期内被观察到的行为和变化。

最后是策略的真实性。这个标准是指干系人被赋权开展活动的程度。如果他们的决议、计划或行为对于它们发生于其间的社会语境的塑造和未来没有可能产生影响，那么他们去做决定、提出计划甚至采取行动的意愿，是毫无意义的。策略的真实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干系人的明证、对干系人参与有关语境的方式的继续观察、研究过程中赋权活动本身的表现。 155

伦理考虑

自然主义的范式特点决定了这种研究需要真实性标准，同样的特点也决定了自然主义调查者考虑其研究的伦理责任的方式。对于传统的调查者来说，如果研究想要实现更多高尚的目的，那么伦理考虑经常就成了一个必须关注的必要负担；与他们不同，自然主义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主动地贯彻伦理标准，因为这些标准是研究要关注的本质，而且只可能对研究有促进作用。

常规研究把伦理规范视为保护研究对象（“对象”这个标签就告诉我们有关常规立场的很多信息）的安全卫士。首先，对象要免受身体和心理的伤害，包括尊严、自主和自尊的丧失。其次，必须保证对象的隐私和机密性。第三，要保证对象不受到不可原谅的欺骗。最后，在研究开始之前，对象必须以知情同意的方式参与研究。

自然主义调查者为其回答者提供这些安全保障，超出了盛行范式的想象范围，甚至对于后者来说，有些保障是不可能提供的。为了主动地保护回答者，在自然主义调查者那里，伤害一词有更广泛的含义。隐私和机密性的意义不只是限定在调查者传播的是什么，还关涉到必要的个人空间，调查者要声明在其调查中是不会涉足这一空间的。欺骗当然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原谅的，不仅因为它至少对被骗人是一种诬蔑，而且也因为它有反作用，阻碍建构在干系人之间、在调查者和回答者之间的开放、自由交易。知情同意，就如前面关于真实性的那一节讨论过的，在研究的开始是不能完全获得的，即便调查者想这么做。因为研究语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无论是调查者还是其他人都无法真正地知道究竟在同意什么。此外，很多传统的调查者认为，把他们计划的程序完全告知对象，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研究。与之相反，就如我们在前面的例子中看到的，自然主义调查者则需要每天准备新的交涉，扩大知情同意的基础，并欣然把这视为合作的新契机。 156

用于解决伦理问题的任何清单或方案，都没能很好地保护回答者免受伤害。自然主义调查者容易面临大量未曾预料到的伦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鼓励调查者永远要回头关注自然主义范式的前提，始终保持研究所要求

的敏感性和完整性。有几位调查者就描述过自然主义研究中遇到的类似情况。

弗莱雪(Fleisher, 1989)在他对监狱系统的研究中提到,由于狱管和囚犯身处高度敏感的环境中,如果他们的名字或绰号被公开,个人安全或在这种机构中的职位可能就会受到威胁。即使他们本人同意使用其名字,他也一般选用匿名或是省去潜在的可能导致伤害的信息。而且,他决定不隐藏自己在这个组织中的身份和目的。伪饰身份而以参与者的姿态进行观察,是不是一种道德行为,这个问题引起了大量的讨论。一些调查者(Denzin, 1970)认为,只要无损于对象的信誉或名声,保证了被调查者的完整性并使用他们的匿名(除非另有指示),那就是道德的。我们赞同林肯(Lincoln, 1990)的看法:这类欺骗会破坏为研究所做的努力,也会阻碍对个体持有的多重社会建构的寻求。

里兹(Lidz, 1991)提到一些特殊的问题,它们源于他以"观察性参与者"(observing participant)的身份研究犹太—基督教家庭中犹太配偶一方体验到的困难和满意。他写到:

> 既要作为一名成员,也要力图成为一位有条理的观察者,你会"长期"面对一个问题:要获得和维持知情同意,以把对群体的研究添加到个人参与的其他维度上。如果你认为要首先作为成员,其次才作为观察者,那么,作为主动观察者的身份就不如参与者的身份,因此容易出现问题。调查者为了从事观察,可能会尽力拓展个人角色,这样容易给群体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压力。调查者不仅要在群体允许实施研究前、还应该在研究中一再做好准备,与群体公开地讨论这些压力。如果失去了研究的合法性,调查者就应该准备好放弃研究,甚至退出群体。其他参与者可能担心,调查者对群体别有用心,或者是希望看穿或揭露其他人,消除这些人的担心,就成了一件尤其重要的事……虽然我的确希望了解所有个体成员的特殊关注和利益,但我还是向整个群体保证,
> 157 我在研究中既不会探索深层的心理模式,也不会揭露隐藏动机,结果,对我扮演的角色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然而,我发现还是要在少数场合重做保证,要再次解释它的社会学方法基础(P. 84)。

史密斯(Smith, 1990)对一个校区做了田野调查研究,这项研究受到NIE* 的资助。他公布了一件发生在调查过程中的事情。在整个计划中,他想尽办法在即将出版的成果中隐瞒调查地址。正当他要完成这项工作时,该校区卷入了一场大规模地反种族歧视的法律诉讼中。因为史密斯比其他任何人更了解这个校区的历史,所以该区的代理律师想让他出庭以专家身份作证。而这样的作证将会暴露这个地区和学校的名称,实际上也会违背隐瞒参与者

---

* "Newspaper In Education"的缩写,有译为"报纸参与教育"——译者注。

姓名的承诺。可是同时,拒绝法庭的传唤也有可能令他陷入罚款或监禁的境地。于是他和同部门的同事、大学的律师以及地区的行政官员讨论这个问题。对于该区的负责人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你不能违背你对肯斯顿全体职员、教师和行政官员的承诺。我们会解决法庭问题,不会把你卷进来(Smith, 1990, P. 271)。"

在有协定的调查中,可能会有很多因素发挥作用,比如限制自由的要素、对负面发现的压制、结果的有限分享、以及协定者对机密信息的"知情权"(Soltis, 1990)。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何使用调查结果?诚实的、批判性的调查可能失去公开的资助。压力群体*要求他们澄清观点。结果是,外部资金、协定和潜在的政治结果都会使调查——无论是质性的还是量化的——面临复杂的伦理问题。另一方面,为确保质性调查中的建构忠实性而使用的方法,有助于防止一些更大规模地滥用资金、经常是外部资金的行为(Lincoln, 1990)。此外,开展自然主义调查的毕业生必须谨慎,不应随意赞同一些他们认为更能取悦学位论文委员会成员的立场。

来自联邦的命令要求,凡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调查都要考虑伦理问题。虽然这些规定最初只限于联邦资助的调查中,但后来遍及所有在接受联邦资金的机构中进行的调查,无论该调查是否受到资助。正如墨菲和约翰森(Murphy & Johannsen, 1990)观察到的,制度审察委员会(IRB)所做的规定并 158
非旨在解决人种学或其他非传统调查的复杂问题,反倒可能被那些持反对意见或是不懂调查的人用来设置障碍。然而,由于伦理考虑在自然主义调查者制定计划、开展调查的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因此联邦政府的命令还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没有被大家看作是无来由的干涉。由于忠实地遵守原则,发展与回答者的真诚的伙伴关系、并在报告结果前与他们进行商议,自然主义调查者很容易就超出联邦的要求。调查者经常按照 IRB 的程序要求,向大学的同事传达自然主义研究所持的坚定的伦理立场以及该立场在回答重要问题方面的效果。

在调查者考察一个组织时,他(她)可能会了解到一些非法活动。约翰逊(Johnson, 1975, P. 165)说:"对我来说,向法定权力(legal authorities)报告这种行为是无法想象的"。他将他对调查信息的机密性的信念作为理由。他承认,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种观点。调查者有多重责任。他(她)或者放弃信用失去调查机会,或者保护机密性,让权力机构来处理一切。在学校这种环境中,可能出现贩卖毒品的问题;在福利组织内,可能出现基金的挪用;在政界,可能出现闯入办公室盗取机密的问题(例如水门事件)。对于这些涉及伦理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或唯一的答案。调查者必须确定,在考虑他

---

* pressure group,是指谋求对立法者、舆论等施加压力的群体——译者注。

(她)的价值、研究的公共价值,以及非法行为的复杂性、深度和影响时,什么是恰当的。

然而,当自然主义调查者按其范式所要求的,希望保护他们的回答者时,他们对伦理维度的看法要广泛和积极得多。回答者参与自然主义研究,不但不应该受到侮辱,而且也不应是一种中性的经验。自然主义调查者不是要获得权力,也不是要支持现存权力结构,而是要赋权给参与研究的所有人。调查者是公开求得、尊重每位个体的建构,并为它们进入共有建构的发展提供了通道。

对自然主义调查的参与也应该是具有教育意义的。获得分享、比较、批判和学习他人建构的机会,也是自然主义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每一位参与者
159 都比刚刚参与调查时掌握更多信息,变得更加理解他人。在发展共有建构的过程中,一些决定就做出了,个体和干系群体的责任也就随之出现了,并得到监督。

最后,通过发展共有的建构,参与自然主义研究能促进干系人和外部参考物之间的沟通。而这种沟通也弱化了为各自的立场进行辩护的需要,使参与者共同获得更高层次的理解和洞见。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前面的例子中就证明了自然主义研究对赋权、教育和沟通做了伦理考虑(Guba & Lincoln, 1989),可见于我们对公平标准的讨论中:那位笔者与一新开的城内中学的校长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松散协议,可以使用从学校干系人那里获得的资料,来了解这所中学以及里面所有人的运作情况,然后用了解到的信息来支持学校的运转。在他与教员、学生以及家长(既有群体,也有个人)接触的过程中,他运用他不断增长的理解(源于与许多干系人的建构的接触)来教育、沟通和赋权。作为不同干系人之间、以及与校园外部资源的联系纽带,他能够帮助他们拓展他们用于安排日常活动的那些建构。他还利用他从对其他群体所观察到的和获得的东西,来帮助他们拓展他们对每个人的建构的理解和洞见。而且,在他们分享他们对学校的梦想时,他用心聆听,而且与他们一起努力,找到实现那些梦想的资源。学期末的时候,校长给调查者的系主任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这些影响,并且提到第一年是成长、进步和赋权的一年——他大度地把这些效果归功于调查者在与学校干系人进行互动时的行为(与 R. R. Mastruzzi 间的个人交流,1973 年 5 月 10 日)。

比费罗的学位论文研究中(Bifano, 1987)同样也表明了类似的伦理维度。她密集的工作、与三所小学的校长及教员的互动,显然帮助她与几位校长建立了友好关系,既使他们从中受到了启发,也把他们联系了起来。三位校长都发现,她的研究既增进了他们对自己的职位和风格的理解,也提高了教员的看法
160 和预期。三位校长都发现,这项研究为他们在未来与其教员间的互动提供了

有效的候选方案。

关于质量的最后思考

有些人把调查用于指导其思想和行为，他们可以称为调查报告的消费者；对于他们来说，可信度是一个关注点。按照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1985）的说法，要建立一项研究对于消费者的可信度，可信性标准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自然主义研究存在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因此不可能永远无懈可击。调查者必须理解永远不可能消除的怀疑态度和质疑。一项自然主义研究的发现和解释是否可信，取决于很多因素：调查者要证明他做了长期涉入、要提供持久观察的证据、对来源和方法做了三角测定、开展了广泛的成员核对、没有走向自然和提前闭合。对于试图涉入自然主义调查的新手来说，他们应该注意到，尽管缺少起矫正作用的研究和信任水平，自然主义研究仍然是一种挑战，而且至少可以像常规研究那样建立可信度。表7.3总结了建立可信度的技术。

然而自然主义范式要求它的追随者要在方法上超越传统的调查者。因为传统范式认为研究是在外部做出的，因此只需要考虑外部听众的需要（外部的调查消费者、批评家和调查者本人）。相反，自然主义调查者已经闯入了被研究的社会语境，打开了、面对着该语境的干系人的建构，并从中学习，因此没有那么舒适。调查者在研究中与干系人建立了伙伴关系，这种关系要求所有参与者自由、坦诚地交流各自的建构，其回报就是提供成长和赋权的机会。这种伙伴关系的建立给研究带来了真实性。同样，它也使自然主义调查超越了研究伦理提供的常规保护。它不仅承诺不会剥夺回答者以前就有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还承诺给他们带来他们在研究前不具备的价值（以赋权、教育和沟通的形式）。 161

表7.3 建立可信度的技术总结

技术	结果	举例
长期涉入	建立信任	花在环境中的时间长度
	发展善意	避免提前闭合
	培养关系	
	获得广泛的资料	
	获得精确的资料	
持久观察	获得深度资料	有意的、主断的调查
	获得精确的资料	
	分类相关的和不相关的	
	识破欺瞒行为	

续表

技　术	结　果	举　例
三角测定	验证资料	使用不同的或多重的资料来源（访谈记录、录像带、照片及文献）、方法或调查者资料的缺乏
参考的合适性	提供一个"片段"	不突兀的方式，如小册子、目录、年鉴、照片、备忘录等
同侪报告	检验工作假说	和同侪们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讨论
	找到候选说明	
	探索自发设计和假说	
成员核对	检验范畴、解释或结论（建构）	比如在访谈结尾，与干系人继续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核对，评论书面文字或以草稿形式出现的最终报告
反省杂记	用文献证明调查者的决定	日记或周记
深描	为可转移性判断提供资料库	描述性的有关资料
	为读者提供替代性经验	
立意抽样	为自发设计和自发假说生产资料	最大变异抽样，以提供最广泛的相关信息
审计跟踪	允许审计员确定研究的可信度	访谈指导、记录、文献、记录卡、同侪报告记录、期刊等

（改自 Lincoln & Guba，1985）

162

进一步的研究

1. 阅读赖特弗特《好中学》一书对中学的六种描述中的一种。

- 在描述的基础上讨论她对感觉（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的依赖，并分别给出例子。
- 通过阅读，你预料会在她的审计跟踪中发现哪些合适的参考材料？举例来支持你的答案。
- 写一页反思报告，说明你在阅读赖特弗特的描述时有何感受。

2. 使用第 5 章（进一步的研究，问题 2 和问题 3）和第 6 章（进一步的研究，问题 1）的作业和论文，来构造一份审计跟踪。概述一下你实施的研究，把这份概要与记录卡、你在成员核对评论时所做的记录、你做的分析关联起来。在空地方附上一张照片。

3. 准备一份图表或表格，总结一下你将如何保证你从第 1 章就已计划开展的那项研究的可信度。

准备报告 8

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1985)把案例研究看作是报告自然主义研究结果的首选途径。在波格和盖尔(Borg & Gall,1983)看来,案例研究报告要求调查者对某个主题、群体或现象做详细的考察。在过去,这种方法常以不科学之名而被拒绝采用,这主要是因为人们认为它缺乏调查控制。随着质性调查方法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参与观察者角色的运用又复活了案例研究的途径。案例研究不应混同于叙述,叙述的复杂性远远低于个案研究,并且往往立足于某个单一的视角。

本章的焦点主要在于案例研究用于报告自然主义调查时的发展。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报告此类调查并非只有一种格式。在自然主义研究中,调查者的主要任务是向听众传达一种具有复杂联系和多重现实的环境,做到既能使听众、也要求他们与该环境进行认识上和感情上的互动。这种交流永远是一种艺术工作,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本章结尾将简要地讨论其中的一些形式。

案例研究的格式 164

在教育研究中,案例研究方法有很长的历史。事实上,弗洛伊德和皮亚杰的很多工作都使用了案例研究。塞兹(Sizer,1984)、赖特弗特(Lightfoot,1983)、彼得斯和沃特曼(Peters & Waterman,1982)、基德(Kidder,1990)、傅利曼(Freedman,1991)和弗莱雪(Fleisher,1989)在观察某些组织时就运用了案例研究方法。

运用案例研究模式的理论依据是,这样的报告形式能提高读者对研究焦点的理解水平(Lincoln & Guba,1985)。该格式对于自然主义调查者来说还有以下优点:

- 案例研究更适合于主位研究(对回答者的建构的重建),而常规报告似乎更适合于先验客位研究。
- 案例研究建立在读者的隐性知识之上,它提供整体的、生动的描述,能让读者替代性地体验有关语境。
- 案例研究比常规报告更多地考虑到调查者和回答者之间的互动。
- 案例研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探索内部融贯性(写实性和可信度)的机会。
- 案例研究提供"深描",这对于判断发送语境和接收语境之间的可转移性是必需的。
- 案例研究通过传达具体研究环境中的语境信息而提供了有根据的语境评估(Lincoln & Guba,1985,PP. 359-360)。

案例研究还可用于以下目的:

- 记录历史
- 教学(就像教育心理学中的案例研究)
- 为读者提供替代性地身临语境的体验
- 为一个组织制订未来的发展方向
- 促进变化
- 出于长远的考虑而修改主题

165 另外,案例研究写作可以有不同的分析层次,包括事实的、解释的、评估的。不同目的和分析层次要求调查者采取不同的行动,也产生出不同的结果。

要成功地完成案例研究,作者必须具备几种特质。首先,他(她)必须有中等水平以上的写作技巧。在很多方面,案例研究的写作要求比撰写学术报告或杂志文章的要求更高。写作案例研究报告很像写一部小说,要求作者具有相当强的创造性写作能力。第二,作者必须乐意接受回答者的反馈,以提出一个更好的案例。案例写作的首要目标是保证结果对于语境中的回答者来说是可信的。另一个目标是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最后,作者必须积极地参与到调查中。这类作者的知识在组织有意义的报告的过程很重要。

报告本身通常是以第三人称非正式地写作的,使用的是回答者的自然语言,并且应当避免使用专业术语。(不过,如果调查者自己处在被描述的环境中,有时候报告最好是采用第一人称。)就如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1985,P. 365)所说的,报告应当"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另外,为了使读者可以做出他(她)自己的解释,研究者在写作报告时必须避免在描述性段落中做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

平衡回答者和调查者的不同声音,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下面的内容摘自傅利曼的《小胜利》(Freedman, *Small Victories*, 1991),它描述了调查者处理这种

工作的方式：

> 八点前的几分钟，大厅几乎是沉寂的，唯有复印机的工作声、新鞋跟走过打蜡地板的喀哒声和重逢者的笑声。一位教师打开了英语办公室隔壁那间阴森森的储藏室的门，顿时飘出来浓郁的、有点发霉的、熟悉的书籍味，洋溢着珍珠、哈姆雷特和哈克贝利·弗恩（*The Pearl*，*Hamlet*，*Huckleberry Finn*）的气氛。尽管334房的打字机是坏的，尽管431房缺少椅子，尽管没有两个钟表的报时是一致的；但是，苏域柏高中（Seward Park）的所有一切几乎都是美好的。只有到七月，一切看起来才又是那么安静和有序。
>
> 接着那一刻到来了。门转开了，学生们突然涌进了苏域柏高中，从楼梯上、角落里传来他们到来的喧闹声。在第一张脸出现在三楼之前，杰西卡可以听到声浪席卷而来，虽不清晰却极度厚重。这让她想到了保龄球的球道和木瓶倒地时沉闷的木质轰隆声。新来者可能会把这种喧闹误看作一种无政府状态，但是，对于经验丰富的杰西卡来说，这喧闹却充满了潜能和希望，她欣然地迎接这一切（P. 23）。 166

案例研究包括几个部分。第一，对难题或者对所研究实体的解释。这个部分包括难题陈述、研究意义、研究问题、操作定义、假定和局限性。第二，对文献的回顾，这有助于调查者和读者用不同的方式来认识此项研究。第三部分说明自然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并包括群体、仪具、程序、资料分析、可信度和审计跟踪方面的信息。

案例研究的第四部分是描述性的部分，它类似于赖特弗特的《好中学》（Lightfoot，1983）中的一部分。这一至关重要的部分应包括：对于在环境中感官所察觉到的现象的描述，对环境中所观察到的事务和程序的描述，对所研究的重要问题、趋势、模式的讨论，对所探讨的工作假说的讨论和分析，对回答者的建构性现实的传达。

案例研究的下一部分包括对研究结果的讨论，还可能包括局限性、结论、寓意和深入研究的意见。附录中列出调查者的证件、访谈问题、调查形式、时间线、计算机软件包等。

案例研究还应有一个包括审计跟踪项目的姊妹篇，比如最初的访谈笔记、实际调查反应、成员核对形式、同侪报告笔记、反省杂记、照片、录音带和录像带。活页笔记本对于记录很多项目都非常好用。

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1989）制订了一份好报告应满足的四条标准：

- 公理标准，指的是研究与构成其指导范式基础的公理假定（基本的信念体系）必须产生共鸣。例如，它必须反映多重的现实而不是单一的现实。
- 修辞标准，指那些与形式和结构有关的东西，包括（根据 Zeller，1987）统

一性、整体布局、简单性或明晰性和技巧。技巧能促进案例研究的力与美、创造性、开放性、独立性、责任、勇气和平等主义。

- 行为标准，指案例研究要有能力激发和推动读者的行为。这些标准包
167 括公平、教育性、可申诉性(actionability)或赋权。
- 应用或可转移性标准，指案例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读者引出适用于他(她)自己的语境或处境的推论。这些标准包括深描和替代性经验的提供、暗喻的力量、个人的重构能力(P. 224)。

撰写报告

撰写报告的第一步是要认真地为资料材料编写索引，以便在写作过程中需要时，能很容易地找到它们。整理所有不同资料来源的一种方法是，从访谈、调查、录音带、录像带和人造物(年鉴、报纸等)中提取信息，并像第 5 章中描述的那样，把这些编组的信息记在记录卡上(或记在作用相同的纸张或计算机光盘上)。这些工作一旦完成，用于案例研究的实际写作中的就只有记录卡了。以第 6 章所描述的过程为基础，把记录卡做范畴或主题分类，从中探索和提出工作假说。案例研究要反映这些主题和假说。

接下来的任务是以调查者构想的故事脉络为基础，为案例研究勾画出临时大纲。其中可能包括与语境有关的内容：组织的历史和地址的描述、关键成员、事务和相互关系。案例研究大纲应围绕着工作假说来组织。这个大纲必须非常详细，并尽量多收纳资料。临时大纲一旦完成，就要随着案例研究的进行而经历不断的修订。

第三个任务是交叉参考索引材料(记录卡)和临时大纲。作者根据索引从写作材料中找出材料的位置。有位笔者发现，每张卡片都极易阅读且易于确定它在大纲中的位置。调查者接着可以在每张卡片上标出它在大纲中的位置(如 IIB1a 或者 IIID2c 等)。如果一个条目在大纲中不止一次出现，那么最好是制作这张卡片的副本。然后，为方便写作，将记录卡按它们在大纲中的次序叠放。这个过程能极大地方便最后的核对，确保每个条目得到三角测定(是否有多个卡片记录该条目)。它也能方便查找大纲之外的大量资料。此
168 外，该过程也为第 7 章中描述的审计跟踪奠定了基础。

作者现在可以准备开始实际的写作过程了。这个过程应该认真地遵循大纲，因为卡片的次序现在和大纲是一致的，从几种资料来源汇集思绪相对容易些。运用该过程，可以摘录一些描述，而且易于找到需要直接引用的部分。案例研究如果从头到尾都使用小标题、介绍性及概括性的部分，过渡清楚并遵循逻辑的顺序，都能为读者提供方便。当写作困难的章节时，调查者应该考虑让

环境中的回答者来帮助写作。

赖特弗特(Lightfoot,1983)通过认真回顾她的日常记录和摘要、在笔记上作记录、考虑资料的候选解释,来准备她的案例研究写作。任何的不合理都会让她更深入地检查她的资料。当资料不断引出类似的观点时,研究的中心主题就开始显现出来。当每个学校的故事轮廓都变得清晰时,赖特弗特用详细的证据、精妙的描述和多重的视角使之变得更加生动。完成这个任务后,她把重点转向了故事的审美形式,而且小心地避免这种形式造成任何资料的歪曲。安全起见,她经常回头参照原始记录,而且做了大量的直接引用。

赖特弗特(Lightfoot,1983,第 7 页)称她的案例研究为"描摹",因为案例研究就像摹本一样,必须抓住对象的本质和各种维度。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这种报告模式必须把科学和艺术结合在一起。案例研究必须把握有关组织及其面貌、特点、价值观及例行仪式。它也必须把握个人和机构之间的联系——参与者如何创造组织的文化,他们又如何被这些文化所塑造。正如赖特弗特所说的,她是"全面地"讲述故事。

当作者完成案例研究的各部分时,让各种不同干系群体的成员对其描述做出反应是很重要的。在完成一个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有位笔者把下面的笔记粘贴到案例研究的每个部分上,并把它发给了有关组织的几个成员:

> 为确保研究语境的精确性,我需要您的帮助来审阅随函寄去的描述和分析。请直接写在这份副本上,并就材料的精确性提出任何评论或担忧。而且,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谢谢您的帮助(Skipper,1989)! 169

其中有一些评论是:"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这使此段落有点反叛的意味——这是你想要表达的意思吗?";"你所说的是正确的,但故事还没讲完":"好极了! 我能读余下的部分吗?""你认为这与所有的学生有关,但事实上它应该仅仅与高年级的学生有关。"

作者检查这些评论,如果评论恰当的话就做些相应的修改。即使不可能接受所有的建议,但当对研究结果进行商讨时,它们也必须给予严肃的对待。当新稿完成时,它又要接受批评。在这个阶段,让评论者只对改动的部分进行评论就可以节省时间。

正式和非正式的成员核对贯穿于整个项目的始终,草稿完成后,就要和研究地址中的回答者一起检验研究报告整体的可信性。应该从组织的各种干系群体中挑选代表充当评论者(如教师、行政官员、经理人、职员、学生、囚犯、父母、消费者等)。其中有些人在早期调查阶段就已经牵涉到了。其他的人则是首次出现在调查中。评论者应代表不同的视角,并在调查环境中呆过足够的时间,能够给出本地人的看法。评论者至少应在开评论会的两周前收到完整的、修订过的案例研究报告。任何特别的、有关信息机密性的细则都应与评论者提供反馈的方式(通过书面文字、电话、会议)的说明一起提供。举行会

议是为了让评论小组的成员提供有关研究的三个层次的反馈意见(Lincoln & Guba,1985):案例研究整体可信性的评判、主要担忧和问题的陈述、以及事实性或解释性错误的陈述。

在审查反馈信息时,有悖事实的错误必须纠正。就解释的错误而言,调查者不能断定检查者是正确的而调查者是错误的。反馈有可能是表象或错觉的结果。每个有争议的问题都应给予认真严肃地考虑,关于如何修改,调查者必须做出决定。在一位笔者所写的案例研究中,调查者让一位校长在报告后附加一篇补遗陈述其观点和反应。

170

评估案例研究报告

自然主义研究的评估要以第7章中阐明的质量标准为基础。一项研究必须受到可信度、真实性和对待研究语境中干系人的伦理态度等方面的评判。如前所述,这些质量标准(可信度标准)中有部分是方法论的,对应于常规研究中用到的标准。然而,除了这些标准之外,自然主义调查者还可以检查调查过程,确定它是否忠实于自然主义范式的宗旨。要做到这一点,调查者要对研究进行评估,确定它距第6章中描述的解释—辨证过程多远。回答者持续提供直接的信息,不断从各种角度提出质疑,能降低不可信结果的可能性。考虑到程序和作品的公共可检查性,保密性的缺乏可防止评估者或其他人的成见对报告造成影响。

在决定自然主义研究的质量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中真实性标准的运用和伦理规范得到积极应用的证据。这些标准源于自然主义范式本身和它赋予不同建构间自由、知情互动的价值,这些在传统研究的要求中没有任何对应的部分。案例研究报告必须证明已做到:

- 征求并尊重不同干系人的建构
- 持续地重新商讨干系人的知情同意
- 发展干系人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建构的理解
- 把这些一致同意的建构结合到具体的计划中,并且
- 赋权干系人使之成为其社会语境的行动起点

此外,为了通过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传统调查方法论的预想来保护干系人免受伤害,研究报告也应证明干系人已经被赋权、受到教育、并与社会语境中其他干系人的建构关联了起来,所有参与者的理解力和洞察力被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外部审计

最后的草稿一旦完成,就该进行外部审计了。第一个任务是确定审计员,他(她)要具备丰富的自然主义研究的知识。 171

为了推动审计,调查者应向审计员就计划的目标提供整体概观,以及就调查过程中建立和遵循的审计编排法提供一份介绍。在调查者和审计员就范围、程序、后勤和报告格式达成一致意见后,审计员应准备和执行一份工作计划来确定研究及其报告的可信度。施万特和霍尔本(Schwandt & Halpern, 1988)概括了这个工作计划包含的元素:

1. 评估可确认性

a. 评估发现是否建立在资料的基础上。

b. 评估推论是否合乎逻辑。

c. 评估范畴结构的效用。

d. 评估求值程序(evaluator)是否能解释差异资料(discrepant data)。

2. 评估可靠性。

a. 评估研究决议和方法论转换的适当性。

b. 评估调查人成见的程度和影响范围。

3. 评述可信性

a. 评述可信性策略的设计和执行。

b. 评述可信性策略对方法论选择、资料来源和发现的影响。

紧随审计完成之后的工作是准备一封证明信,信中包括审计的宗旨和目标、对已采用的过程的讨论、关于可信度的发现的总结。建立审计员审计资格的个人简历应连同审计员的签名和审计日期一起列出。

我们建议从事自然主义研究的读者参看施万特和霍尔本(Schwandt & Halpern, 1988)的著作,其中有对审计要素和要求的完整讨论。

发送报告

被发送的报告应是最终的、装订好的定本。在向干系群体的关键成员提供报告时,没有必要配备人造物、杂记或审计跟踪条目,因为这些内容已经被外部审计员和评论小组评论过了。决定谁第一个来评论案例研究是很重要 172
的。在赖特弗特的描摹(Lightfoot, 1983)出版前,校长和负责人就已经阅读过

了。在史克普的研究中(Skipper,1989),校长和主管先于教师、学生和学校图书馆拿到了副本。赖特弗特强调,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自己期望从这些首批阅读者那里得到什么。她在研究中告诉校长,她渴望听到他们的回应,她希望他们纠正任何事实性的错误。一位校长曾把她的这种请求称为"对话"式的邀请。虽然他没有断言她的描摹是不真实或不公平的,但是他担心它太犀利了,展示了教师们鲜为人见的一面。他想让她在几个段落中进行一些调整。赖特弗特意识到她给校长的是凌乱的信息,她没有表达清楚她是想要邀请他提供合作,还是仅仅想让他对已完成的文本进行评论。

在史克普的研究中(Skipper,1989),有部分研究引起了一阵争议,它说学校几乎没有新鲜血液而且没有内部批评意见。一位教师就这种描摹的准确性评论说:"正是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读起来不那么舒服!"但调查者绝不要对这种看似批评的陈述过度敏感。

关于这种调查的挑战,赖特弗特(Lightfoot,1983,P. 337-378)提供了她的一些教训:

- 调查者必须意识到工作的情感维度,因为它既包含观点也包含情绪。
- 调查者应仔细关注调查的后果;调查出口同调查入口一样重要。
- 人们在阅读研究报告时似乎对暴露有一个预期的反应阶段,从"恐惧"到否认再到接受。
- 从事自然主义调查的社会科学家应该认识到其工作对于个体和机构的潜在影响。

一些候选格式

本章一开始就提出,自然主义的研究报告必然是一种艺术工作,它所采取的格式应最能推动被描述语境和目标听众之间的认识和情感互动。所有用词
173 语(如同我们在报告研究时最理所应当做的那样)把人、环境与某个听众连接起来的艺术家都认识到,至少是直觉地意识到,正是语言这种用来分类、简化和分层的工具的本质对交流施加了某些导致歪曲的限制。也正是作家、剧作家或诗人的艺术克服了这些限制。例如,考虑一下,从认知和情感上来说,哪种方式最好地传达了美国对越南冲突的干预?①一份人员和伤亡数量的统计报告;②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或者③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对此问题的回答依人而定,但是所有人应该会认同,列举出来的每种方式都有各自不同的影响。自然主义研究报告的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仔细考虑其目标听众以及对他们的影响。

我们并不是完全清楚这种推理思路对于自然主义研究报告有何寓意;但

起码它暗示报告格式必须加以谨慎地选择和构造。鲁兹和伊拉科勒(Lutz & Iannaccone,1969)提出了一种候选格式。它把真正的案例研究从整体上变得接近毕业论文研究中常见的格式。这么一来,它可以为其毕业论文委员会对自然主义研究抱怀疑态度的博士生指引方向。另一种可能的格式是哈恩斯利、卢普夸斯基和麦克纳马拉(Haensly,Lupkowski & McNamara,1987)描述的图表论文(chart essay)。这种格式服务的对象是繁忙的政策制定者和从业人员,它结合了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把听众的注意力引向研究的有关方面。

民族志学者曾经以各种方式使用案例研究,把他们的建构性现实传达给他们的目标听众。格林豪斯(Greenhouse,1992)利用她从偏远的小社区"霍普韦尔"(Hopewell)收集和分析过的资料,来例证她那全局性的、国家性的发现。类似地,格里菲思、沃达斯—皮兹尼和约翰逊(Griffith, Valdäs-Pizzini & Johnson,1992)曾使用六个不同个体的案例,来阐明他们对于波多黎各渔业的无产阶级化的解释的不同方面。作为他从1985年开始的对家庭学校做更大规模的民族志研究的一部分,诺尔斯(Knowles,1991)对12所家庭学校的家庭做了深入研究,以获得对父母开展这些学校的根本原因的理解。与以前研究的典型调查策略形成对比的是,诺尔斯用描摹四个当地家庭的方式报告了他的发现,这些家庭提供了含逸事趣闻的证据,能用来例证他鉴定出的根本原因。纳什(Nash,1992)解释性地分析了玻利维亚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条件的抵抗,她用该分析说明了有必要用传统的参与者观察方法补充文本解释,有必要引出报道人自己的解释——这实际上是认识到有必要对人类意识的复杂性进行处理。这些研究和其他的研究很好地示例了案例研究的 174
灵活性:其格式和能力能够服务于不同听众的不同目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极力推荐读者定期阅读诸如《美国民族志学者》、《人类组织》、《当代民族志期刊》、《质性社会学》(*American Ethnologist*, *Human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Qualitative Sociology*)等期刊中的研究报告。通过对这类研究的定期回顾,有抱负的自然主义调查者可以大量了解到用于向不同听众传达报告的不同格式的功效。

莱勒(Zeller,1987)从报告案例的适当性的角度分析了几种候选的写作类型。她推荐考虑"非虚构"的小说、"新民族志",尤其是"新式新闻报道",把它们作为自然主义研究的报告模式。非虚构小说以艾吉的《现在赞扬名人吧》(Agee & Evans,*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1988)为代表,书中的描写把读者栩栩如生地带入大萧条时期南方的三个白人租赁家庭的生活中。新民族志也可使读者仿佛亲临人们的生活,打破了强调客观性的旧有的民族志标准。报告中并不回避隐私,小说作者所使用的方法可以用来传达人类环境的本质。以乌尔夫的作品为代表的新式新闻报道,强调的不是几条具体信息,而是强调"场",正是在这"场"中,关系才得以定义,细节也才有意义。正如莱勒

提到的，这与自然主义调查者观察世界及尝试去分析世界的方式非常接近。在虚构与理解的关系曲线上，莱勒认为这三种形式处在最高点，最少虚构的形式（技术报告）和最多虚构的形式（寓言、讽喻和诗歌）则处在连续统的两个末端而最难以理解。

当自然主义研究越来越普遍时，我们希望其他的报告模式也能出现。虽然我们完全认同莱勒的目标，即：建立新的报告格式以更好地传达自然主义研究的本质；但是我们不同意她的这样一种看法：连续统的虚构端无法传达本质。我们相信有几个作者（Brooks，1947；Wimsatt，1954）已经很好地表明，好的诗歌有能力用词语克服词语抽象化、固定化的局限性，并因此使建构性现实
175 的人际交流成为可能，而这是词语非此所不能实现的。例如，我们对一些诗人的表达方式印象深刻，如沃兹沃斯、济慈、埃利奥特，他们都曾经用词语克服了词语的局限性，并有力地表达了散文中不可能表达出的微妙理解和深刻意义。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如何维持那些提供可信度（例如审计跟踪）的策略，但是也许诗歌真的能用于报告自然主义研究。不过，我们鼓励从事自然主义研究的调查者去想象和试验那些最能传达研究语境本质的新格式。

最后的一些想法

根据赖特弗特（Lightfoot，1983，P. 378），案例研究的“织纹”形式（textured form）可以促进机构内部的变化。外部的“宽视角”可能与局内人的各种视角形成尖锐的对比；但是，这种不一致为考察组织的角色和价值观提供了机会。

在史克普的研究中（Skipper，1989），学校校长评论说，调查者在短时期内了解到他需要花六年时间才能得到的关于学校的信息。有时候，调查者提供给校长尚未系统考虑过的信息。尽管设计需逐步展开，实地考察有困难，资料可靠性不一，资料过多，但自然主义研究过程仍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框架内提供了最精确、最深入的信息。该信息可用于发现问题、促进变化、制订学校或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

由美国联邦教育部教育研究和提高办公室资助、蒂尔和彼得森（Deal & Peterson，*The Principal's Role in Shaping School Culture*，1990）所著的《校长在塑造学校文化中的作用》一书，用了五个案例研究来分析有效的领导策略。这本书的目标是鼓励校长们通过塑造学校文化的方式来实现学校的变革。案例研究生动地介绍了五位校长得以把“学术兴校”注入学校生活中所采用的方法。

在如人类学这样的领域，其注意力正在转向用自然主义研究程序来研究诸如家庭暴力、早孕、吸毒、内战和森林枯竭之类的社会问题。人类学家开始

寻求新的方式应用理论和发现,来建设更好的工作场所、改善社会环境及推销新的商品。一位人类学家(Fleisher,1989)不仅完成了对一所最高戒备监狱中的生活的自然主义研究,而且用他了解到的信息写了几本训练手册,帮助看守警卫理解和应对他们遇到的问题。《人类学前沿》(*Frontiers of Anthropology*, *Sage Publications*)系列中有对这个领域的大量工作的报告。 176

显然,在诸如教育、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这样的一些领域,自然主义研究程序提供了一种方式,可用来探索和理解语境——它们的成功、它们的问题和它们的困难。

进一步的研究

1. 为你从第1章就一直在计划的自然主义研究准备报告格式,初步描述一下这种格式并列出大纲,解释你为什么选择这种格式。

2. 鉴别一项明确地遵循自然主义范式的研究(例如,Allen,1990; Bifano,1988; Harris,1991; Skipper,1989; Zeller,1987)。准备一份书面评论,评论有关研究是否充分地引起了听众的注意,报告风格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了研究目的,它是否充分地满足了可信度和真实性的标准。

3. 与一个两或三人团队共同开展一项自然主义研究。被研究的组织可以是大型购物中心、学校、大学里的学院、医院、教育学院里的系、商业等。以小组的身份,向合适的听众提供:人造物、原始资料、杂记、一份审计跟踪、一份该团体文化的概要和针对从该自然主义研究程序中的所得而写作的一篇反思论文(选做条目)。

后记

本书开端便提出要带读者进行一次调查冒险，我们希望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也希望读者已经培养起一种想要探究和分析社会语境的真切愿望。如果这本书是成功的，读者现在就会有更敏锐的感觉来领会大量的语境资料、有更宽广的理解力来构想关于这些资料的工作假说、有更训练有素的思维能力来对这些资料做持续的分析。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已经激发读者继续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在社会环境中开展自然主义调查。

当然，我们认识到自然主义研究并不适合于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为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着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实施成功的自然主义研究。我们希望对于这些个体来说，我们至少详细阐明了做出优秀的自然主义调查的要求，并使他们能够用理解和批评的眼光来阅读这类报告。如果这些个体认识到自然主义研究的力量，并且变成热心的读者，我们便心满意足了。

即使对于一个愿意做自然主义调查的人来说，调查过程也可能令人厌倦和沮丧。克拉克（Clark，1992）就社区中学全体教师对成年学生的态度做了一项研究，下面是她在研究后的一些思考：

> 这过程漫长而又费时，而且常常导致一场“徒劳的忙碌”。调查者发现，仅仅整理一次访谈就要花掉 8 个小时的时间。共有 30 次访谈，每次访谈都要整理几次，有时让人感觉是一项无法完成的工作。对于是否能够完成项目的这一个部分，调查者极易失去信心。随着整理的进行，调查者经常感觉到有多种途径需要加以探索，因此又得往图书馆多跑一趟。
>
> 任何考虑担起这一工作的人都必须能够同时从事这个项目里的看似不相关的几个环节。调查者发现，回顾文献、搜寻目标陈述的资料来源、整理访谈、文献分析及分析访谈整理，所有这些工作都要同时进行。每个环节又要利用其他的环节，以至于有必要时不时地放下一切，松弛片刻，以免调查者被其复杂性所吓倒。
>
> 实施这样的一种项目，条理性是极其重要的。收集的大量资料占据大量的物理空间，而且因为过一段时间这些资料会被消化吸收，如果没有一个严密的文档管理系统，一些重要的资料可能会丢失。为了始终记住最终的目的和

> 已覆盖的范围,定期地翻阅这些文档会有收获。这类调查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调查者闪念间突然洞见某些资料的意义;不幸的是,这些灵感往往反复地一闪而逝。在一些时尚杂志里写下批注和评论非常重要。这位调查者有一批有趣的收藏品,包括用过的信封、餐巾纸、信用卡收据以及各种各样的便条,上面记录着极端重要的信息;一种更好的方法是随身携带小笔记本或录音机。
>
> 调查者无法想象在没有计算机的帮助下如何完成这个项目。她可以把诸如分类这样无需动脑的工作丢给计算机程序去做,因而能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另外,计算机不会因为在凌晨两点工作而漏掉一个单词或短语(PP. 177-179)。

对潜在的调查者也好,调查使用者也好,我们将给出类似的建议以加快成长:不断地阅读和分析优秀的自然主义研究。在本书中,我们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少数几例优秀的自然主义研究,其他的还有很多,我们劝告读者找到并阅读它们。我们也建议读者定期阅读几种强调质性调查的期刊。对优秀研究进行定期的批判性分析,无论对于自然主义研究的调查者还是使用者来说,都是一种提高技能的好方法。定期比较和评价候选的调查设计、资料收集技巧及 179
分析策略,既有娱乐性又增强了调查技能。

潜在的自然主义调查者还应该对社会语境的意义有敏锐的感受性。这种敏感性并不是短期内获得的,它通常需要调查者终生涉足重大的社会问题。不过,我们认为,对自然主义调查有些热心的个体已经培养出对社会问题的一些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无论处在何种层次,都可以通过定期地关注一般性的事件或某一特殊领域内的事件(例如,订阅《教育周刊》)和通过定期阅读或收听社会评论而得到培养。

最重要的是,我们建议潜在的自然主义调查者趁早开展一部分有意义的调查。第 8 章的“进一步的研究”最后一个条目建议找到一个致力于开展一项自然主义研究的调查小组。读者现在也可以实施他(她)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设计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可能是为学位论文研究或其他目的而设计的。但是,不管该研究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管它计划的是小组研究还是个人研究,我们劝告调查者现在就开始付诸实施——趁热情正高、感觉敏锐,正合优秀研究的要求的时候。一旦进入研究,我们相信,调查者不会中途就放弃对社会语境的涉入。然而,一旦自然的人际好奇心(interpersonal curiosity)失去吸引力,我们就借用阿格西的话来鼓励犹豫中的调查者:“盯着你的鱼看!”如果新发现可以激励那位学生对于一个僵死、潮湿而发臭的低等脊椎动物产生新鲜兴趣的话,我们确信,对于动态的社会关系的新洞见,能够激发调查者完成一项有意义的自然主义研究。



Agee, J. , &Evans, W. (1988). *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Allen, S. D. (1990). *Principal-teacher interactions in urban high schools: Two case studi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X.

Bauer, R. L. (1992). Changing representations of place, community, and character in the Spanish Sierra del Caurel. *American Ethnologist*, *19*(3), 571-589.

Bifano, S. L. (1987). *Elementary principals: Espoused theor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X.

Bifano, S. L. , &Erlandson, D. A. (1989). *The use of photographs in creating cultural profiles.*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Boelen, W. A. (1992). Street corner society: Cornerville revisite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1), 11-51.

Bogdan, R. C. (1972).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Center on Human Policy.

Bogdan, R. C. , &Biklen, S. K. (1982).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ors.* Boston: Allyn &Bacon.

Bogdan, R. C. , &Taylor, S. J. (1975).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New York: John Wiley.

Borg, W. R. , & Gall, M. D. (1983). *Educational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Longman.

Brooks, C. (1947). *The well wrought urn: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etry.*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Bruyn, S. (1966). *The human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 The methodology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Bryson, B. (1990). *Mother tongue: English and how it got that wa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Chace, P. G. (1992). Interpretive restraint and ritual tradition: Marysville's Festival of Bok Kai.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2), 226-254.

Clark, S. H. (1992). *Community college faculty attitudes about adult students: Implications for faculty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X.

Deal, T. E., & Peterson, K. (1990). *The principal's role in shaping school culture.*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Denzin, N. K. (1970).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Hawthorne, NY: Aldine.

Denzin, N. K. (1987). *The alcoholic self.*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 K. (1992). Whose Cornerville is it, anywa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1), 120-132.

Dexter, L. A. (1970). *Elite and specialized interviewing.*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Dingwall, R., Eekelaar, J., & Murray, T. (1983).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State intervention and family life.* Padstow, UK: T. J. Press.

Durst, P. L., Wedemeyer, N. V., & Zurcher, L. A. (1985). Parenting partnerships after divorce: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Social Work*, *30*(5), 423-428.

Eisner, E. W. (1985). *The educational imagination: On the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Eisner, E. W. (1992). Are all causal claims positivistic? A reply to Francis Schrag.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1*(5), 8-9.

Erickson, F (1992). Why the clinical trial doesn't work as a metaphor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 response to Schrag.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1*(5), 9-11.

Erlandson, D. A. (1979).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administrative preparation. *Planning and Changing*, *10*(3), 150-156.

Erlandson, D. A. (1992). The power of context. *Journal of School Leadership*, *2*(1), 66-74.

Fetterman, D. M. (1989).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Series, Vol. 17. Newbury Park, CA: Sage.

Fleisher, M. L. (1989). *Warehousing viol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Freedman, S. G. (1991). *Small victori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Gage, N. L. (1989). The paradigm wars and their aftermath: A "Historical" sketch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since 1989.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8*(7), 4-10.

Gallaher, A. (1961). *Plainville fifteen years later.* New York: Columbia Unversity Press.

Gans, H. J. (1967). *The Levittowners: Ways of life and politics in a new suburban community.* New York: Pantheon.

Gans, H. J. (1982).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New York: Free Press.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Glaser, B. G. (1965). 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of qualitative anlaysis. *Social Problems*, *12*, 436-445.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Hawthorne, NY: Aldine.

Goodall, J. (1990). *Through a window.*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reenhouse, C. J. (1992). Signs of quality: Individualism and hierarchy in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Ethnologist*, *19*(2), 233-254.

Griffith, D., Valdäs-Pizzini, M., & Johnson, J. (1992). Injury and therapy: Proletarianization in Puerto Rico's fisheries. *American Ethnologist*, *19*(1), 53-74.

Guba, E. G. (1978). *Toward a methodology of naturalistic inquiry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Monograph 8. Los Angeles: UCL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valuation.

Guba, E. G. (1981). Criteria for assessing the trustworthiness of naturalistic inquiries.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Journal*, *29*, 75-92.

Guba, E. G. (Ed.). (1990). *The paradigm dialog.* Newbury Park, CA: Sage.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1). *Effective evalu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9). *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Habenstein, R. W. (Ed.). (1970). *Pathways to data: Field methods for studying ongo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Hawthorne, NY: Aldine.

Haensly, P. A., Lupkowski, A. E., & McNamara, J. F. (1987). The chart essay: A strategy for communicating research findings to policy 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9*, 63-75.

Harris, E. L. (1991). *Identifying integrated values education approaches in secondary school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X.

Haworth, G. O. (1984). Social work research, practice, and paradigms. *Social Service Review*, *58*(3), 349-357

Hayakawa, S. I. (1978). *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 Orlando, FL: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Heineman, M. B. (1981). The obsolete scientific imperative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Social Service Review*, *55*(3), 371-397.

Helmer, J. (1991). The horse in backstretch culture. *Qualitative Sociology*, *14*(2), 175-195.

Hodson, R. (1991). The active worker: Compliance and autonomy at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1), 47-48.

Hofstadter, D. R. (1979). *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New York: Vintage.

Hollingshead, A. (1975). *Elmtown's youth and Elmtown revisited.* New York: John Wiley.

Jackson, T. F (1991). *Development of a training and support program for older custodial and landscape workers.* Unpublished record of study proposal,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X.

Jackson, T. F. (1992, April 23). Interview.

Jacobs, J. (1991). New ethnographies: Warehousing viol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1), 114-119.

Jarvie, I. C. (1982). The problem of ethical integrity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Burgess, R. G. (Ed.), *Field research: A sourcebook and field manual* (pp. 68-72). Boston: Allyn & Bacon.

Johnson, J. M. (1975). *Doing field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Keller, H. (1954). *The story of m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Kerlinger, F. N. (1973).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Kidder, T. (1990). *Among school children.* New York: Aron.

Klint, K. A. (1988). *An analysis of the positivistic and naturalistic paradigms for inquiry: Implications for the field of sport psycholog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OR.

Knowles, J. G. (1991). Parents' rationales for operating home school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2), 203-230.

Korzybski, A. (1958). *Science and sanity: An introduction to non-Aristotelian systems and general semantics.* Lakeville, CT: International Non-Aristotelian Library.

Krathwohl, D. R. (1985).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wrence, E. (1982). *Rode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dz, V. (1991). The sense of identity in Jewish-Christian families. *Qualitative Sociology*, *14*(1), 77-102.

Lightfoot, S. L. (1983). *The good high school.* New York: Basic Books.

Likert, R. (1967). *The human organization: Its management and value.* New York: McGraw-Hill.

Lincoln, Y. S. (1989). Trouble in the land: The paradigm revolution in the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J. C. Smart (Ed.),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5, pp. 57-133). New York: Agathon.

Lincoln, Y. S. (1990). Toward a categorical imperative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

Eisner & A. Peshkin (Eds.), *Qualitative inquiry in education: The continuing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Lortie, D. C. (1975). *Schoolteacher: A sociological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oseke, D. R. (1992). *The battered woman and shelt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ife abus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utz, F. W., & Iannaccone, L. (1969). *Understanding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field study approach.* Columbus, OH: Charles E. Merrill.

Maril, R. L. (1983). *Texas shrimpers: Community, capitalism, and the sea.*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Marshall, C., & Rossman, G. B. (1989).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Martens, R. (1987). Science, knowledge, and sport psychology. *The Sport Psychologist, 1*(1), 29-55.

McCall, G. J., & Simmons, J. L. (Eds.). (1989). *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McCarthy, M. J. (1991). *Mastering the information age.* Los Angeles: J. P. Tarcher.

McCrimmon, J. M. (1968). *From source to state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McNamara, J. E, Fetsco, T. G., & Barona, A. (1986). Data-based debates: A strategy for constructing classification systems to report questionnaire data.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0*(3), 336-359.

Mead, G.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rriam, S. B. (1988). *Case study research in education: A qualitative approa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Miles, M. B., & Huberman, M. (198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sourcebook of new methods.* Beverly Hills, CA: Sage.

Mobley, C. C. (1991). *Interaction between diabetes educators and clients of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A naturalistic study.*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proposal,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X.

Mobley, C. C. (1992, April 28). Interview.

Murphy, M. D., & Johannsen, A. (1990). Ethical obligations and federal regulations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and anthropological education. *Human Organization, 49*(2), 127-134.

Nash, J. (1992). Interpreting social movements: Bolivian resistance to economic conditions impo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merican Ethnologist, 19*(2), 275-293.

Patton, M. Q. (198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Newbury Park, CA: Sage.

Pennartz, P. J. (1989). Semiotic theory and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A proposal for a new approach and a new method. *Symbolic Interaction*, *12*(1), 231-249.

Peters, T. J., & Waterman, R. H., Jr. (1982). *In seach of excellence.* New York: Warner.

Piaget, J. (1950). *The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opkewitz, T. S. (1984). *Paradigm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New York: Falmer.

Popkewitz, T. S. (1992). Cartesian anxiety, linguistic communism, and reading texts.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1*(5), 11-15.

Richardson, L. (1992). Trash on the corner: Ethics and technograph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1), 103-119.

Schrag, F. (1992). In defense of positivist research paradigms.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1*(5), 5-8.

Schwandt, T. A., & Halpern, E. S. (1988). *Linking auditing and metaevalu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Schwartz, P., & Ogilvy, J. (1979). *The emergent paradigm: Changing patterns of thought and belief.* Analytical Report 7, Values and Lifestyles Program. Menlo Park, CA: SRI International.

Seidel, J. V., Kjolseth, R., & Seymour, E. (1988). *The Ethnograph: A user's guide.* Littleton, CO: Quolis Research Associates.

Seymour, D. T. (1988). *Marketing research: Qualitative methods for the marketing professional.* Chicago: Probus.

Shapira, R., & Navon, D. (1991). Alone together: Public and private dimensions of a Tel-Aviv cafe. *Qualitative Sociology*, *14*(2), 107-125.

Sizer, T. R. (1984). *Horace's compromise: The dilemma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Skipper, B. L. (1989).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at Randolph High School 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 naturalistic study.* Unpublished record of study,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X.

Smith, L. M. (1990). Ethics in qualitative field research: An individual perspective. In E. Eisner & A. Peshkin (Eds.), *Qualitative inquiry in education: The continuing debate* (p. 258-27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oltis, J. F (1990). The eth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 Eisner & A. Peshkin (Eds.), *Sociological methods: A sourcebook.* Hawthorne, NY: Aldine.

Spier, L. (Ed.). (1941).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Essays in memory of Edward Sapir.* Menasha, WI: Memorial Publication Fund.

Spradley, J. P. (1979). *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Strauss, A. L., & Corbin, J. M.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Swisher, K. (1986). Authentic research: An interview on the way to the ponderosa.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17*, 185-188.

Taylor, S. J., & Bogdan, R. (1984).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search for meanings.* New York: John Wiley.

Taylor, V. (1992). *Social exchange in bureaucracies: A study in negotiating access to a business environmen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X.

Tesch, R. (1990).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types and software tools.* Bristol, PA: Falmer.

Vidich, A. J. (1992). Boston's North E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1), 80-102.

Whorf, B. L. (1956).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Cambridge: MIT Press.

Whyte, W. F (1943). *Street corner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more, B. E. (1988). *The establishment of criteria for standards of principal performanc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X.

Wimsatt, W. K. (1954). *The verbal icon: 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Witters-Churchill, L. J. (1988). *University preparation of the school administrator: Evaluations by Texas principal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X.

Wolcott, H. F (1973). *The man in the principal's offic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Yeager, P. C., & Kram, K. E. (1990). Fielding hot topics in cool settings: The study of corporate ethics. *Qualitative Sociology, 13*(2), 127-148.

Yin, R. K. (1984).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Series, Vol. 5. Beverly Hills, CA: Sage.

Zelditch, M., Jr. (1970).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of field studies. In N. K. Denzin (Ed.), *Sociological methods: A sourcebook.* Hawthorne, NY: Aldine.

Zeller, N. C. (1987). *A rhetoric for naturalistic inquir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IN.

索引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做自然主义研究　　方法指南
作者=大卫·A·欧兰德森，埃德沃德·L·哈里斯，巴巴拉·L·史克普等著
页数=159
SS号=11970847
出版日期=2007.9